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場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图例

- 市 政 府
- 县(市、区)政府
- 乡、镇(街办)
- 铁 路
- 高速公路及道号
- 国道及道号
- 省 道
- 县 道
- 省 界
- 设 区 市 界
- 县(市、区)界



2012 · 3, 2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 王晓嫚

编委委员： 徐福田 李克彬 刘 凯
 高 明 胡爱军 伊廷军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高文堂 郑克勤 曲文军
 康德忠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王傢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杨兴文

主 编： 朱海涛
 副 主 编： 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目 录

【本期特载】

进军东北的命令 黄克诚 04

【峥嵘岁月】

千古民魂（连载四）
 ——渊子崖，中华抗日第一村保卫战纪实 李凤军 06

郭子化同志在滨海 刘华南 09

【史海撷萃】

滨海十年（连载四） 谷 牧 11

【文化掇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声古韵 雅正婉丽
 ——“郯城五大调”声腔源流、艺术特色初探之二 张铁民 16

刘疵墓出土西汉独特的金缕玉衣 徐淑彬 徐 宁 22

汉画像石上的“龙”及其折射的社会意识 桑玉厚 25

【名人素描】

先贤澹台灭明 王庆全 28

一颗光芒四溢的彗星
 ——王思玷的生平及其影响 靖一民 31

【蒙山沂水】

“乡村古堡”——湖南崖 奕垚、委实 35

“七十二崮堪爱” 包 勤 38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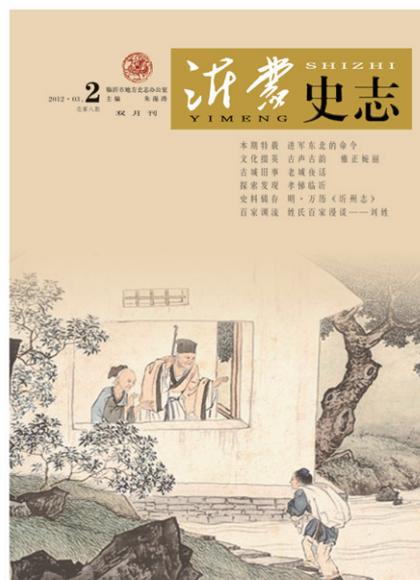
【探索发现】

孝悌临沂——《二十四孝》探源之二 大荒堂主 44

	无字碑——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建国逸事	高 雷	46
【诗画赏析】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	李兴河	48
	暮春三月 品读《兰亭》话流觞	俞正阳	53
【沂蒙名医】			
	照亮心窗的阳光——感受刘方毅	刘凤才	54
【影像沂蒙】			
	涑河的变迁	王金海	58
【史料辑存】			
	1916—1949：临沂早期的报纸（上） 呼国英	刘金柱	59
	明·万历《沂州志》（选载）——沂州城之图	海 涛	62
【百家渊流】			
	泰山南城羊氏（上）	唐士文	64
	姓氏百家漫谈——刘姓（上）	赵丹峰	69
【文史论坛】			
	蒙阳上古史迹漫话	李常松	74
【沂蒙乡亲】			
	雕塑时光——记雕塑家孙龙本先生	胡英子	78
【史志动态】			80

封面：二十四孝图之“为亲负米” 绘画/陈少梅（清）

封底：书法/胡石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

进军东北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本文是黄克诚向新四军第三师各部发布的进军东北的命令，根据解放军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1945年9月23日，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接到新四军军部命令，要他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北上山东蒙阴地区待命。黄克诚紧急部署，于9月28日同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三师主力部队3.5万人，从苏北出发，部队10月10日到达临沂，在临沂地区稍事休整后进军东北。

新四军第三师前身为山东地区的八路军，其中不乏鲁南地区的部队，如临郑独立团。苏北抗日期间，在黄克诚率领下从不足2万人发展到7万多人。

一、情况：

(一) 徐州敌六十五师团尚未解除武装，仍固守徐州及沿陇海路新浦、连云港之线，其分布详情待查；

(二) 伪顽第四军徐继泰部详徐字通报第一号；

(三) 伪王毓文部约三师之众，近由徐州向新浦、连云港推进中；

(四) 北进沿途情况，各部队应注意侦察。

二、任务：

奉军命令，我师北进，「执行」收缴敌伪枪械、扩大解放区及随时打击顽军向我进犯之任务。

三、我师为执行北进任务部署：

(一) 十旅、八旅为北进左纵队，前进道路及宿营地详另图，该纵队归到刘震指挥之。

(二) 七旅、师直、淮安独立团为右纵队，前进道路及宿营地详另图。

(三) 独立旅为北进后纵队，前进道路及宿营地由师临时电告。

(四) 北进部队无特殊情况阻碍，每天行程五十里至六十里。

(五) 七旅到达临沂以北河阳镇一带待命，师直到临沂以北汤头一带待命，十旅到蒙阴城以北待命，八旅到蒙阴城以南待命，独立旅由师临时指定之。

四、各部队应于九月底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先头部队于十月三日开始向北行进。**五、各部队向北开进过陇海路时，有相机打击顽军王毓文之任务与防敌袭击。****六、北进部队要有充足准备：**

(一) 每人要带棉衣一套，棉被一床，鞋子最少要带两双，袜子一双，手巾一条。

(二) 每人随带大米三天，雇民夫运两天，共计每人准备五天粮食，保证过铁路北存有三天大米。

(三) 各部队各种书籍尽量减少，不得多带，以免途中累赘。

(四) 各部留下人员应妥为安置与交待，不得马虎。后勤人员应由专人负责指挥。

(五) 各旅团应组织设营队，以便筹划粮草，调查路线情况等。

七、我的位置在师部先头。**八、注意事项：**

(一) 各部队特别注意保守行动秘密。

(二) 注意沿途收容与巩固部队。

(三) 各旅电台注意保持与师台联络。

(四) 沿途注意群众纪律与卫生工作。

(五) 先头部队随时电告后梯队道路情况。

(六) 各旅注意与先遣人员沈胡电台【沈胡电台，指由参谋处长沈启贤、第八旅副旅长胡继成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北上先头部队的电台】联络。

(七) 各部队沿途注意军风纪。

此令

师长兼政委 黄克诚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千古民魂

(连载四)

——渊子崖，中华抗日第一村保卫战纪实

李凤军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碑刻——渊子崖保卫战

七

天公雨泪，群山呜咽，沐水泣血。

鬼子放火烧着的883间房屋燃烧了整整一夜，强烈的火光冲开浓重的雾水，映出一道巨大的血色光柱，几里之外的周围村庄看见这个烛天灼地的火柱不禁悚然心颤。人们注意到这个火柱由亮变暗五彩交替，在黑夜，看上去仿佛是一堵巨大的黑色墓碑。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日拂晓小梁家的汉奸队又在雾中偷袭了渊子崖。他们继续烧杀抢掠——抢走牲口衣服和粮食，还抓了30多个男性村民带走。

卑鄙啊卑鄙！汉奸的惨无人道失缺人性已经让我们心疼得说不出话来。笔者多年来注意搜集汉奸资料，常常怒发冲冠后又陷入无限的沉思之中。汉奸的卑鄙人格让我们这个民族大伤过元气，尤其在八年抗战中，汉奸的助纣为虐罄竹难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奸的危害比侵略者更为可怕。我们民族必须也应该永远检讨和医治这种内伤。

渊子崖是烧焦了，每一寸土地都浸染了淋漓的鲜血。饥饿和极度的紧张，巨大的灾难使

人们一时不知所措，家家哭声，人人泣血，悲痛在应该悲痛的时候以它最原始的方式释放出来。死者已矣，生者何倚！

渊子崖的事迹像春雷一样震撼了人们，人心不死！四乡八疃的亲戚和义士纷纷来到这里帮助苦难者。抗日民主政府立即开展救扶工作，筹集并动员人们送来了生活必需品，还有雪白的孝布。

人们去抬九兰的时候发现，九兰家的狗始终站在旁边，这只忠诚的狗一直守护着主人，不让外人靠近。人们找来九兰的妻子，这个女人欲死欲绝，后来她拍了拍这只狗的头，狗伏在女主人的怀里，双眼发出悲悯凄惨的光芒。谁都说这狗通了人性，而汉奸竟不如狗。九兰父亲秉夺脑后一洞，三哥九京侄子雪都是中弹牺牲。

老秉彪也死了，同他一起埋掉的还有老汉的8个子孙。其壮如斯，天何堪焉！

老冯的尸体是在东岭上找到的，他中弹后敌人又砍了他七八刀。他的战友告诉人们：老冯带着部队来到时天已晚了，这个忠义的汉子急得满头大汗。老冯说，我得闯到村里，这里我熟悉，我进去帮助百姓转移，我不进去我对不住他们啊。但是显然他已经无法进去了，他和这个尖刀排的战士全部牺牲了。渊子崖敬重有血有肉的人，人们哭一声亲人哭一声老冯，哭一声老冯哭一声亲人。老冯啊——亲人哪。

一具尸体，一首长诗，一座坟墓，一篇文章。九兰抬过来了，清杰、庆海抬过来了，庆雷、庆宣、庆会抬过来了，林欣、小凡华也抬过来了，147具英雄躯体都抬过来了。

林凡义、林庆忠和村民们身披重孝为亲人们送葬，一步一声长哭，一声一句哀歌。

埋下吧，埋在这还在发烫的深厚的土地上，从此您可以长眠，明春坟头又可长出黄花，也会飞来蜜蜂。

这一仗渊子崖牺牲147人，伤者无数，汉奸抓走了30人，鬼子带走了3人。鬼子死了多少呢？鬼子死112名。

鬼子撤退中掳走了庆平、凡荣和凡坤三个“识字”的回新浦驻地，走到江苏黑林镇，庆平逃跑时被打死。敌人把凡荣、凡坤带到敌营关起来，想尽办法折磨他们，当时有间屋子的柜台较高，鬼子便绑着他们跪着当踏板。穿着皮靴的鬼子一个个踏着他们的背迈过去，把皮肉都踏烂了。有个卖茶的地下党叫张举善，他设法通过内线找机会救出两人，送到一户老夫妇家里。张举善告诉他们：鬼子死了112人，费了很多弹药枪支，却栽在一伙老百姓手里，官长大发其火，感觉丢人，把联队长也给撤了。你们渊子崖真了不起！二人被送回来后，身体养了几年才复原。

鬼子的尸体怎么处理的谁也没有看见，不过后来村民们发现，东北角小菜园一片漆黑，土地焦化，二三年之后还有怪味。

整整半个月都是阴天，雾连着雾，云遮着云，忽然下起了大雪。这雪下得很大，一天一夜纷纷扬扬。到处银妆素裹，天地一白，尤其那一株株树挂仿佛株株梅花。老天爷开眼了，老人们说，这是给咱渊子崖挂孝啊。

八

有关渊子崖的故事还没有完。

曾经在渊子崖战斗生活过的战士、演员和房东很有感情，恶战之后人们千方百计的打听消息。有个叫林克的文工队员怀着满腔怒火，创作了歌曲《当兵把仇报》：

房子烧啦，东西没啦，只剩下一片焦土几片瓦，只剩下满地骨头架。可恨的日本鬼，三光真毒辣，这样的仇恨怎能罢，来吧！当兵把仇报呀，记住！仇不报，不回家！牛马没啦，人不见啦，我们的爹妈谁杀啦，我们的姐妹谁抢去啦。

渊子崖人确实没有倒下，战后人人挨饿，但是他们没有吃战前为八路军存的一屋子粮

食。人们也没有吓怕，年轻人养好伤后许多人参加了军，以后村里每年都把四五个子弟送上了前线。

这年秋天，八路军俘虏了万恶的汉奸队长梁化轩，押赴渊子崖执行枪决，陪刑的还有一个日军俘虏。两个战士把梁化轩摁倒在地，让他跪向烈士塔，击毙了这个披着中国人皮的败类。群众的情绪达到了沸点，人们红着眼睛，想掐死那个日本俘虏，但人们最终没有这么做。

渊子崖人精神象化石一样植入人民心中，激励人们去同鬼子斗争。

1944年春，滨海专署在村北的金锁城上建起了一座六角七级纪念塔。沭水县参议会的题词是：云山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

1947年国民党74师过此，企图毁掉这座纪念塔。他们拆掉了基座上的围栏，想推倒塔身，可是烈士塔像山一样巍然屹立着岿然不动，一个军官气急败坏地向塔打了一枪，子弹崩掉第三层东南角的一块石片，这块疤痕也便永远地留了下来。

建国以后，临沂华东烈士陵园纪念堂陈列渊子崖战斗浮雕；山东博物馆展出大刀，长矛；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设置专门版块，介绍渊子崖战斗经过，还陈列了当时使用的五子炮、生铁牛。

九

若干年之后，烈士塔周围建立了一个果园，看果园的就是当年的村长林凡义。这个刚强、倔强的汉子，经过那场恶战，几年之后便退下来，从此终生没当干部。果园建成后他主动要求看果园。春季，他在塔前放上鲜艳的桃花和洁白的梨花；秋日，他采来最好的果子祭奠忠魂。

这些年来许多老同志老战士老领导来这里走访，在众多的走访中有中国曲家协会主席陶钝、解放军报总编、抗大工作队员等。1994年春天，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带着警卫班专程来访。老将军当年曾在这一带工作过，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仍然没有忘记这段往事。他说，我始终念念不忘渊子崖保卫战，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千古民魂。老将军和战士们向烈士塔庄严地三鞠躬，他向战士们讲述战斗经过，讲解它的不朽意义。老将军的题词是——民族之光。

渊子崖保卫战仿佛是一坛陈年老酒，人们越来越多的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场战斗，而品味出了它的醇厚底蕴。

但是，渊子崖却没有烈士。那些死难烈士都是荣誉性质的，没有抚恤金，没有待遇，也没有烈属，一些残废老人只能吃五保。

采访中我们注意到青年一代十分敬仰先辈，把保卫战看成永远的财富。有个青年告诉我，有一年他到几十里外去买瓜干，报出村名后，人家热情地给倒上茶水。他说人们敬重渊子崖做出的牺牲和英雄壮举。

我还要告诉读者的是，这些年渊子崖村培养出了两百多个大中专学生，是远近闻名的秀才庄。

——渊子崖啊。

（全文完）

郭子化同志在滨海

刘华南



郭子化

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一部分敌人直逼滨海区腹地莒南县北部山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把联合国救济山东解放区尚未发放的救济品也抢走或烧掉，还乡团疯狂报复，气焰嚣张，这时我们在土改复查中又出现了“左”的错误，不仅要消灭地主阶级，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其人，贫雇农坐大堂，对地主富农有生杀予夺之权，杀人权放到了村，乱捕乱杀现象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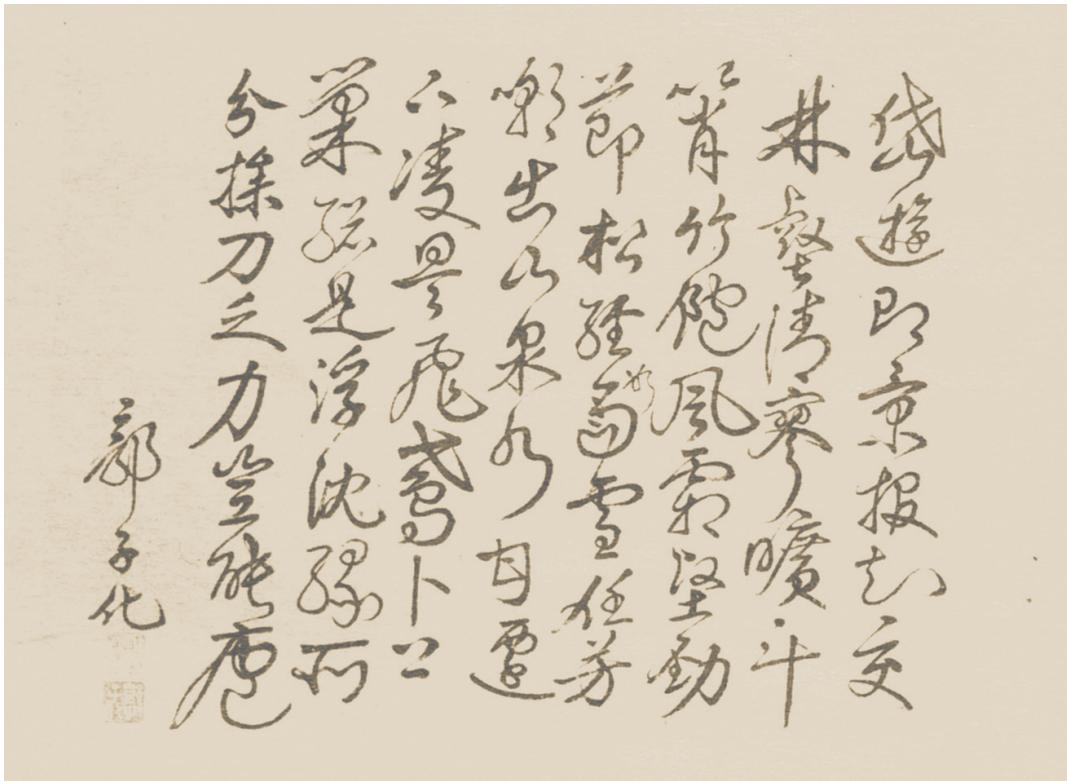
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华东局委员、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郭子化带领一部分同志，从滨北地区五莲县过来，住在日照西北一带属三庄区范围内。他们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各村民兵都管着一批地主富农分子，有的正在斗着，有的被打死，他们发现一个村子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一人身穿蟒袍，腰扎玉带，头戴乌纱，扮成唱戏的县太爷，名曰贫雇农坐大堂，惊堂木一拍，把被斗争的对象拉出去，竟用乱棍活活打死。

郭子化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送信让所在区区委书记马××来谈谈。老马没有来，只写一回信说：郭子化同志，我现在没有空。郭子化同志觉得不行，又去叫。去的人说，郭子化同志是华东局秘书长，要他一定去。老马仍然没去，说自己有病不能去。郭子化一听火了，说给我抬也得抬来了。老马真的是用担架抬去谈的。

郭子化同志同时打电报给滨海地委，要地委去人。地委派我去的，我当时在地委办公室负责。但我去后郭子化同志说，你来了还不行，还得叫谷牧同志来，因谷牧同志是地委书记、滨海军分区政委。谷牧同志接到二次电报后和副书记孙汉卿同志一同去的。

郭子化同志还同时派华东局组织部顾玉良科长带领几个同志到驻地作了详细调查。郭子化同志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向地委、区委谈了自己的意见，让立即纠正乱捕乱杀现象。地委做出了《在贯彻土改复查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决定》，从而迅速刹住了乱捕乱杀歪风，华东局也随后做出了《关于暂停土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

郭子化同志对于滨海地区土改复查中错误倾向及时发现，敢于抵制的严肃态度，对党对群众对待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后记：

郭子化（1895年—1975年），原名郭邦清，又名葛洁之、郭幼如、李念三、郭省三等，化名葛幼如。江苏邳县土山区郭宋庄（今江苏省邳州市占城镇）人。

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1935年2月主持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37年中央批准他任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随后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在四省边界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3月领导发动鲁南沛县、滕县、峄县武装起义，成立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同年秋同中央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划归山东省委领导。山东省委决定撤销特委，成立苏鲁豫、鲁南和苏皖3个特委，郭子化任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1939年10月被选为出席中共七大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山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制委员会主任。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任济南特别市市长。1949年2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统战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参与领导山东各解放区恢复发展生产，支持华东人民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1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5年2月后任国务院卫生部部长助理、卫生部副部长等职。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5年12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滨海十年

(连载四)

谷 牧

八、惜别罗荣桓同志

当听到朱总司令命令八路军（原东北军系统）吕正操部、万毅部、张学思部向东北进军的消息时，我这个当年张少帅的学兵也坐不住了，很想同老战友万毅一起杀回东北，收复失地，并向东北父老乡亲展示这支经过共产党改造和发展了的东北军老部队的新风采。

党中央根据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形势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决策，派罗荣桓同志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人，派黄克诚同志率新四军3万人，连同其他地区的部队，从海陆两路不失时机地驰赴东北。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已先行带领司、政、后一部分干部出发。我利用这个机会向罗荣桓同志表达了我希望一起去东北到主力部队的愿望。

罗荣桓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曾经想带你一起去东北，后来考虑山东地区今后的斗争任务将更加艰巨，也得有一批骨干，你在山东工作多年，地方上的情况熟悉，留下来是合适的。接着，他勉励了我一番。望着这位身负重任、即将远行的老首长，想起在他的领导下山东解放区的发展壮大及自己的成长进步，我心里充满了对老领导的敬意和依依惜别之情。



迎接大反攻（油画）

我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期间，先后任分局书记的朱瑞、罗荣桓两位同志，都是水平很高的老领导。朱瑞同志曾在广东中山大学就读，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而且他做事非常认真，每作工作报告，必抱一大摞理论书上台，随时翻开援引，大家都很佩服。记得他向分局机关作关于《从国际到山东》、《妇女解放运动》等报告，每个报告都讲个把星期，内容涉及生物起源、阿米巴变形虫、从猿到人等等。虽然，他的有些讲话学院气味浓，联系实际不够，但也并不像党内有些领导人那样把马列主义对着别人咄咄逼人。朱瑞同志是一个有学者风度的领导，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朱瑞同志后来创办我军的第一所炮兵学校，把他身上兼有的学者、革命家、军事家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

罗荣桓同志作报告，总是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42年学习节开大会，罗荣桓同志在报告中讲了一个问题：山沟里能不能出马列主义？罗荣桓同志说：“有人讲，毛泽东同志是山沟里出来的，打仗可以，搞农民运动，搞理论不行。这是完全错误的。什么叫理论？能指导革命实践并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武装斗争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根据地建设的理论，现在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理论，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那种照搬马列主义，在实践中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的‘理论’，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山沟里能不能出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要斩钉截铁地说：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这种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是对中国革命真正有用的马列主义！”说实在话，对罗荣桓同志这番话的深刻含义，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直到党的“七大”以后学习了有关文件才明白，他是坚定得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一边，同王明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罗荣桓同志讲话扼要深刻，但也不咄咄逼人，虽然在大原则上决不让步，对同志、对统战对象却又很宽厚。

罗荣桓同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在军事上的创见，如翻边战术和政治上的成熟，如在山东不搞“抢救运动”，人们谈得比较多。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他的领导才能是全面的。

正是因为罗荣桓同志等山东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不僵化、待人宽厚、处事灵活，山东根据地在经济工作方面做出了特色，出了一些经验。

首先是重用懂行的企业家。



北海币
(鲁南抗日根据地发行)

先从北海银行的创办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统称抗币，与日伪发行的伪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同时在各自统治地区及交界地区流通，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票是广为民间商人承认的最成功的抗币之一。

抗战初期，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在其驻防区域内大量印发地方流通券，强迫群众

使用，掠夺物资发国难财。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止国民党地方部队的中饱私囊，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为了使物资能留在根据地用于抗日，同时也解决市场上法币的流通缺少辅币的实际问题，山东的几个抗日根据地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抗币。

北海银行诞生于1938年10月，因蓬莱、黄县、掖县北面临海，而当地抗日政府也叫北海专署，故初时为当地抗日政府创办的这个银行得名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是直接聘请银行家参与创办的。祖籍掖县的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雨田抗战爆发后回乡避难，当时胶东三支队的支队长郑耀南、政委李耀文等经研究并请示了上级领导曹漫之等同志后，亲自出面请张雨田主持办银行。根据当时市场流通缺少辅币的情况，一开始发行一角、两角、三角、五角等辅币，很受群众欢迎。由于北海银行真正按金融业的规律办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罗荣桓等山东根据地的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使北海银行渐渐成为整个胶东根据地的银行。在停办了其他不成功的银行后，1940年北海银行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唯一发行成套抗币的省银行。

胶东有许多民间商人在哈尔滨、大连或青岛、烟台等地从事工商业并拥有巨大经济实力，他们为养家而汇入大量伪币，这促使形成了民间的“外汇”交易。根据地正视这一现实，利用土特产、食盐、花生等，利用我们控制的硬通货——黄金，努力提高抗币的威信，并利用掌握的伪币、法币到敌伪和顽固派占领区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既保证了抗币的合理币值，又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生活。

虽然北海银行的创办者张雨田经不住国民党方面的诱惑，后来离开了根据地，但根据地一以贯之地尊重企业家和专家。如郭欣农同志的父亲郭延寿（字眉山）就是胶东区财委副书记孙揆一同志亲自参与动员（从哈尔滨）回乡参与根据地建设的企业家。1944年春，北海银行经郭延寿等通过天津转给彭德怀的机关北海币400多万元（合当时准备银行币700万元上下）。

由于尊重银行家，参与创办北海银行的陈文启、洒海秋等同志迅速成长为内行，不但把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领导得很好，解放后也很胜任地担任了省级银行和国家银行领导职务。

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尊重经济学家。

1943年初，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因该校停办，奉新四军陈毅军长的命令带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经山东赴延安。朱瑞同志、黎玉同志、罗荣桓同志都先后接见了薛暮桥同志，恳请他留下来抓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同时也向中央提出要求（朱瑞同志先是请求允许薛暮桥留山东工作三个月，后罗荣桓同志又请求延长），得到了批准。

薛暮桥同志对山东经济工作中的欠妥之处有重要的建议被采纳，对成功之处亦做出了精彩的总结。这里仅举二例：

山东的征粮办法，按实产量征收，税率累进。薛暮桥同志指出：税率提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就会失去增产的积极性，建议改为按应产量征粮。

对于抗币（北海票）的发行和管理，薛暮桥也总结和推广实行了一套理论。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美国有个经济学家以记者名义来山东访问。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山东的货币既无金银作储备，又无外汇作储备，竟能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薛暮桥同志告诉他，你们有40%黄金储备，我们有50%的物资储备。“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储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1943年10月，薛暮桥同志直接负责刚刚成立的山东省工商局的工作（黎玉同志挂帅兼局长，具体工作由薛暮桥主持），统一领导了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

由于重用了企业家和懂行的同志，由于尊重经济学家并按市场规律办事，山东的经济工

作搞得灵活，创造出许多其他根据地没有的经验，比如发展“海外贸易”就是其中一项。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拉长了，活动在中国沿海的舰艇逐渐减少，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海上封锁也减弱了，与根据地做生意的民间商船渐渐增多（历史上苏北、浙东一带小港口的商船就有与山东各港口贸易的传统）。由于敌人对我的封锁以及我对敌占区的反封锁，运到敌占区港口的棉花等物资因失去广大农村市场而销路不畅，而敌占区的城市也极缺花生油、食盐等物资。我们通过商人的间接宣传以及我在敌占区工作人员的直接工作，逐渐动员了一批商船驶进根据地的港口，也有因风向等原因误入我港口的。我们对入港商船均热情关照，他们的棉花等物资销售快、价格好，所需回头货——花生油、卤咸鱼、海盐等我方也都积极供应，且价格便宜。巨大的利润空间和爱国热忱使民间商人敢于继续冒险“走私”。敌人对海上交通工具的控制极严，每只船都得领取一本“航行路簿”，进出任何口岸都必须报关验证和检查货物，规则十分严格。民间商船一般是黄昏时候接近青岛（沙子口）或石岛等敌占区港口，天一黑趁夜幕掩护驶向我根据地的码头。我们这边不需盖结关验讫章，对他们私刻的敌占区海关分卡印章也不过问。日伪在石岛的力量不如青岛，石岛抗战后期被我军控制。我抗日根据地对外通商的口岸还有滨海区日照县的岚山港等港口。

除了和敌占区的民间贸易，山东根据地与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也展开了贸易，互通有无，互相支援。

贸易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比如原来缺少棉花的地区得到了比较充足的供应，根据地发动群众纺纱织布，经济贸易部门放棉收布，解决了军需和民用，也促进了纺织等方面的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而敌占区的食用油等物资依赖我解放区渐渐成为一种既成事实，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也只好默认这种事实。通过对敌占区的贸易，所获得的大量收入被我方大量用来购买抗日急需的物资，对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而我山东根据地由于采取了灵活的经济政策，掌握了经济斗争的主动权。

因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再加上胶东招远等地出产黄金，山东根据地给党中央和兄弟根据地做出了许多贡献。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10万两之多，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我曾为原公安部边防局的慕丰韵局长的回忆录提写书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到了他们那批从胶东派往延安学习的学员及护送部队每人都发了一个重七八斤的缝好的带子系在腰间带往延安。

我在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的职位上，曾参与过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调研，而到滨南地委工作又直接领导了地方的经济工作。山东的几个根据地中，胶东和滨海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通过海上的“对外贸易”也比较多，出了一些经验。

曾跟随罗荣桓、朱瑞同志工作，后来成为军事家的同志很多，从后来第四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抗战时期在山东工作的同志成长为军、师级高级指挥员，对他们的事迹有许多报道。其实山东根据地也有不少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后来随大军南下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因山东根据地较早发展“海外贸易”，有海关业务，所以南下时有不少山东的干部充实到沿海各省的海关等部门。我现在已记不全为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作出贡献的领导同志的名字了，除了前面提到的省级领导及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和领导北海银行的陈文启、洒海秋等同志。胶东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自然也出了较多干部。虽然客观地说，胶东地区条件较好，不像滨海处于交通要道，属兵家必争之地，但领导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毕竟是要认真研究掌握经济工作的规律。北海银行能在胶东成长起来，胶东根据地能从战略高度跟日伪争夺并经营金矿，从而保证了大量黄金上缴中央，都说明了曾任北海专署专员和胶东行署主任（兼胶东军区政委）的曹漫之等地方的领导同志（当时许世友同志是胶东军区司令员，从军事上有利保障了根据地的发展）是善于研究问题和总结经验的。



薛暮桥(左)在西柏坡

1945年底，薛暮桥同志任省府秘书长后，石瑛同志接任工商局长。他原任滨海的工商局长，所以我对他的成绩比较了解。他来自晋冀鲁豫根据地，结合了两边根据地的经验，学习了薛暮桥同志的一些理论，并结合山东特别是滨海根据地的实际，做出了许多成绩。我引用薛暮桥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的一段话来证明其贡献：石瑛同志“对建立工商局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将滨海区这方面的经验加工，向全省推广”。

薛暮桥同志任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时，杨波同志是他的重要助手，协助总结了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一些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调到国务院工作以后，和薛暮桥、杨波同志的接触比较多，大家常常谈起抗战时期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的山东经济工作的经验，对党内后来的一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行为感到非常不理解。后来我们这几位经过山东根据地锻炼的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也都为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发掘这些经验可以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有益的启示。而罗荣桓同志重用专家、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才干非常全面的领导人。每回忆及此，我总为罗荣桓同志的英年早逝扼腕叹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声古韵 雅正婉丽

——“郟马五大调”声腔源流、艺术特色初探之二

张铁民

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

“五大调”源远流长，历史传统悠久，蕴涵着珍稀的古声古韵。用曲牌填词进行演唱，被称为“牌子曲”，由来已久。就目前所知，“敦煌遗书”的“敦煌曲”中，“以乐定词”供演唱的《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篇什，应当是它的最早形式。起初，它们只是曲目的名子，后来有人依照它的规格，不断地填制新词，唱腔和唱词逐渐定型，便成为词曲相对固定的“曲牌”名称。此后，“依调填词”就成为了一种传统。到了宋代，便发展为“宋词”。“宋词”原本就是“依调填词”后供吟诵、演唱使用的一种“唱曲”，故又称“小唱”。只不过由于艺人演唱的曲谱，系口耳相传，谱面没有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宋词”，仅仅是它的“歌词”。

宋词的体裁形式主要有令、慢、近等。“令”是“小令”也叫“令曲”，词中短小者，一般以一支曲子为独立单位。“慢”是“慢曲”，曲调舒缓，词句繁多，与曲调急促的急曲相对。“近”是“近拍”，一般比



小令要长，比慢词短，因此也称为中调。其具体的样式、形态，名目繁多。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更有小唱、唱叫、执板、慢曲、曲破，大率轻起重杀（煞）正谓之“低斟浅唱”。

这一类“唱曲”的实际名目及演唱形式，已经难以考察。但有一种比“小令”较大一点被叫做“唱赚”（一种曲牌）的唱曲形式，《梦粱录》记述得比较清楚：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者，为“缠达”。南宋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筛扬处是也，遂撰为赚。

这就是说，北宋时期说唱艺术的演唱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缠达”，另一种是“缠令”。到了南宋，一个叫张五牛的艺人听了“缠达”、“缠令”，受到了启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赚”这一新的唱曲样式。“唱赚”包含了“缠达”和“缠令”两个部分。这应当是现在已经知道的，最早使用曲牌连缀方法的演唱形式。

上述“宋词”的演唱形式，在当今的“郟马五大调”中，依然可以找到它清晰的印迹。如“五大调”的单曲〔马头调〕等约略与小令相同。唱腔细腻舒缓、优美动听，时有十几拍甚至更长拖腔的〔玲玲调〕，则与“慢曲”十分相似。而有若干只曲牌组成的“套曲”如〔满江红〕，与“唱赚”几乎毫无二致。这就从一个侧面真切地说明了宋代的“唱赚”与“郟马五大调”之间的亲缘关系。

到了元代，已经文人化、贵族化的“宋词”渐渐式微，在北方尤为明显。长久以来在民间城镇乡村流行的“里谣俗曲”，便取而代之，大量涌现出来。元人燕南芝庵在他的《唱论》里这样记述：

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明唱〔摸鱼子〕，南京（今开封）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可见种类之多，流行地域之广。这种在北方广泛传唱的新兴民间歌曲，继承“唱赚”的传统，吸收“宋词”的部分成分，逐渐发展成为伴奏、演唱形态较前更为成熟的新的“牌子曲”唱曲形式，这就是元代“散曲”。小令和套数是“散曲”的两种基本形式。小令是可以独立演唱的单曲。它按照不同的曲调创作，每一曲调都有自己的名字，如〔山坡羊〕、〔寄生草〕、〔天净沙〕、〔沉醉东风〕等。套数又名散套或套曲，它采用“唱赚”、“诸宫调”等连套的方法，将两支以上同一宫调的曲牌联缀，加尾声组成结构更为复杂的唱曲。

“散曲”在语言运用和押韵等方面，与传统的诗词有诸多不同。它大量使用口语、俗语，质朴自然，鲜明泼辣，形成一种与以文言词汇为基础的诗词作品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如无名氏的小令〔醉太平〕《讥贪小利者》：

夸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鹤鹑喙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剜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散曲”用韵没有入声，平上去三声通押，一韵到底，而且用韵密实，几乎句句押韵，以造成一种浓郁的韵律之美。如人们非常熟悉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很容易使人想到“郟马五大调”中的一些曲子，如〔马头调〕（淮调）《睡鞋占课》：

哎哟哎哟实难过，半夜三更睡又睡不着。睡不着，披上衣服坐一坐。盼才郎，脱下睡鞋占一课：一只仰着，一只合着。要说来，这只鞋儿那么着，要说的不来，那只鞋儿又这么着。

两者不论是遣词造句还是用韵，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技巧，如直陈白描的手法、单曲可以反复咏唱等，都被“郟马五大调”承袭下来。随手拿过一支“五大调”的曲子，和“散曲”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是那么地气韵相通、一脉相承。

后来由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蒙古贵族的野蛮统治，整个社会昂扬向上的精神受到抑制，加之封建文人的不屑与歧视，“散曲”的创作队伍不断萎缩，致使内容、形式慢慢趋于僵化。到了明代，就被一种蓬勃兴起的民间俗曲（时调小曲）取代。明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篇》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中，有这样的记载：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今所传〔捏泥人〕、〔双打挂〕、〔熬髻〕三阙，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驻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词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秩，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

这种情势，一直延续到了清代，而且在流传的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更大的飞跃。牌子曲的演唱，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称为“明清俗曲”。后来，南北各地都发育，养成了一些新的曲牌连缀或联套唱曲体式。又经不断演化，便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具有各自演唱风格、表演方式、传承秩序的唱曲品种。主要有“扬州清曲”、“单弦”、河南“大调曲子”、“山东小曲子”（“五大调”等）、“滩簧”、“湖北小曲”、“广西文场”、“四川清音”、“兰州鼓子”、“北京时调小曲”等等。其中，“郟马五大调”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文人编著的众多俗曲集里，都有明晰的记载。如刊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的《霓裳续谱》，就收有多首〔马头调〕。嘉庆（公元1796年—1820年）年间出版的《雅曲二集》、《马头调杂曲集》中，都收录了大量的〔马头调〕。《时兴小唱钞》内有〔满江红〕等曲。由华广生辑录，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刊行的俗曲总集《白雪遗音》，收南北俗曲700余首。其中〔马头调〕最多，有430余首。另有《满江红》、《寄生草》、《玲儿调》多首。同时代出版的《时兴杂曲》有《马头调》、《满江红》、《大寄生草》。咸丰（公元1851年—1861年）年间苏州抄本《百万句全》有《马头调》、《寄生草》、《满江红》等曲词。与当今“五大调”中的相关曲词对比，不论题材内容、曲牌体式，乃至韵辙及平仄的运用，都大同小异，极为相似。

风格别致的曲体形式与演唱伴奏

经过几代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五大调”流行的中心区域——郟城、马头一带，共搜集到五种曲牌的曲目130余首。它们是〔满江红〕22首，〔淮调〕（马头调）72首，〔玲玲调〕11首，〔大寄生草〕21首，〔大调〕4首。其音乐结构繁丽、长大，风格古朴雅致，旋律高扬低回，曲折委婉，擅于拖腔，倚重声情。多用衬字、垛词、叠句。节奏平实舒缓，不激不厉，可谓一唱三叹，五光十色，异彩纷呈。“五大调”属于五声调式，曲中偶而也出现清角（fa）和变宫（si）两个偏音，但只是作为装饰音、经过音或者辅助音出现。而且具备宫、商、角、徵各种调式，能够比较从容地表现纷繁复杂的多种感情，其表现力非常之强。

“五大调”的音乐构成，非常别致奇特，具有中国民间大型演唱曲独有的曲式特点。五种曲牌，每一种曲牌又可分为“清板”、“叠板”、“带把儿”、“夹曲”等曲体形式。

“清板”。过去称“轻板”，是上个世纪50年代山东省艺术馆的音乐工作者在郟城、马头采风时，从“五大调”老艺人口中所得。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准确。我们以为应是“清板”。因为，依据《辞海》（第六版），“清”字的一个义项是“单纯；不杂。”而这恰恰是“五大调”中，以往被称为“轻板”的牌子曲所具有的音乐结构特点。这些牌子曲，既没有叠子句、垛子句、带把儿，也没有夹曲，就是一首单纯、不驳杂、独立完整的单曲。如：

“清板”〔淮调（马头调）〕《天各一方》。这是郟、马一带的一首名曲。描写一位痴情女子，倾诉其思盼意中人的真挚而又复杂的情感。词中运用嵌字手法，嵌进了从一到十、再从十到一，二十个数字。词情真切又饶有风趣。全曲由十大句唱腔组合而成。每句唱腔包含一个对子句，即两句唱词。只在“腰板”处变为三句唱词。整支曲子不枝不蔓，一气呵成。结构形式为：

- 头 腔： 听说是一声分离神魂飘荡，
分离后你我二人天各一方。
- 第二腔： 原许下三春时节将奴望，
是怎地四月晴和尚未还乡。
- 第三腔： 奴胆小最怕五鼓更鸡唱，
六壬课问佳期屡费猜想。
- 第四腔： 七弦琴弹不尽奴的个心头怨，
八行书写不尽奴的一个腹内悲伤。
- 第五腔： 数九天独自揭开小锦帐，
十指尖尖怎耐寒霜。
- 第六腔： 至而今十分恩爱奴自伤，
只落得九魂肠断音信渺茫。
- 第七腔： 仰卧在八宝床上眼泪汪汪湿透了奴的衣裳，
(腰板) 盼到了七月七日双星朗，
你看那织女会牛郎。
- 第八腔： 为多情六阁亭台懒得要上，
五色绒线憎绣鸳鸯。
- 第九腔： 奴本当四海云游将郎访，
又恐怕你三心二意别有心肠。
- 第十腔： 你不该一味良心将奴忘，
闪得奴孤孤单单凄凄凉凉独守空房。

“清板”是各种大调的基本曲调，也可称为“主曲”。它是构成“五大调”各自本体最基本特点的支体形式。也是这一类曲调的标准形式。

“叠板”。当单曲演唱需要述说更为纷繁的事件，或表达更为复杂的情感，又感到篇幅不够时，就采用在“主曲”中，有规律地嵌入“叠子句”或者“垛子句”，以及“带把儿”的方法来解决，于是，就产生了“清板”的变化形式“叠板”。

“叠子句”为双句结构，一般是在两小节以上的唱腔内，用同一唱曲曲调，反复演唱不同的唱词。典型长度为每句四小节（2/4）。“叠子句”字多腔少，节奏较紧密急促，多用在曲子各段落的开始，与行腔（基本曲调）轮番交替，节奏疏密相间，对比强烈。如叠板《坠落烟花》。下面是它的结构图式（不含间奏）：

前奏——叠子句①（6句、中速）——行腔1（36小节、慢速）——叠子句②（4句、中速）——行腔2（37小节、慢速）——叠子句③（四句、中速）——行腔3（48小节、慢速）——叠子句④（四句、中速）——行腔4（49小节、慢速）。

以上是常规，也有特例。叠板〔玲玲调〕就别具一格。它的“叠子句”不是短句和短篇，而是由一群乐句和词句组成一段叠板唱腔，可以称为“组群式”。出现的位置，多在四大行腔的开头或中间部位。乐句的旋律，都脱胎于〔玲玲调〕的唱腔，或是利用〔玲玲调〕的乐汇编织而成。结合得非常和谐。

“垛子句”与“叠子句”的区别，在于它是在一小节唱腔内，反复演唱不相同的四字唱词。其特点是单句结构，典型长度为两小节（2/4），但也有变化。“垛子句”在曲中出现的

位置比较灵活，多在段落中部。其节奏比“叠子句”更加紧凑，类似数板。如〔满江红·叠板〕《金乌西坠》。其结构图式（不含间奏）如下：

前奏——主曲1段（12小节）——垛子句①（3句）——主曲（9小节）——主曲2段（8小节）——垛子句②（5句）——主曲（9小节）——主曲3段（10小节）——垛子句③（2句）——主曲（9小节）——主曲4段（1小节）——垛子句④（1句）——主曲（7小节）——垛子句⑤（1句）——主曲（8小节）——主曲5段（10小节）——垛子句⑥（3句）——主曲（10小节）——主曲6段（2小节）——垛子句⑦（2小节）——主曲（9小节）。

“带把儿”是指在每一大句行腔和唱词的尾部，增加一个五个字的“总结语”或“加重语”，以求把意思表达得更深切、更有警示性，人们把它称之为“把儿”。不过这只是指唱词，在唱腔旋律上，变化不大，并没有显现出这种“把儿”的色彩。如：〔玲玲调·带把〕《减芳容》（括号内为‘把字句’）。

减芳容，奴的闺病儿重，（病儿重千重）。你说是病，他也说是病，谁知是病不是病，（自己个心里明）。随心好事，成何用，中何用，魂想不能，我可梦想也是不能，（空叫奴盼多情）。想当初，离别时节，欲待送，懒得送，携手送，我可挽手送，（哭得眼通红）。至而今，丢了个净，撇了个净，倒把奴家忘了个净，（心肠冷似冰）。

“夹曲体”。夹曲体是有规律地在主曲的相关部位，加入音调与主曲相同或相近的其他小曲，形成类似叠板的形式。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主曲与夹曲有机穿插，轮次交替。这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准类型。如〔满江红〕《四盼》，其结构图式如下：

起板（也称起腔，属主曲部分）——夹曲1〔叠断桥〕——主曲（第一次陈述）——夹曲2〔数落〕——主曲（第二次出现）——夹曲3〔小郎调〕——主曲（第三次出现）——夹曲4〔叠断桥〕（第二次出现）——落板（煞板）、结尾（属主曲部分）。

图式中的主曲，系〔满江红〕本体的基本曲调。演唱时采用独唱的形式，以第一人称身份，表达曲中女主人公思念夫君的情怀，更显得真切动人。夹曲共使用了三支，其中〔叠断桥〕重复使用一次。夹曲曲调欢快，采用齐唱的形式，情绪热烈，形成了与主曲的强烈对比，更加反衬出女主人公的凄凉与哀伤。主曲像一条红线，贯串始终；夹曲相机穿插，起着变化调剂的作用。整首套曲结构严谨，既统一又富于变化，浑然一体。

第二种，夹曲集中在主曲的中部。如〔满江红〕《水斗》，中部夹用了〔凤阳歌〕、〔数落〕、〔叠断桥〕、〔小郎调〕四支曲子。此曲既属于夹曲类型，又兼具联曲特点。

第三种，夹曲只有一支〔叠断桥〕，而且出现在主曲的尾部。如〔大寄生草〕《轻轻来到葡萄架》，〔大调〕《葡萄架》等。

“郟马五大调”的唱曲方式，与说唱故事类的曲种形式，在艺术审美功能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注重唱曲的音乐性，“歌唱”是其根本所在。艺术审美功能主要是抒情。即使是演唱一些叙事性较强的曲子，也要着力“唱情”而不是“唱故事”。“唱事”，只是用来完成“唱情”任务的手段。因此，演唱者不需装扮，基本没有表演。

“郟马五大调”的演唱风格，大致可分为“清雅”和“通俗”两类。豪门绅商、文人雅士不追求任何功利，纯粹自娱自乐，以清正妙雅为上，属“清雅”一派；职业艺人以演唱为谋生手段，为适应百姓的欣赏习惯，往往要吸取一些民间“唱曲”的手法和技巧，借以招徕观众，是为“通俗”派。不论哪一派，都讲究吐字清晰、字正腔圆、以字行腔、细致入微、声情并茂。

“郟马五大调”的演唱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坐唱，另一种是群唱。

“坐唱”又称文场、雅场，多为玩友自娱自乐，或者职业艺人走阁串厢，受邀为雇主献艺时采用。演唱者通常1至3人，与伴奏人员围桌而坐。伴奏以三弦为主，其他乐器可视条件

和当时情况，适当增减。

“群唱”顾名思义，演唱及伴奏人员较多，大都出现在节日庆典、玩社火、闹花灯等大型活动场所。大家围拢在一起，或者站成横排，演唱者站立，伴奏人员就坐，即可进行演唱。

“郟马五大调”有非常别致的伴奏乐器和伴奏形式。演奏技法也风趣多多，别具一格。伴奏乐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品类：

弦索乐器：二胡、四胡、三弦、京胡、闷胡、京二胡、琵琶、月琴、柳琴（亦名土琵琶、小琵琶）等。

吹管乐器：大横笛、小竹笛、洞箫、笙等。

敲击乐器：碟子、酒盅、钱琴、檀板、竹板、撒拉机、碗、小花鞭（小花棍）、大花鞭（打花棍）、八角鼓、小鼓（皮鼓）、贯钟、小玲、小镣等。

这种伴奏乐队的配置，一改南曲仅入箫管，北曲只被弦索的局面，熔丝竹管弦于一炉，富有开创意义。特别是敲击类乐器碟子、酒盅的运用，遥接往古又别开生面，十分奇特。击碟而歌的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逢于扬州，曾于席间写下七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有“为我行杯添酒饮，与君把盏击盘歌”的诗句。这可能是击盘而歌的最早记载。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第二十卷“伎乐”一节，记述“嘌唱”时说：“……若不上鼓面，只敲盏儿，谓之‘打拍’”。可见至晚南宋时的杭州，说唱艺人们已经用敲击“盏儿”，来掌握节奏了。由此两例，足证所谓“郟马五大调”充溢古声古韵，言之不虚。

与南宋杭州说唱艺人不同的是，“郟马五大调”伴奏乐队中的碟子、酒盅，并非单用来击打节奏。它虽然因为打不出七个乐音符号，不能单独使用，但却能以疾、迟、钝、挫、轻、重、缓、急等手法，烘托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情感。因之，从手的夹持到用箸击打，都有一整套方法和技巧。如操碟姿态，须随演唱节奏轻轻摇动，如“风摆荷叶”。击打声音则有“珠落玉盘”、“泉水叮咚”、“蜻蜓点水”、“海底捞月”等招数。酒盅亦有“凤凰点头”、“百鸟齐鸣”、“野鸭抖水”等摇、碰、撞、击的招式。清代李斗在他的《扬州画舫录》一书中，曾对在扬州盛极一时的“小唱”（即“扬州清曲”“郟马五大调”之类的俗曲）作过如下记述：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纽丝》、《四大景》、《倒板桨》、《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篮》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有于苏州虎丘唱是调者，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郑本玉，仪征人，近居黄钰桥。善大小诸曲，尝以两象箸敲瓦碟作声，能与琴筝箫笛相和。时作络纬声、夜雨声、落叶声、满耳萧瑟，令人惘然。

当今“郟马五大调”的乐队配置与演奏，与上述记载相合，说明这种乐队伴奏形式，由来已久并且曾经流行一时，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郟马五大调”的乐队伴奏，与其他说唱艺术最大的不同是它不那么正襟危坐，不那么拘谨，比较自由灵活。“群唱”时，除操作吹管乐器的人员不能伴唱外，其余人员都要尽可能做到一边伴奏，一边伴唱，还要一边小幅度舞动身躯，以表达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狂欢尽乐的情趣。

三弦是“郟马五大调”的主要伴奏乐器，并以三弦的定弦法定调。郟城县城用老定弦法，合、四、工（5 so、6 la、3 mi）。马头则用新定弦法，上、六、仕（1do、5so、do）前者“合”音高等于c音，后者“上”音高等于e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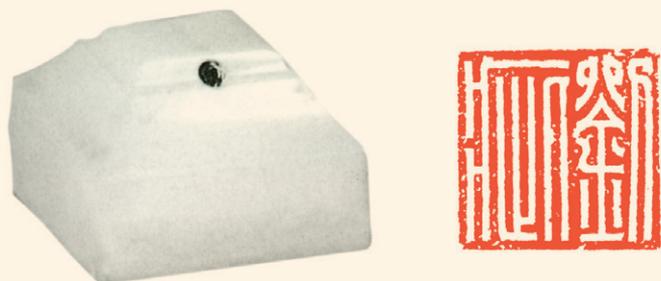
刘疵墓出土西汉独特的金缕玉衣

徐淑彬 徐 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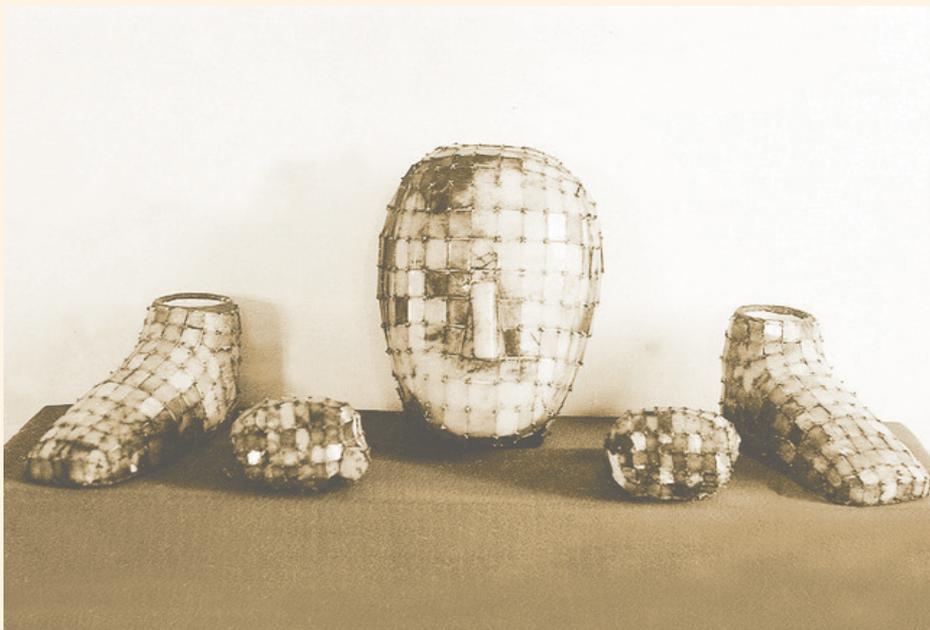
临沂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具全世界独特的金缕玉衣——西汉刘疵墓出土的金缕玉衣。该玉衣以头套、手套、脚套的形式出现，形制独特，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成为临沂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经多次参加中国文物精品展览到世界各地展示。

一、刘疵墓出土了金缕玉衣

1978年5月，在距临沂城北十公里的岔河公社（今南坊街道）洪家店村砖厂取土烧砖过程中，发现了一座塌陷的古墓葬。原临沂地区文物组在临沭县博物馆的协助下，对位于洪家店村西北的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为石椁、木棺、单葬。椁周用不规则的块石垒成。因年久淤积，木漆器等随葬品均已腐朽，仅有残漆片、奩、盘、耳杯等器物尚可辨认。漆器上面写有“当道北里”隶书四字。墓圻南北长5.5米、东西宽4.2米。棺室南北长2.3米、东西宽1.3米。棺盖北端放置玉璧一块，已被盖石压毁。棺内尸骨无存，石板下有一套包括头、手、足五个部位的金缕玉衣。头罩北向，正南北，从头罩到脚罩，长1.8米。尸骨的左右两侧随葬有三把铁剑，头部两侧还有铜弩机和80多枚“半两”钱。胸部有残破玉佩两件，右手执一玉佩；腰部靠近右手套处有玛瑙质印章一枚，阴文篆书“刘疵”二字。估计这个印章应该是墓主的私印。墓内还出土了镶嵌金银宝石的车马饰件。根据墓内随葬品的综合研究，这个墓葬属于西汉武帝以前的汉初时期。仔细检索古文献，



“刘疵”玛瑙印章



五件套金缕玉衣

却没有找到墓主刘疵的相关记载。推测刘疵似应为西汉皇室的远支成员，属于乡侯一级，应该没有资格使用全身的金缕玉衣，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特殊形制的五件套玉衣。从玉衣使用金丝连缀来看，墓主应该是男性。墓内所随葬的4件兵器也倾向于男性。

二、关于金缕玉衣

古代中国人相信，冰凉润泽的玉石能防止尸体腐烂，于是，常把玉塞进或盖在死者身上，到汉代更发展到用玉片做成玉衣，装殓死者。

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幕”、“缀玉衣服”，到三国时曹丕下诏禁用玉衣，共流行了400年。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

汉代皇帝和贵族，死时穿“玉衣”（又称“玉匣”）入葬。“玉衣”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起来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帝王级）、“银缕玉衣”（诸侯王级）、“铜缕玉衣”（公侯级）。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出土玉衣有几十件。有明确考古记录的西汉墓葬共有18座，而金缕衣墓只有8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整件玉衣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时，轰动了国内外的考古界。解放以来，汉墓中所发现的玉衣基本都已复原，其中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绡的二件、定县西汉中山孝王刘兴的一件、江苏省徐州东汉彭城靖王刘恭的一件、安徽省亳县东汉末年曹操的宗族曹某的一件，已经完全复原。以满城汉墓的二件为例，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重1100克，窦绡的玉衣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克，其制作所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为

此，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这里的工匠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十多道工序的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位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线相连。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作殓服，且使用九窍器塞其九窍，可谓费尽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用金缕玉衣作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王帝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制作一套“金缕玉衣”是十分不易的。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玉料，通过一道道的工序把玉料加工成为数以千计的、有一定的大小和形状的小玉片，每块玉片都需要磨光和钻孔，大小和形状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编缀玉片还需要许多特制的金丝。由此可见，制成一套“金缕玉衣”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

三、刘疵墓出土的金缕玉衣

刘疵墓出土的金缕玉衣，由面罩、手套（两只）和鞋（两只）组成，分别套罩在头部、两手和双脚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只有脚套、手套和头套而没有四肢和上身的玉衣。玉衣由黄金线与1140块青玉片缀成，玉片质地良好，光洁细腻，厚度0.1~0.2厘米，四角均钻有小孔。缕衣头罩高29厘米，顶部缀有一较大环形玉片。手套皆作五指形掌状，各长15厘米。脚套为齐头平底鞋靴状，左长27厘米，右长28厘米。玉片以长方形为主，磨制得很薄，质地晶莹细腻，每片玉片的角和边缘都钻有为穿系而制作的小孔，玉套用金丝以十字交叉式连缀而成。有些玉片的背面还残留有装饰性纹理图案，说明这些玉衣片是用旧的玉器改制加工的。

近年来，有人认为刘疵墓发现的金缕玉衣是西汉早期的初始形制，其实不然。这套玉衣不过是因为刘疵没有被正式封王的原因，所以才不能使用全身的金缕玉衣。即使这样，他也有可能僭越了汉代的礼制。还有人认为，墓主刘疵可能是女性。但只要认真看一下墓葬里面的随葬品，主要是以兵器为主的，而且所用连缀玉片的是金线，结论就不会是女性了。



汉画像石上的“龙” 及其折射的社会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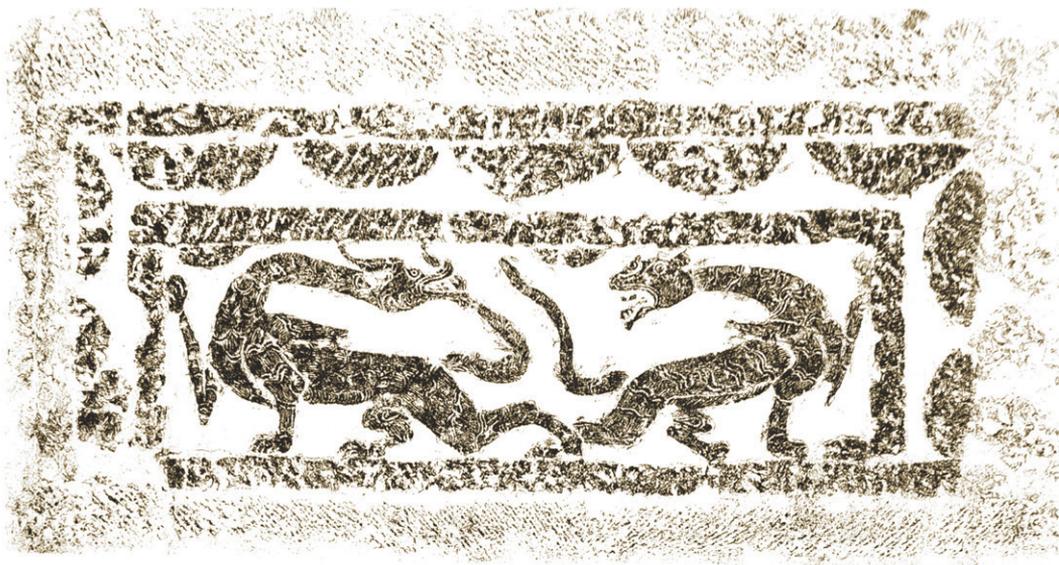
桑玉厚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石阙或山崖上的以石为地、以刀代笔的石刻艺术品。汉画像石是汉代尊崇孝廉、讲究厚葬习俗的产物。汉画像石上的题材内容涉及天文星象、历史故事、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祥禽瑞兽等，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各方面情况，更弥补了历史文献的不足，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一幅幅详尽的图画。

汉画像石上龙的形象随处可见

龙是中国人幻想且加以神化的产物。龙是蛇类爬虫图腾的综合体，是中国人幻想且加以神化的产物。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有了龙的概念。龙的形象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盆上有龙的形象。1987年河南省濮阳县城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被考古学者验定为“中华第一龙”。先秦时期龙已成为人们心目中受到崇敬的神物。商周青铜器、玉器中有大量的龙的图案，表明在当时人们的信仰中，龙已成为神灵。在原始社会，龙是超自然力的象征和整个社会的共同精神支柱；到了奴隶社会又转化为统治者一姓祖先。至汉代，龙开始明显的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史记》中曾载，汉高祖刘邦是个龙种，其母刘媪梦与龙交而生，故刘邦喝酒的时候，头常显龙形。于是龙成了皇权的象征，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皇帝的子女称为“龙子龙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统治者三令五申，专龙权于皇家，民间不得使用。

龙的形象因时代的发展而形态各异。有的说龙细长有四足，马首蛇尾；有的说龙身披鳞甲，头有须角，五爪。《说文·十一》曰：“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广雅·释龙》曰：“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



龙虎斗

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汉人王符言龙为“九似之物”，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是以蛇为主体，接受了鳄类的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绩之事》云：“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龙的形象分为三个时期。龙的形象的分期：战国以前是早期，汉代是过渡期，六朝以后是晚期。《山海经》中的龙还没有变成后人想象中的龙，还没有变化无穷的本领，而只是神人的役畜，其形象也比较简单，除头上有角、颌下有须、上下唇反卷之外，同一般兽无多大区别。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汉代龙的形象是以兽身为主，主要特点是龙的躯体较短，似虎又似马，颈长尾细，颈、躯干和尾部分区别非常明显，同后来的已有相似，但大部分图像的龙身子没有后来那么长，有的继承战国时的手法，比较像一般的兽，有的则身体似蛇躯，有鳞甲，鸡爪，长尾，形如后代的龙的形象。南北朝时期，龙的形态特征为修长洒脱、奔放活泼，身躯比汉代拉长，走兽的形态逐渐削弱，蛇形增多，但尾部仍近虎尾，行走如云。头扁且长，出现双鹿形角，嘴角渐深，四肢出现肘毛，爪呈三趾。近代龙的特征是头没有南北朝时期的长，上唇向上弯，须发后拂，颈及尾臀部有火焰纹，尾上有毛，从基本造型上看仍是走兽形态，兽足、虎尾，其中身长、足、角基本保留秦汉遗风，头比南北朝时短，唇上弯，须发后拂，尾上有毛。

汉画像石上龙的形象具有多重寓意

其一，龙是“四灵”或“四神”之一，可以避不祥。龙是四灵——龙、凤、龟、麟之一，亦是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一。汉代人对于龙非常崇拜，汉画像石上随处可见龙的形象。汉画像石上常有二龙穿壁图，取“避”之谐音，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不仅如此，它还可以避不祥。《论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放妄集，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汉铜镜中也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的句子。

其二，龙是最大的祥瑞，可作为升天的乘骑。在道教中，龙被认为是“三轿”——龙轿、虎轿、鹿轿之一，作为上天入地、沟通鬼神的乘骑工具。古者神人多乘龙，龙可以负载他们来往于天地之间，人死后也可以乘龙升天。《周易·干卦》曰“飞龙在天”，“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山海经》一书中有“祝融乘两龙”、“夏后启乘两龙”等多处提及“龙”及“乘两龙”。宋玉《九辩》载：“左朱雀之茕茕兮，右苍龙之跃跃。”也说明了龙是一种可以飞升的神物。《淮南子·览冥训》载：“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应龙传为引魂升仙之神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人多乘龙，《大戴礼·五帝德》载：“颡项……乘龙而至四海。”《史记·五帝本纪索引》：“鼎成，黄帝乘龙升天。”《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龙是最大的祥瑞。《后汉书·襄楷传》云：“龙形状不一，大小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王充《论衡》云：“龙，潜藏之物也，阳见于外，皇帝圣明，招拔岩穴也。瑞出必由嘉士，佑至必依吉人也。”“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汉画中有许多乘龙升仙的图像，且常与羽人刻在一起，这充分体现了汉代的升仙思想。

其三，龙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吉祥内涵。《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国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崇焉。”《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有杀整夫，乃去南方，故南方多雨。”由此可见，龙不仅可作为升天的乘骑，还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吉祥内涵。民间遇旱年常拜祭龙王祈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应龙处南极，杀

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注曰：“应龙，龙有翼者也。”

传说龙生九子。龙生九子是指龙生九个儿子，各有所好，皆不成龙。通常用以比喻同胞兄弟性格、志趣各不相同。其实，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有至高无上地位，九是个虚数，也是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龙有九子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但是究竟是哪九种动物一直没有说法，直到明朝才出现了各种说法。“龙生九子”的一个说法是来自明朝李东阳的《怀麓堂集》，龙的九个儿子分别为：老大囚牛，性好音乐，今胡琴头上所刻之兽是其遗像。老二睚眦，性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老三嘲风，性好险，行似兽，可灭火，今殿角上走兽是其遗像。老四蒲牢，行似龙，性好吼，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老五狻猊，形似狮，性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老六赑屃，形似龟，性好负重，今碑座兽是其遗像。老七狴犴，形似虎，性好讼，故立于狱门，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老八负屃，形似龙，性好文，今碑两旁文龙是其遗像。老九螭吻（鸱尾），龙首鱼身，口阔嗓粗，平生好吞，殿脊两端的卷尾龙头是其遗像。另有说法为：老大赑屃，老二螭吻（鸱尾），老三蒲牢，老四狴犴，老五饕餮，老六蚣蝮（应为趴蝮），老七睚眦，老八狻猊，老九椒图，有的说法还把螭首、麒麟、朝天吼（狻猊）、貔貅也列入龙子之一。



方位神

龙在汉画像石上的形象造型

汉画像石上龙的形象很多，在临沂境内的汉画像石上，其形象表现亦多种多样。

其一，龙、虎出现在同一画面上。在中国历史上，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古人认为，“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龙虎相交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东汉时期，龙虎多表现为相嬉戏、相追逐的画面，表示阴阳和谐。

其二，双龙穿壁或五龙、七龙穿壁。壁，是尊贵的象征；龙，是权威的象征；二龙相交亦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双龙穿壁”中的“壁”一般为奇数，偶数罕见，且多为三壁，因为“三”是阳数、极数，即道教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壁”即多壁。亦稍有双龙穿五壁、七壁之汉画像石。

其三，二龙、四龙盘结、交缠或相随、相对。

其四，单独或与其它兽类作为祥瑞出现在同一画面上，或与虎作为方位神出现在相对应的二石上。

其五，在表现仙界的画面中，作为骑乘或拉车的工具出现。

龙是伟大的，因为它得到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尊敬；龙又是虚无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物质。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先贤澹台灭明

王庆全



澹台灭明（公元前512—？），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亦称澹台子羽，春秋末年鲁国武城（今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村）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从祀孔子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前西庑内。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少孔子三十九岁”，而东汉王肃《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则说“少孔子四十九岁”。按王肃所言，澹台灭明24岁之前即名闻于诸侯，似不大可能。现多数学者从《史记》“少孔子三十九岁”之说。卒年不详。

澹台故里武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文化曾经非常繁荣。早在公元前554年，鲁国大夫叔孙豹就在此筑城以御齐。据《左传·哀公八年》“王犯尝为之（武城）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的记载，其父和曾为武城宰的吴国人王犯是好朋友，说明澹台灭明出生于武城一个生活富足的家庭，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

据《论语·阳货》载，孔子的学生子游为武城宰时，提倡以礼义教人，用高雅艺术来教育熏陶民众。孔子来到武城，到处可闻弦歌之声，处处可见歌舞升平。“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孔子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治理武城有方，受到孔子的赞扬。《论语·雍也》载：孔子让子游推荐人才，子游回答说，“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子游）之室也”。意思是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为人做事不投机取巧走捷径，从不为公务之外的事情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来。说明澹台灭明是一个正直、诚信，做事讲原则，不投机钻营的人，此时在武城已小有名气。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澹台灭明长得不好看，想拜孔子为师，孔子认为不会有出息，还有点不想收这个弟子。经子游推荐，澹台灭明成为孔子晚年收留的一名学生。

澹台灭明拜师孔子后，刻苦学习，终于学有所成。他后来南游长江流域，设坛讲学，追随的学生有三百人。他建立的教学管理制度，影响甚大，成为名闻大江南北的教育家。他为人处事之获取、给予、离弃、趋就的一切作为都无懈可击，声誉传遍了四方诸侯。“既已受业，而退修行……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家语》说他办事廉洁，对上司尽力，为民谋利，“贵之

不喜，贱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于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对于其品貌才能，古籍记载不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而《韩非子·显学》说他有“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则称“有君子之姿。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还有“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的记载。

另外，各书对“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理解也不相同。在文人的墨迹中，关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方面的谈论也不少。如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在谈到张良的相貌时，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东汉王充在《论衡·骨相》中谈到形与实的关系时说：“禀气于天，立形于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实也。”他说应该是见其相貌而知其德才，可是有时也因“法术浅”而“不能具见形状之实也”。随之就举孔子的例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也”。可见，后人已把澹台灭明看成是个才高貌丑的典型人物。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澹台灭明“仕鲁，为大夫”，不知可靠性如何。汉代以后，随着孔门弟子不断受到官府的祭祀和封赐，民间开始流传许多关于澹台灭明的逸闻传说。其事迹载于西晋张华的志怪小说集《博物志》、东晋干宝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搜神记》等书。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及后代诸书时有引文。宋代《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引魏宋均注《论语摘辅象》曰：“澹台灭明跋掌（六根手指），是谓正直。”《博物志》卷七载“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中流，阳侯波起，两蛟挟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剑击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跃而归之，子羽毁而去”（《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引《博物志》同）。唐代《昭明文选·吴都赋》李善注，引《搜神记》“澹台子羽赍璧渡河，风波忽起，两龙夹舟。子羽奋剑斩龙，波乃止。登岸，投璧于河，河伯三归之，子羽毁璧而去。”同样的事，北魏《水经注》卷五所载较详：“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挟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辄跃出，乃毁璧而去，示无吝意”（《太平御览》卷六十一引《博物志》同）。其所谓“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便是“取与去就以诺”。可见古儒如子羽者好勇尚义，类于墨而近乎侠。

另《博物志》载子羽的儿子溺死事，异文颇多。《博物志》卷八载“澹台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灭明曰：‘此命也。与蝼蚁何亲？与鱼鳖何仇？’遂使勿葬。”（宋代《图书集成》学行典卷一百五十四圣门诸贤部、礼仪典卷九十九丧葬部引《博物志》同）《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六引《博物志》：“澹台子羽渡水，子溺死。将葬之，灭明曰：‘此命也，吾岂与蝼蚁为亲戚，鱼龟为仇讎？’遂以葬之。”前者“使勿葬”，后者“以葬之”，似相牴牾，且“欲葬之”、“将葬之”，主事者谁？皆省而不书。又《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六引《博物志》较之为详：“澹台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将葬之。灭明曰：‘此命也。吾岂与蝼蚁为亲、鱼鳖为仇？’于是，遂以水葬之。”谓别人将葬之，而子羽“以水葬之”，说得明白，也较符合子羽“蝼蚁何亲”、“鱼鳖何仇”的话。另《昭明文选·笛赋》李善注，引《博物志》“澹台灭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蝼蚁何亲？鱼鳖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对曰：‘生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图书集成》家范典部卷十八父子部引《博物志》亦曰“溺死于江”）。“不收葬”即与“水葬”无悖，其要在俭，近于墨家。“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而葬之”，与子羽“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相合，未知其实，或为附会。而“生为吾子，死非吾鬼”，于礼似无悖，而亦如斩蛟事迹，截然若侠者。

又《史记·儒林传》载：“澹台灭明居楚。”未载“家于楚”或“卒于楚”，澹台灭明



江西南昌
澹台灭明墓

何时何地去世，现已无法考证。但他去世后，后人争相立墓以祀。墓共四处，即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苏州吴县、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县）、武城。相传，澹台灭明游历楚国来到豫章，选择在百花洲（今南昌市东湖一带）结草为堂，开办学校，聚徒讲学。死后，南昌人民为他立祠立墓祭祀，并设立澹台门以表纪念。进贤县也因他南游讲学至此而名，意为“进能纳贤”之地。苏州吴县建有澹台湖公园。《吴地记》载：“澹台湖，在吴县东南十里。孔子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宅陷为湖，湖侧有坟。”《水经注》卷二十二载：“《陈留风俗传》曰：陈留县裘氏乡，有澹台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祷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未知孰是？”澹台故里武城澹台墓位于平邑县魏庄镇土桥村西300米处温凉河边，当地流传“澹台墓，离河十八步。”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费县关阳司建二贤祠，主祀曾参、子游。清乾隆三年（公元1766年），关阳司巡检胡世祚将澹台灭明由从祀改为主祀，并将二贤祠更名为三贤祠。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督粮道孙星衍同费县知县郭志青立墓碑一座于澹台灭明墓前，碑文隶书，由清代书画名家钱泳书丹。1972年，澹台灭明墓在农业学大寨中被整为平地，墓碑已不存。

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东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明帝纪》）。从此后，包括澹台灭明在内的孔门弟子，就不断受到历代官府的祭祀和封赐。唐代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澹台灭明为“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追封为“金乡侯”。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改称“先贤澹台子”。



一颗光芒四溢的彗星

——王思玷的生平及其影响

靖一民



上世纪20年代初期，有一位名叫王思玷的青年作家，在由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七篇小说。这些作品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为描写对象，以全新的表现手法再现了“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得到了茅盾先生的高度称赞。然而，他却似夜空中一闪即逝的彗星，很快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茅盾先生在提到他及另外几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时，曾十分惋惜地说：“这几篇小说的作者像彗星似的一现不见了”，虽然他“留给我们的很少，可是单单这少数几篇，也就值得我们再来提起了。”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尽管国内出版的许多重要小说集中都收入了王思玷的作品，但作者的身世及其在文坛突然消失的原因，却极少有人知道。在这里，笔者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作一简略介绍。

一、王思玷生平考略

王思玷，原名王思瓚，曾用笔名王一民（王亦民），1895年出生于苍山县兰陵镇西南隅。其曾祖名王晓荣，字春旭，系清朝的举人，任过知县，为官清正（参见《临沂县志》卷十）；祖父王绍翀，庶出受歧视；其父王赓庸，一生勤俭，无功名，有地200余亩，在当地属中小地主。

王思玷自幼酷爱文学，受学于清末秀才王思颖（系当地塾师），后来受同代文学先锋的影响，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他生活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深切痛恨反动的北洋政府，同情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农民。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自愿在兰陵小学任义务教员，而不要任何报酬。在教学时，他常以“怎样做一个人”为题，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使忧国忧民的王思玷受到鼓舞，他不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文人的作品，还经常给他的学生讲鲁迅、茅

盾、郁达夫等文化先驱的作品，宣传自由和民主思想，鼓励学生们长大后要为救国救民做贡献。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还成为著名的革命家和作家，如田兵、王秋岩、孙立晨等革命前辈，都曾王思玷的学生。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他不但自己募捐，还发动别人参加募捐，并将兰陵小学作为当地的募捐大本营。

1921年，《小说月报》在第12卷第5号上以“风雨之下”为题，征求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诗。王思玷闻讯，立即投笔参加。他怀着一腔孤愤，写下了处女作《风雨之下》，以第一人称的笔法叙述了混乱世事给农民造成的灾难，控诉了北洋政府统治下农民的疾苦。小说在当年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上发表，被评为入选的优秀作品。此后，他又连续写了六篇小说，均发表在茅盾、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这些作品，不但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而且得到了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另外，他还写过许多散文、诗歌，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鲁南时报》上，在当地广为流传。

1925年，国共两党积极酝酿北伐。兰陵有一个名叫袁永平的国民党人士组织起一支队伍，约有两万余人，被编为河南国民二军山东游击队第一支队，由袁永平任司令，组织起义，迎接北伐。王思玷认为救国救民的时机已到，毅然弃笔从戎，在袁部任参谋之类的小官。但他很快发现，参加起义的人员多是纪律松弛的农民和被吸收的军阀残部，内部思想混乱，起义的目的也不明确。因此，他力劝袁永平不要急于求成，应先整顿队伍，筹备粮饷，尔后再行动。但袁永平不听劝告，于1925年秋天率部攻打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盘踞的鲁南重镇临沂城。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起义军攻城胜利不久，便被山东军阀张宗昌、江苏军阀白宝山的部队击败。袁永平被诱降尔后被杀，王思玷则坚贞不屈，率残部继续转战于苍山与临沂一带，1926年秋天不幸被反动武装杀害，时年仅31岁。他的死，无疑是新文学运动的一次巨大损失。新中国成立之前，鲁南根据地的民主政府曾追任他为革命烈士，并发放抚恤金给其妻子，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解放后便无人过问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王思玷的名字和业绩几乎被世人遗忘了。但十年浩劫仍没放过他，造反派们掘墓破棺，毁坏了他的坟墓，至今尸骨皆无。他的妻子也历尽磨难，于1974年离开了人世。“文革”之后，王思玷的亲属们一直想修复他的坟墓，因各种原因，直到2001年，他的家乡才为他修复了坟墓，并为他立起了一尊高大的塑像。

王思玷生有一女，名王缤和，解放前随夫南下，后在台湾任教员。他还有一养女名王绘和，嫁给了枣庄市峄城南乐庄一户姓孙的农民为妻。王思玷排行居二，其兄王思璞与其弟王思瑕曾将王思玷的所有诗文抄成一集，将其中一部分诗稿经山东文化界老前辈杨希文转交给抗战时我党领导的山东某家报刊，后下落不明。

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应该说王思玷是一颗明亮的星。他的溘然消失，令人惋惜，堪可悲矣！

二、王思玷小说的艺术成就

王思玷一生写了多少文学作品，我们已无从查考，目前能够见到的，只有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七篇小说。这些小说的篇名及刊载时间分别是：

《风雨之下》（1921年9月·载12卷9号）

《偏枯》（1922年11月·载13卷11号）

《刘并》（1922年12月·载14卷2号）

《归来》（1923年5月·载14卷5号）

《瘟疫》（1923年12月·载14卷12号）

《一粒子弹》（1924年7月·载15卷7号）

《几封用S署名的信》（1924年8月·载15卷8号）

从《小说月刊》的发表时间可以推算出，这些作品大约写于1921年至1924年间。茅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我记得他的稿子都是从枣庄寄的。”由此可见，这些作品均是在鲁南写成的。据王思玷的侄子王伦和介绍说：当时兰陵没有邮局，只有一个代办人负责寄平信，若寄挂号，就只好到别处去。王思玷在枣庄有亲戚，经常走动，所以他到枣庄寄稿子也就很自然了。

这几篇小说，比较真实地描绘了上世纪20年代初期鲁南农民的痛苦生活，愤怒地谴责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疾苦，活灵活现地塑造了几位贫苦农民形象，被茅盾先生称赞为“活的人生图画”。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很少写出真实地反映民众生活的作品。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思玷与另外几位青年作家一起登上了文坛，奉献出了几篇从题材到艺术形式全新的文学作品，给新文学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所以茅盾先生兴奋地说：“他们的作品……我以为有值得注意的两点，就是在题材方面不是单调的学校生活和恋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创造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以茅盾先生最喜爱的小说《偏枯》为例，谈谈王思玷小说的艺术价值。

这篇小说大约写于1922年秋天，全文约4000余字。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暖风染绿枝头的春天，有一个名叫刘四的“苦人儿”得了半身不遂病，“失去了一切举动的自由”，也就不能抚养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了。他的邻居张奶奶是位心地善良的好心人，为了帮助刘四一家渡过难关，不至于被饿死，热心当中间介绍人，把刘四的大儿子卖给庙里当和尚，并让刘四的妻子带着二儿子给地主当奶妈，张奶奶则将尚未断奶的三儿子抱去抚养。作者在讲述这一悲惨故事时，并没有设置离奇的情节，而是在淡淡的叙述之中推动情节的发展，将主要笔墨用来展现贫苦农民的善良品格，以极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心理”（茅盾语），从而较深刻地揭露了北洋政府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用血与泪的事实控诉了残暴的军阀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命运，成为上世纪20年代初期千百万农民的痛苦缩影。

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取得的成就，也值得我们加以研究。作者以深沉而含蓄的艺术风格，用白描的叙述手法，将一个本来错综复杂的悲剧故事，仅仅用几千字就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不能不让我们惊叹作者创作技巧的完美。同时，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颇见功力。如小说中塑造的刘四的妻子这一普通妇女形象就是很成功的。当着不公的命运逼她卖掉儿子然后去另寻生路的时候，她非但不埋怨无法养活全家的丈夫，而且临走之前还强忍着泪水给丈夫打麦草苦子，用家中仅有的一个鸡蛋给孩子烧煎饼汤。当刘四为不能养活妻儿老小感到愧疚时，她却恨自己的无能，安慰丈夫说：“这不是你的病累赘你，是我累赘你。”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伟大的母性之爱，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那是千百万鲁南妇女形象的高度概括，难怪茅盾先生在评价这篇小说的人物塑造时称赞说：“……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的）——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

另外，王思玷的小说语言，在吸收乡土语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搁上”、“累赘”、“怪好”、“难为”、“不出奇”、“应承”等等均是鲁南群众的口头常用词汇，把这些生动的乡土语言揉进小说里，不但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且也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特别是在当时用白话文写小说的人还极少的情况下，作者敢于大胆运用乡土语言写作，其意义则更加深远。

王思玷虽然是一位一闪即逝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是用当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也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三、王思玷小说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王思玷留给我们的作品并不多，但为什么茅盾先生说“单单这少数的几篇也就值得我们再来提起”呢？我想，除了王思玷在小说艺术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之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有直接关系。

早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文章，倡导“用白话文写文章”，虽有人响应，但为数极少，直到1921年，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仍沿用古文。1921年8月，鲁迅用白话文写出来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风波》，王思玷则于当年的9月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用白话写成的、真实反映农民疾苦的小说《风雨之下》。这篇小说在写作方法上“完全摆脱”了章回小说的影响，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活人的口语”，真切的表现了“活的人生画图”，这恰恰是当时文学作品所缺少的。虽然与王思玷同时代的作家殷夫、肖军等人的作品，在直面揭示人生艰辛方面要比王思玷深刻，但他们的作品则是1924年以后才问世的。由此可见，王思玷的小说从题材到表现方法都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他的作品受到茅盾先生及后人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5年，胡适、鲁迅、茅盾共同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这是一套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煌煌巨编，入选作品从艺术到内容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而王思玷虽然仅有七篇小说问世，却有三篇被选入该书（这三篇小说的题目是《偏枯》、《瘟疫》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成为广为流传的文章。同时，茅盾先生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用了千余字的篇幅对王思玷的小说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已极少有人提起王思玷的名字，但他的小说却没被世人忘记，国内出版社的许多重要短篇小说选都收入了他的作品。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联合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一书时，又选收入了王思玷的《偏枯》。由此可见，王思玷的小说是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时光不但抹不去他作品中闪烁着的思想和艺术光辉，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作品的认识价值也越来越高。

总之，王思玷虽然从事文学实践时间并不长，但他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杰出贡献，却是不应被历史忘却的；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也不容忽视。他像一颗光芒四溢的彗星，虽然一现就不见了，但他却用自己的才华织成艺术的火焰，闪射出了灿烂的光辉！

“乡村古堡”——湖南崖

奕焱、委实搜集整理

罗庄区双月湖畔，有一个叫湖南崖的村庄。据沂州志载，该村始建于北宋年间（约公元960年）。村子地势南高北低，那时如站在村南高处可北眺沂州城，因此得村名为“看沂官庄”。后因村庄邻湖太近，汛期常遭水患，即逐渐发展向南而村名改为“南移官庄”；明代以地处“泥沱湖”南岸而更名“湖南崖”至今。

一、“乡村古堡”史灿然

该村自建立1000多年来，历经风雨苍桑，朝代更替，期间百姓饱受兵荒马乱、土匪盗贼的骚乱和旱涝蝗灾之苦，民不聊生。明万历年间，有一个名叫钱鉉的安徽举人，随父北迁磊石，看到湖南崖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个好地方，于是他从磊石迁到湖南崖村落户。钱鉉出身书香门弟，精通诗文，年轻好胜。他了解了该村情况后，策划了垒围墙环绕封闭全村，阻挡乱人进村扰乱的方案，该方案确立后得到全体村民的响应。随后全村200多人上阵，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建起了周长8000多米、高6米的石头围墙，并在围墙东西南北方向建了九个哨门。哨门为二层楼，其中四个为三层楼，每个哨门楼顶层各配一门土炮，分别派人把守，白天放行百姓外出干活生计，晚上关闭。又组织百余人守卫，轮流值班放哨打更，在围墙根留有与各哨门相通的更道，如有情况，以鸣锣为号，集结村民手持大刀、长矛、铁揪等齐上阵。高高的围墙、严密的守卫，切实保障了百姓生活的安定。自明清时期，随着村民人口的增加，又多次对围墙及设施进行了维修加固，民国年间，村长王佃运带领村民又进一步扩大修整。在乱世中，对村庄的拱卫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邻近几个村如遇不测，即跑到该村躲避以求安全。湖南崖村经明、清和民国历史久远的洗礼，成为一座较坚固的防御城堡，在当地闻名遐迩，因此，被称为“乡村古堡”。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古堡”的人口也由1000多人繁衍近2000人。人口迅速膨胀增加，也带来了“古堡”的繁荣。到清代和民国时期，该村便有这样的顺口溜：周家肴肉李家粥，付家烧饼吃满城；钱家高桩馒头数第一，还有周家香烧鸡；李家何家杂货去赶集，黄家百货品种齐；……钱家开办烟酒铺，宋家包子叫满庄；钱家专卖香花生，李家葫芦花子糖；湖岸豌豆做凉粉，冬闲出门挣钱忙；白天学堂读书声，夜晚时时更声响；城南播种急，城北捕鱼忙；城东挖煤炭，城西开石塘……。可见该村曾经商业繁荣，热闹非凡。

二、“乡村古堡”倚三山

湖南崖三面环山，一面邻湖。三面环山简称“三山”，即城东为东山（岭），海拔89米；城西为西山（岭），海拔70米；城南为南山（也称石猴山）海拔120米。三山连绵几十里，但山上植被稀少，只有肉浆植物“旱莲”（俗称莲花盆）可以生长。三山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大炼钢铁高潮，政府组织了万人矿山开采大军，三年时间，三山矿石被开采殆尽。铁矿石主要供应付庄钢铁厂和临沂钢铁厂。开采后的三山，满山凸凹不平，面目全非。1965年后，政府组织在三山铁矿石渣上栽植了洋槐（刺槐）以改善生态环境，铁矿石渣正适应洋槐的生长，十年后，三山槐树生长良好，绿树成林。每年洋槐花盛开季节，鸟语花香，游人如织。丰富的槐花资源亦成了优质蜂蜜的生产基地，三山承现出一派秀丽的景色。夏日雨后游人赞曰：乡村古城倚三山，站在三山看蒙山，不远不近看艾山，近看莲花庆云山。山吻浮云云欲飘，云过青山秀姿娇。

三山中的南山，有美丽的传说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在山东北500米处，有一宋朝时期、坐南向北的将军陵墓，墓主人是驰骋疆场的一位战将，出征途经此地病死，时值炎夏，宋王御旨就地厚葬。陵墓前有一墓碑，陵墓正北百米处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四柱三门石碑坊，拾阶而上北行50米处，矗立着高10米、粗围二人合抱、东西相距10米的二根八棱石柱，石柱上分别蹲坐着精刻细雕、栩栩如生的朝天吼（百姓称石猴），面对泥陀湖湖台方向。陵墓、墓碑、石门、石柱、石猴浑然一体，均建在一条中轴线上。可惜这座陵墓及墓碑、石门、石柱、石猴均在文革中毁坏。

在南山脚下将军陵墓北，有一条东西大路，这条路是当年黑瓷主要产地朱陈、湖西崖以及山里果品等物资东去输往日照岚山、江苏赣榆、东海等地，再回头运回港口的海货、食盐等海产品的必经之路。每天路上驴驮、人推、车拉、肩挑，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派繁忙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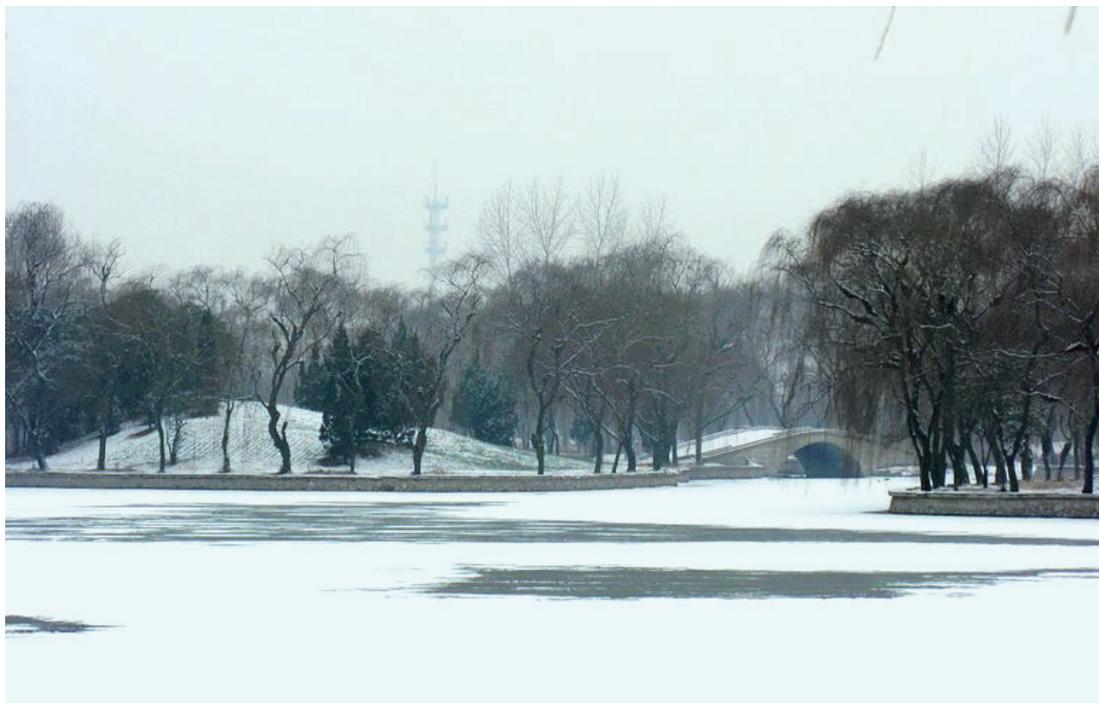
三山周边当年古迹甚多，如朱陈的宝泉寺、村南的土地庙、村东响马岭的窑神庙、八块石村的娘娘庙、湖西崖的火神庙、崔庄的青龙寺、崔莺莺坟、朱隆的兴隆寺等。每年庙会香火甚旺。现尚有崔庄庙会、八块石庙会延续至今。还有双月湖湖台、乾隆南巡观湖处、东北岭的石牛角，远离山湖的乾隆南巡驻扎地——黄土埝皇营行宫等古迹，这些古迹，历史上几经战乱，多数已荡然无存。

三、“乡村古堡”邻秀湖

村北邻有一湖叫泥沱湖。据《沂州志》载：泥沱湖位于沂州城南10公里，湖虽大旱而不涸，夏秋汛期，城南之水汇集南流，由于受东西南三山阻挡潴为大湖；还有一水系名为“川溪”，其水源源头在村西，南山与蝎子山之间，该溪水常年不涸，由西向东经古堡的西、南墙外各水塘，再向北注入泥沱湖。由于该水常年川流不息，因此而得名“川溪”，成为村子的天然护城河。

泥沱湖水下地质为溶岩溶洞构成，表层为黑粘土，遇雨人过而泥泞沾脚，古时取名为“泥沱湖”。

泥沱湖东起响马岭，西至余粮河，北起大白庄，南至湖南崖，方圆数十里，湖水汇集经余粮河流入南涑河。据《沂州志》载：泥沱湖水明如镜，一望无际，湖中盛产鱼虾、菱藕、芦苇、荸荠等，仙鹤、大雁、天鹅、野鸭、鸥鸟蓝天翱翔，水中戏嬉；湖心偏南，有一大石灰石溶岩旋窝为潭，水深九丈，水深而险，称之为“老龙潭”。湖水偏北有一圆洲，名为湖台，月夜泛舟，洲上香风袭来，花气拂人，宛如仙境。相传晋代琅琊王曾在此筑建亭台



双月湖冬景

水榭，辟为避暑之处，历代官府设王祥、王览和王羲之祭田于台上，免征税赋。泛舟湖中，月到天心，深望湖底，风来水面，鱼跃鸟飞，渔歌互答，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令人心旷神怡，如入广寒深处。

泥沱湖岸周土地肥沃，湖水丰荡，百姓捕捞耕作，一派繁荣景象。明代著名诗人舒祥曾游湖赋诗《泥沱月色》：

夜来银蟾印碧流，澄澄波低一轮秋。分明水府开金镜，仿佛天河浸斗牛。

宿雁不惊矶上客，潜鱼还避渚边鸥。渔朗隔岸相呼语，尽是芦花暗钓舟。

泥沱月色在明代就被列为“琅琊八景”之一。泥沱湖每当夜半晴空皓月，传说称，当时人从桥上往下看，湖中月亮有两个倒影，是因为两条小溪在桥下交汇时，水面有高低差，使水面形成夹角造成的，因这一奇观，才有了“泥沱双月”的说法。因此上世纪90年代后，泥沱湖又更名为“双月湖”。坐落于山色湖光之域的湖南崖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居住、旅游胜地。有诗曰：

春观槐花夏观荷，秋观鱼跃冬观雁。青山绿水天际远，满城灯火下客船。

如今三山已夷平，被一排排崭新楼房所取代。双月湖历经风雨苍桑、世代淤积，川溪等各水系淤积干涸，湖面也逐渐缩小，但湖虽小而精美景色不减，游人络绎不绝，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已成为人们游玩休闲的好地方……。在政府规划决策和建设者们的努力下，昔日的“乡村古堡”之域，现在呈现出一派高楼林立、交通便捷、工商各业繁荣，社区美丽洁净，环境优雅的新气象。

“七十二崮堪爱”

包勤



在沂蒙山区，随处可见一些姿态奇特的山峰，它们顶部平展开阔，峰巅周围峭壁如削，峭壁下坡度由陡到缓，远望如高山城堡，地质学上称为“桌状山”、“方山”，而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崮”。崮的形成要追溯到距今5亿—6亿年的寒武纪时代。那时沂蒙山区还沉浸在汪洋大海之中，海底有一个个突起的山地。风吹雨打，河流摆动等外力作用无时不在侵蚀着山地，经过千万年之后，逐渐降低成平原。当平原再遇地壳抬升时，再次被抬起，形成平顶的山地，从而进入新一轮侵蚀循环。崮就是新一轮侵蚀循环的残留物，平坦崮顶就是平顶山地的遗存，崮顶高度可以代表古平原的抬升高度，隐含了地壳抬升运动的重要信息。2007年，这种沂蒙山区特有的地貌被命名为“岱崮地貌”，它是我国继喀斯特地貌、张家界地貌、嶂石岩地貌、丹霞地貌之后的第五种岩石造型地貌，世界罕见。

(一)

沂蒙山区素有七十二崮之称，其实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不过极言其多而已。古代易学认为，七十二这个数字代表圆，是初生的先天基本数，大概人们为了取圆满吉祥之意，同时又为了表示数量繁多，所以才会对“七十二”这个数字比较偏爱，如孔子有七十二贤人、济南有七十二泉、孙悟空有七十二变、皇帝有七十二妃等说法，所以七十二崮也被流传下来。如果说绵延起伏的八百里沂蒙是一幅壮丽的画卷，那么兀立其中的沂蒙七十二崮无疑是这幅画卷中最靓丽的风景。当年陈毅

元帅转战沂蒙时，曾对沂蒙七十二崮大加赞美：“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

沂蒙七十二崮，崮崮有名，如以崮形模样命名的歪头崮、油篓崮、龙须崮、枕头崮、卧佛崮；以农家事物取名的锥子崮、剪刀崮、鳌子崮；以姓氏村号命名的刘家崮、姜家崮、朱家崮、牛家崮；以崮的作用和方位命名的晨云崮、瞭阳崮、透明崮、北岱崮、南岱崮；还有以传说人物、古文化遗址命名的孟良崮、晏婴崮、纪王崮、抱犊崮等等，所有这些命名颇具人文色彩。

沂蒙七十二崮，崮崮传奇，有的还见于方志，并一直在民间流传，使沂蒙崮更加富有灵气。纪王崮，据清道光七年《沂水县志·舆地》载，相传春秋时期，纪王“大去其国”，迁其都城居此，养兵蓄锐，以图东山再起。孟良崮，相传北宋时期，抗辽大将孟良在这里竖起除暴安良的大旗，操练兵马而得名。吕母崮，相传西汉末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军女领袖吕母在此揭竿起义而得名。龙须崮，崮中有巨壑，很像龙口，悬崖峭壁向两边蜿蜒，像龙的巨须，故名龙须崮，龙口中有两块巨石，一为石老头，一为石妈妈，石老头下有石孔，两边透明，俗称“孝子门”，传说是孝子才能钻过去。

(二)

在中国革命史上，沂蒙的山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岱崮保卫战、抱犊崮战役、龙须崮暴动等等都在这里发生。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在孟良崮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七十四师，击毙该师师长张灵甫，由此孟良崮而名扬海内外。陈毅元帅曾写了一首题为《孟良崮战役》的诗：“孟良崮上鬼神嚎，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我军个个是英豪，反动王牌哪得逃。暴戾蒋朝嗟命蹇，凄凉美帝怨心劳。华东战局看神变，陕北军机运妙韬。更喜雨来催麦熟，成功日近乐陶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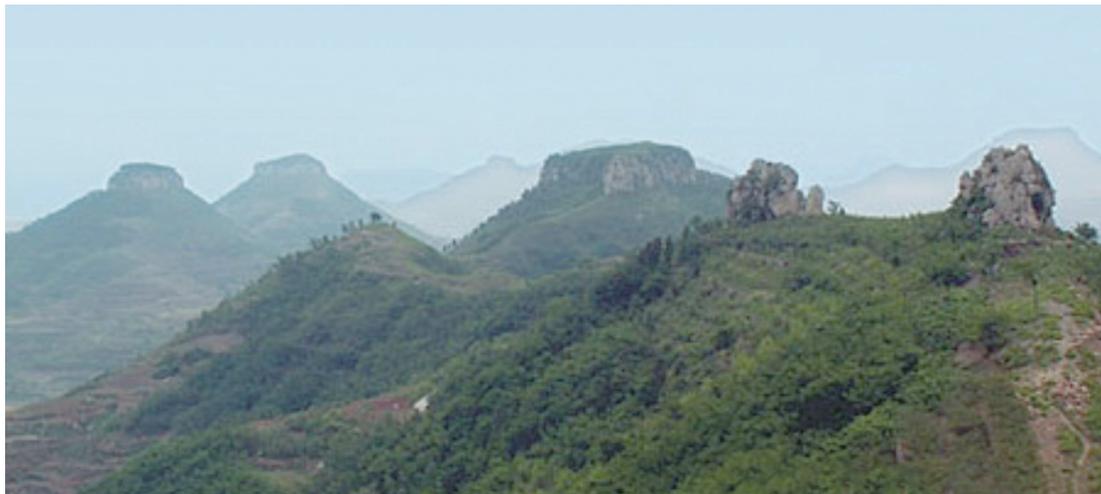
陈毅元帅说过：“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推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至今在瞭阳崮周边的道士海村，尚有陈毅领导革命的旧址。孟良崮下，还有沂蒙老区蒙阴县野店镇烟庄人民支援解放军的传说，英雄的沂蒙六姐妹为部队当向导、送弹药、送粮草、烙煎饼、做军鞋、护理伤员，支援前线，为此，1947年陈毅亲自命名“沂蒙六姐妹”；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也高度评价了沂蒙六姐妹在战争年代的贡献，并题词“沂蒙六姐妹，拥军情怀永不忘。”

安平崮，因附近群众多次在此躲避战乱而得名安平崮。安平崮至今流传着“崮乡红嫂”包丕菊和匪首斗智斗勇的故事。民国年间，蒙阴土匪猖獗，土匪占领了安平崮，当时县长多次派兵攻打，都未能成功，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包丕菊卧底走进土匪据点，摸清土匪据点位置，在包丕菊和游击队员的里应外合下，安平崮的土匪全部被歼灭。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拍摄地就是安平崮。

瞭阳崮，也是因附近群众在此多次安全躲过战乱而闻名。民国年间，土匪猖獗，附近村的所有人都在此避难，并以团瓢、草棚为居。现在为保护崮上历史文化遗产，当地东坪、板崮涯、上东门三个村的群众自发组织修路、架电、修复庙宇、保护石屋、石墙、石堡等遗迹，开发为旅游文化名崮。瞭阳崮上庙宇遗址颇多，有“三官庙”、“碧霞元君殿”、“玉皇庙”、“王灵官庙”等。每逢正月初九、九月初九、十月十五庙会时，崮上人山人海，香火极盛。此山由于有“碧霞元君殿”，当时的沂源、沂水、淄川等周边地区的商贾百姓，不愿去泰山而到瞭阳崮烧香祈福，因此有“第二泰山”之美誉。

(三)

蒙阴县岱崮镇是群崮簇集之地，因传说在其山顶可望见泰山，故名望岱崮，后简称为岱崮。在这方圆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地方，有南、北岱崮，大、小崮，水泉崮，龙须崮等30余座崮。岱崮地貌是经亿万年地质演化而形成的地质构造，现在，独特的岱崮地貌景观集风景旅游、生态旅游、农业旅游和文化旅游于一体，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而且还成为了响亮的旅游品牌。



岱崮镇连绵不绝的崮令人惊奇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老城区火力发电 西关外修建机场

临沂城从1924年开始才有电灯。1924年美国医院主楼建成后，从美国运来了X光透视机，因此必须要用电，故又从美国运来一部柴油发电机。从此美国医院开始用这部柴油发电机发电，只供医院和教堂使用，不对外。这是临沂人第一次见到电灯。

直到1936年，临沂才正式兴建发电厂。临沂城人王砥如从青岛买来了一部火力发电机，在今兰山区武装部（原唐家公馆）处建起了第一个发电厂。电厂所用煤炭从汤庄煤矿用牛车运来。发电只供照明使用，没有工业用电，故电厂称作“临沂电灯公司”。当时的政府部门、沂州路及南关大街上的主要商号、中学和师范皆使上了电灯。大街上也装了几个路灯。当年的元宵节还在大街上和电厂门口用彩色灯泡装饰了彩门，一时市民皆来观看，甚是热闹。公司开业后生意很好，但好景不长，就被军阀李占彪等人给霸占去了。日伪时又被侵略军霸占，1945年解放后电厂才回到人民手中。随着1947年我军的撤出，这座电厂也结束了使命。直到1951年才在沂州路的北头路西又建了一个发电厂，用的是当年北京西太后中南海的发电机。

临沂城人始见飞机是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杨虎城将军前来剿灭刘黑七时所用的飞机。当飞机在城上空飞过时，群众称其为“飞艇”。为了飞机降落的方便，1934年始在西关外修建飞机场。其位置在今蓝海大酒店的西南、苗庄村的东北。将这一片地推平，再用石碾压过，就成了跑道。当时来的飞机多是2型小飞机，1938年后被日军占用，常起落日军的军用飞机。1945年日本投降后，临沂城成了山东省政府驻地，前来谈判的“三人小组”经常乘飞机来临沂。为了满足需要，这时飞机场进行了一次大修和扩建。在北面建了五间候机室和三间服务室，屋顶上写有中英两种文字的“临沂”二字。1947年国民党军占领临沂后，蒋军的军用飞机又在此降落，万国救济总署的运输机也经常空运来救济物资。随着1948年临沂的第二次解放，这个飞机场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又恢复了耕田。

王思衍印谱留后世 陈伯熙书稿剩残篇

王思衍是临沂最后的进士。他在北京任刑部主事时寓于莫园。此间他刻了三篇印谱，其内容是：《太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陋室铭》、《盘谷歌》。庚子年他返回兰陵时带



王思衍《嚼雪斋印谱》

了回来。他将其印了一部分赠诸亲友，有的还亲自写上释文和刀法。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他携带这批印章来到临沂城，住在仁泰巷的蒋家。仁泰号的主人这时是蒋献符，喜爱书画，将王思衍待为上宾。这是仁泰巷蒋家的一次文人雅集，作陪的有拔贡狄建鳌、举人石鲁山、拔贡段鸿恩、秀才李宗仁、陈伯熙、刘宪邦……。一时蒋家文人荟萃，创作了不少的书画作品，而王思衍的这三部印谱也得以广为流传。王思衍最后一次来临沂城是为兰陵修桥募集资金。他在临沂商会标润格，给人家写了不少的精品，为兰陵修桥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形势紧张，临沂阻击战在即，他便返回了兰陵，而把全套印谱、印章留在了好友吴家。吴家一直保留到1964年才卖给“临沂文物收集组”。如今这套印谱藏在临沂市博物馆，成为临沂篆刻史上的重要资料。

老秀才陈伯熙，一生研究中医，喜爱作诗和著述。临沂1948年解放后，他成为县医院中医大夫，还当选临沂县人大代表。老先生感到欣逢盛世，于是将其珍藏的古版本《古玉考》、《明史》、《西清古鉴》等古籍全部捐给了国家，并将他本人的诗集和小说集《村翁曝言》也一同捐出。这些书籍当时都保存在文化馆。遗憾的是，1966年“文革”之后，这些古版本连同他本人的著述被一把大火烧光，幸存下来的只有老先生诗集中的附录、诗十首和被爱好者抄出的小说五篇。其诗是：《临沂城》、《录旧作再游临沂》、《临沂之游》、《叠前韵》、《五月一日再游临沂》、《南关》、《吃饭难》、《琅琊冢》、《集柳碑》、《与宗弟书》。小说是：《沐埠岭山神》、《红鳞姐妹》、《梦兰》、《井异》、《茶叶山》。

黉学庠门话儒学 考棚书院变学堂

从北宋的国子监到地方的黉学，皆是国家的正式学校，都是以儒家思想进行教学的，所以这些学校皆同孔庙在一起。临沂孔庙大成殿后就是黉学。保存到现在的明伦堂就是当年儒学的大讲堂，至今墙壁上还有“弟子规”等石碑。清朝规定只有考中了秀才的人才能称生员或学生，才有资格来此进修。没有考中秀才的只能称童生，还不能算黉学的学生。在此任教的当然都是教谕、教授等政府正式任命的人员。在此进修的生员经过考试后可以转为廪生，再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可成为贡生，保送到国家的太学去进修。光绪年间废科举后，将教授改称教习。学习内容改为现代学校所设的学科。民国后，黉学改为孔子庙小学，日伪时成为临沂中学的校址。解放后又办过各种学校，小学、幼师、中学（老九中、十二中和三中），直到三中迁出后才成为博物馆的馆址。孔庙的东侧有一巷名庠门里巷。庠就是古代儒学的称谓。临沂的庠门里巷的北端是孔庙的另一处建筑崇圣祠，大殿三间，内中供奉着孔子祖先的



临沂孔庙内的明伦堂

牌位和颜、曾、孟等贤人祖先的牌位。院中有棵大古槐。这座祠堂上世纪60年代被毁掉，现在只有庠门里这个巷名了。

临沂考棚是乾隆九年（公元1754年）由知府李希贤倡导建的，正式名称是考院，俗称是考棚。它位于今考棚街的中段路北（原京剧院的位置）。清末改为学堂，民国后改为中学。抗战前它是山东第五中学，故称老五中。日伪时被日军占用，1945年解放后成为大众舞台。上世纪50年代初又成为临沂师范的中学部。现在留存的一批当年考棚的老照片，大门、影壁、大堂、号房和后院，见证了当年考棚的真实面貌。

馍馍巷书艺传后世 西当铺末代一私塾

老城的西南隅有一巷，北接今兰山路，南到原胡家巷。此巷北仄南宽，名馍馍巷。巷的南首有一赵姓人家，出了个秀才名赵宝善。赵是进士刘淑愈的学生。刘被害后无人敢收尸，独赵宝善将其师买棺安葬。赵家民国时开始经商，但思想保守，不让子弟上“洋学”。为此，赵家在家中设了一处私塾，让子弟学习，其亲友的孩子也有去就学者。抗战前，赵家将在王思衍家教学的陈允升请到他家，这所私塾便兴旺起来。陈允升还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因此前来跟他学书法的人也不少。这期间陈允升留了不少的墨迹。重修五贤祠时的山门大匾“五贤祠”三字即由他所书。民国二十四年续修《临沂县志》时，书名也是由他所书。1938年日寇进攻临沂城，学校停办，陈允升也回农村避难去了。

日伪时，临沂城的私塾还有两所。一所在高台庙，但时间不长庙被鬼子拆毁，私塾自然也就停办了。还有一处在原西当铺。西当铺位于今孔庙的斜对过、兰山路的路南。有几户人家不愿子弟上日伪的学校，也不愿上教会的学校，于是在西当铺的三间厅房里办起了私塾。他们将居住在砚台岭村的一位举人刘树祯请来任教。刘举人当时已是70多岁，头上还留着一条辫子，穿着长袍。1945年日寇投降后，私塾便停办了。从此私塾这类学校在临沂城就永远地消失了。

语录塔烟消云散 高展馆保留至今

“文革”十年动乱，临沂城的古建筑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东岳庙、城隍庙、泰山行宫、

广济寺、井神楼皆被拆除。所谓“不破不立”，临沂城又增添了两处新建筑：一处是“语录塔”，一处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亦称最高指示展览馆，简称高展馆）。1966年“文革”开始后，各地皆“向毛主席献忠心”，推行“红海洋”和“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以表达“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于毛主席”的阶级感情。1968年，当时的地革委决定修建这两座建筑。“语录塔”位于今沂蒙路和解放路的交汇处十字路口的正中，它仿照的是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样子。塔身上四面皆是毛泽东的题字，塔座上四面皆是林彪的题字。当时是全城党政军各团体学校皆去“献忠心”，日以继夜地修建，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高展馆”与“语录塔”同时施工。它的位置是原南门瓮城东侧的三义庙，上世纪50年代建为曲艺场。“高展馆”对面的广场称为“红卫兵广场”。1972年8月，由于“语录塔”影响交通而被拆除。另外还有一座“忠字门”，位于沂蒙路宗岱门的位置，由于影响交通也同时拆除了，从此这两个建筑成为历史。“高展馆”后改为展览馆，经常举办各种展览，继续发挥着作用。



陈允升书“续修临沂县志”

孝悌临沂

——《二十四孝》探源之二

大荒堂主



(二) 负米养亲

负米养亲是二十四孝中的第四则故事，主人公是孔老夫子的得意门生仲由，位列孔门七十二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他做了介绍。书中说：仲由字子路，又叫季路，鲁国卞地人氏。家居郊野，比孔子小九岁。其性格粗暴，刚强直率，喜好逞强斗勇，帽子上插着公鸡的羽毛，胸前挂着野猪的牙齿，一副大无畏的样子，曾以轻慢的态度侮辱过孔子。孔子不予计较，用礼教感化了他。使子路心甘情愿拜孔子为师，并立下文书，虽死不悔。

这里说的家居卞之郊野，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集解徐广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今山东省莒县），徐邈之弟。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年，年七十四岁。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徐广说得很结实，其一，他家居附近，熟悉地方掌故；其二，家世好学，至广尤精。这就解决了个大问题，那就是仲由故里的位置，它不在卞邑城里，而是在郊野。平邑县仲村镇古代属于卞邑封地，位处卞之郊野，现地名仲村从字面上仍保留有与仲由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当地出土了古代仲由故里的残碑。我们可以确切的认定：仲由故里就是现今的平邑县仲村镇。

负米养亲是构成仲由人物形象的故事之一，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西汉刘向《说苑》卷三：“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裯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为亲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草木欲长，霜露不使。贤者欲养，二亲不待。故曰：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其后以抄袭杜撰而成的《孔子家语》中也有记载，与《说苑》大致相同。

负米养亲亦称为亲负米，许多人可能有疑问，子路家近卞邑，为什么要跑到百里之外负米？其实这与春秋时有些诸侯国实行的国家贷放制度有关，那就是“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管子·揆度》）。所以子路必须到达曲阜——鲁国的国都，才能找到借米的地



方，百里是概数，去借米，不是去余米，家里吃糠咽菜，哪儿有钱买米？

元代郭居敬编录《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时，将《说苑》中的“负米养亲”删繁就简，基本保留了下来，并添加了赞颂的诗歌，列为二十四孝之四。原文如下：

周仲由，字子路。家贫，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裯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诗曰：负米供甘旨，宁辞百里遥。身荣亲已没，犹念旧劬劳。

译成白话文就是：东周时期，有个叫仲由的人，字子路。家里很贫困，经常采集藜藿等野菜作为主食。为了让年迈的双亲吃上粮食，自己常常步行到百里以外的国都借米背回来。父母去世以后，子路到楚国游说，做了高官。出门前呼后拥，有一百多辆马车跟随；家中粮食，堆积如山；休息坐在厚厚的褥子上；吃饭时面前摆放了许多美味佳肴。子路想起贫苦一辈子的父母，深有感慨地说：“虽然希望再回到以前，吃藜藿等野菜，到百里之外的地方背回米来孝敬父母双亲，可惜没有办法如愿以偿了。”

孔子赞叹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无字碑

——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建园逸事

高雷



罗炳辉军长墓

历史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只是那摇曳着的背影。

临沂革命烈士陵园(1986年改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是1949年2月由中共中央华东局提议,山东省人民政府为纪念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牺牲的华东区革命烈士而建,为全省五处陵园(济南、青岛、徐州、烟台、临沂)之一,当时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筑委员会临沂分会,隶属山东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职工人数29名,主任邓月楼,当时人员实行供给制,办公经费由开荒(40余亩)种地自给。

邓月楼(1881—1966),名廷鉴,以字行,郯城县马头镇人。同盟会会员,实业家。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滨海专区及省高级参议室参议员。1949年3月任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筑委员会临沂分会主任。后任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和省文史馆馆员等职。为修建临沂革命烈士陵园(今华东烈士陵园)呕心沥血,功绩卓著。

临沂革命烈士陵园于1949年4月28日奠基,1950年7月下旬五大工程——纪念塔、纪念堂及罗炳辉、张元寿、刘炎墓主体完工。参加建设的有北京、河北、本省徐州和淄博的技术工人(工资每人每天秋粮20斤,来时路费按工发给),有本地的民工,还有劳改犯等。

中央拨付建筑经费秋粮790万斤(实际到账790.9362万斤),地方补助经费秋粮58万斤(实际到账58.7629万斤)。

1950年8月,临沂分会开始规划烈士陵园附属工程,征集、核对烈士名录并索求上级首长题词。按照规划烈士陵园应该为长方形园区,“但因陵园周围群众的坟墓太多(计60余塚),拟将东面坟墓多的地方方向里缩一点,形成曲背慢弯,西北角因靠公路,形成弧形。所占群众土地六亩余,拟由县府拨地赔偿”。对园区内的群众坟墓,地方政府动员了迁移,由于所占坟墓之地主均系临沂南关的贫苦群众,生活实属困难,无力自行迁移,每塚坟墓给予小棺材一口,

赔偿秋粮150斤。所以，陵园就形成了今天的园区格局。

期间，临沂分会奉省府指示雕刻赵搏、王麓水、符竹庭三同志石像。但后来陈列中并没有符竹庭的石像。我们现在只能依据材料推断，由于没有找到符竹庭同志的近距离照片，石像不了了之。

这种像谜一样的问题，在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建设中留下了许多。如：1950年9月10日临沂分会应山东军区政治部黄主任来信加洗烈士塔全套照片寄到莫斯科。为什么要寄给苏联？

1950年10月24日临沂分会致函省政府教育厅、大众日报社征集烈士遗物，准备修建烈士遗产陈列馆。烈士遗产陈列馆为什么没有修建？

而其中最大的悬案则是山东省党政军领导人对临沂革命烈士陵园的题词。从1950年8月14日起，临沂分会多次函告省府有关部门，征求首长题词，均没有回音。进入12月份，邓月楼先生去济南参加会议，传回信息，华东局、山东省首长题词由临沂分会提出意见。12月13日临沂分会答复：“塔上大碑由华东党政军机关题文或题词，五面小碑由陈毅、饶漱石、康主席、郭副主席、许司令各题一面，罗墓西面由康、郭主席题，北面由许司令、向明政委各题一面，东面刻墓志，刘墓西面由许司令题，北面刻墓志，张墓西东面由康、郭主席各题一面，北面刻墓志并提议要求制发建塔纪念章，及陵园前大门西大门题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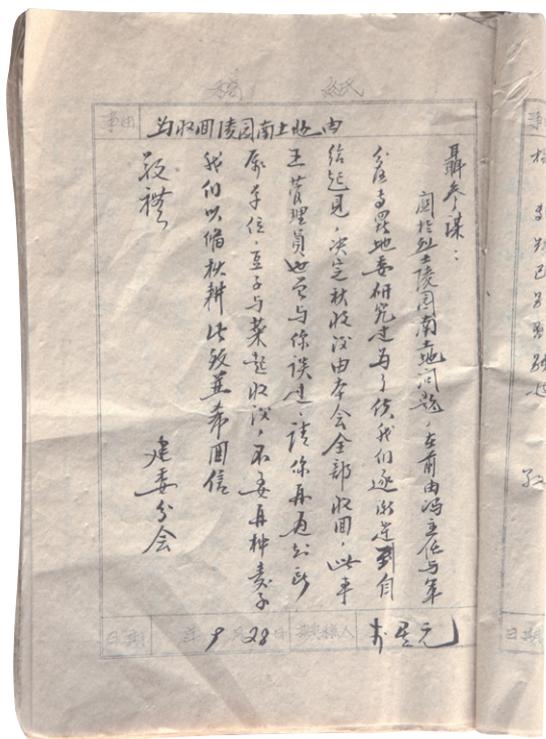
陈毅，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康主席为康生，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军区政治委员；许司令为许世友，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郭副主席是郭子化，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向明时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兼山东省政府副主席。

现在的问题是陈毅、饶漱石留有碑刻，而康生、郭子化、向明不可能不支持这项流芳千古的千秋大业，以建国初期的领导干部雷厉风行的作风，有交待就应有结果，花落何处？

残酷的路线斗争过早地降临了山东大地，或是这部分题词直接消失的原因，1952年初在“三反”运动中郭子化被诬陷，1954年向明涉嫌参加“高饶反党集团”，致使他们过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销声匿迹。所以空置无字碑达30余年。无字碑诉说的不是辉煌，而是无奈，今天的补白已经不是昨天的故事。

1951年清明到来之际，临沂城党政军机关、临沂师范、联师、银行、专卖局、中心卫生院、运输公司、花纱布公司、百货公司、山东药房、电信局、粮食公司、合作总社等单位的职工沐浴着荡漾的春风在陵园内栽下了几万株花木，奇花异木有的来自本地，有的来自南京中山陵园……。

或许是过于谦虚，临沂分会对自己修建的临沂革命烈士陵园的评价是这样的：“惟因敝会筹备过程急促，更加缺乏建筑技术工人，因而所建成之烈士塔、堂、墓式样不佳。”



临沂革命烈士陵园1950年公文底稿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

李兴河

蒙山是一座久享盛誉的名山，素有“九州之巨镇，巍然敦大观”，“东蒙山水甲天下，地灵人杰风兼雅”之誉，为历代游览养生胜地。秀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人文景观，深厚的文化底蕴，淳朴的风俗民情，为世人所瞩目向往。慕名而来者，难以数计。身临蒙山胜境，似览百里画卷，可以感受华山之险、黄山之秀、泰山之壮、长白之翠，妙处难以穷尽，令人叹为观止。充满诗情画意的蒙山，为诗词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诗材，也激发了作者澎湃奔涌的诗情，许多诗家词客，登临览胜，赋诗言志，创作了大量动人心魄的诗篇。咏颂蒙山的诗词，源远流长，代有佳作，美不胜收。这些作品，各立机杼，各具特色，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或写景，或状物，或述事，或咏人，或缅怀，或吊古，或抒情，或记游，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时空，反映了蒙山之美和诗人之情，为蒙山文化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亮点。欣赏这些华美的篇章，仿佛与诗作者一起漫游在蒙山如诗如画的境界，真正感悟到蒙山的博大精深，无穷奥妙，从而也能在思想上得到有益的启迪，在艺术上得到美的享受。

(一)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是较早登临游览蒙山的名人。孟子在《尽心》篇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宋朱熹《四书集注》谓：“东山，盖鲁城东之高山。”王澐《四书地理考》认为：“蒙山，正居鲁四境之东，一名东山。孔子登东山指此。”孟子把孔子登蒙山与泰山的感悟并提，应看作是互文，即是说，“小鲁”、“小天下”，是孔子登蒙山、泰山之巅后的共同感受。登高望远，览大意大。孔子登上蒙山、泰山之巅，眼界扩大了，襟怀开阔了，顿有所悟，感到天下与鲁国俱小了。这是蒙山赋予了孔子以新的情感，使其思想境界有了新的升华。自然，孔子对蒙山的热爱之情也会进而增益。当冉有、季路告诉孔子“季氏将有事於颛臾”时，他便气愤地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孔子强烈反对季氏伐灭颛臾，其重要理由就是颛臾为鲁国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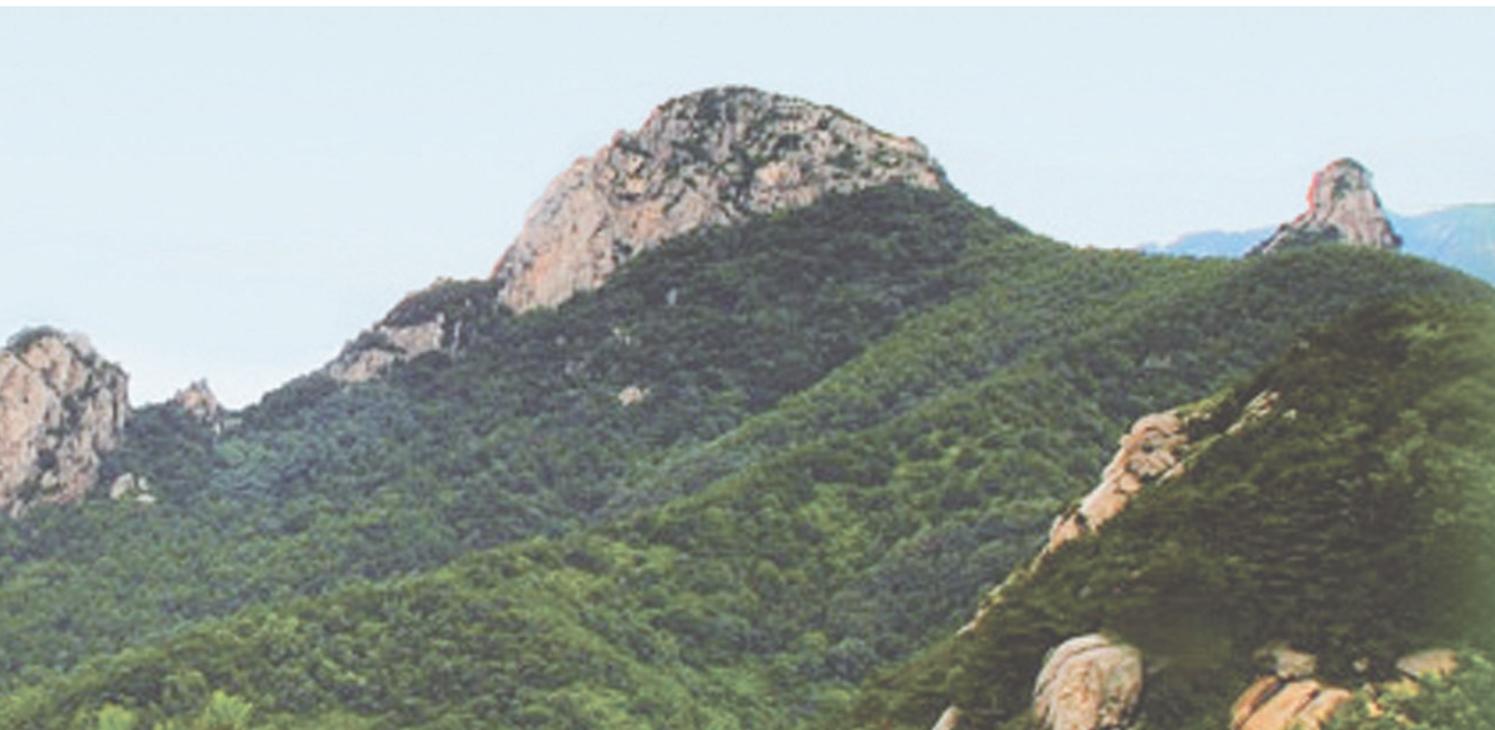
庸，是周王所封使之主祭蒙山。孔子登蒙山是否有诗作，无可稽考。不过，在由周王朝乐官所编辑、后经孔子加以重订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收录了与蒙山有关的诗篇。《鲁颂·閟宫》篇中说：“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诗作者把泰山与蒙山并提，两座名山都为鲁国人所仰望。泰山是鲁国与齐国的界山。鲁国因为据有横亘百里的蒙山，所以便占据了东面极大的地方，国境一直达到黄海之滨。《国风·东山》篇中所说的“东山”，在鲁国东境，即蒙山。这首诗所写的内容，据《诗序》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诗中写周公率部在蒙山一带征战三年，班师西归，雨中行军，思绪绵绵，叙述了战士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表现了战胜归来的喜悦之情。

(二)

在古代游览蒙山的诗人中，当首推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杜甫。他们二人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联袂来蒙山览胜寻访道友。他们畅游在蒙山胜境里，陶醉在朋友真情中。杜甫满怀激情，写下诗篇《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影闻寒杵，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桔颂》，谁与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景，而紧紧围绕一个“情”字。有对蒙山的情，有对李白的情，有对范十的情，有对小童的情，也有“悠悠沧海情”。杜甫仰慕李白的超群才华和诗品，更钦佩李白的人品，“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是杜甫的肺腑之言；“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样如痴如醉的感人举动，在历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一般同游者所做不到的，这既是他们被蒙山胜境所陶醉的生动再现，更是他们情同手足的真实体现；李白、杜甫远道而来，寻访隐居蒙山、脱俗绝尘的朋友范十，是这次蒙山之行的重要目的，“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三友相会，谈笑风生，吟《橘颂》，述情怀，兴致盎然，正是李白、杜甫与范十之





李白与杜甫

间深厚友谊的表现；“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正是李白、杜甫、范十三位好友的共同心愿和高尚志向。情语多于景语，情景交融，是这首诗的特色。杜甫对这次与李白同游蒙山一直铭记于心，时时回味。后来他在《昔游》诗中说：“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

李白、杜甫告别了老友范十，离别了蒙山仙境，又一起来到鲁郡东石门。在这里他们就要分别了，杜甫要西去兖州，李白要南下吴越。这又一次的分别，对于两位诗友兄弟来说，更是难舍难离。李白再也抑制不住感情地冲动，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风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李白对杜甫的兄弟之情，对蒙山的赞美之情，都浓缩在这短短的八句诗中。诗的一、二句，是写二人在蒙山览胜访友的情景，这与杜甫诗中说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意境是一致的。诗意中洋溢着对蒙山的流连和与杜甫同游的美好回味。诗的三、四句，写即将分别又实在舍不得离开的心情。暂时还没有离开，却又盼望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会，复杂的心情，诚挚的友情，真是难以言传。诗的五、六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这是写早晨在蒙山顶上远眺所见之景：一是秋波明洁的泗水，一是曙光闪耀的徂徕。作者特意选取“泗水”、“徂徕”来写，是因为“泗水”、“徂徕”都与李白、杜甫有密切关系。李白曾在徂徕山附近的沙丘城写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中说：“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白与杜甫在兖州时也一起到泗水滨游览赋诗。选取与二人关系密切的景物来写，自然更能引起对往事的美好回忆。诗的七、八句，是写这次在东石门依依惜别的心情。好友离别，仿佛转蓬随风飞舞，各自飘零远逝，着实令人难过。李白只有用宽慰的语言，劝老友干杯。全诗写景之美，写情之真，写心之诚，交相辉映，真能催人泪下。

唐代文学家萧颖士，兰陵人，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驱。他在因公事外出之时，途经家乡的蒙山，也借机游览了蒙山的山景，并写下诗篇《蒙山作》：

东蒙镇海沂，合沓百余里。清秋净氛霭，崖岬隐天起。
于逸劳往还，息徒暂攀跻。将穷绝迹处，偶得冥心里。
云气杂虹霓，松声乱风水。微明绿林际，杳窕丹洞里。

仙鸟时可闻，羽人邈难视。此焉多深邃，贤达昔所止。
子尚捐俗纷，季随蹶遐轨。蕴真道弥旷，怀古情未已。
白鹿凡几游，黄精复奚似！顾予尚牵缠，家业重书史。
少学务从师，壮年贵趋仕。方驰桂林誉，未暇桃源美。
岁暮期再寻，幽哉羡门子。

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一开头便写出了蒙山拔地擎天、绵亘百里、磅礴不凡的气势。接着写登山所见之景，诗人纵情地描写了山上秋天的自然风光。色彩绚烂，音响繁复，使人眼花缭乱。深邃幽暗的仙洞，鸣声上下的仙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在蒙山隐居修炼的一些高士。接着又写登山所感，面对这优美的环境，诗人触景生情，怀古思今，从而产生了一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情：既想追慕古人，来此隐居，寻仙访道，又不能摆脱对世俗名誉、仕途前程的留恋。全诗写景逼真，言情率直，颇有特色。

唐诗人许棠曾漫游齐鲁燕赵，饱览风光胜迹，写有不少登临的诗篇。在《送刘校书游东鲁》诗中写道：

内阁劳雠校，东邦忽纵游。才偏精二雅，分合遇诸侯。
暗海龟蒙雨，连空赵魏秋。如经麟见处，驻马瞰荒丘。

在诗中，他既赞美了朋友刘校书的才华，又特意提示朋友游东鲁时应当游览的景观名胜，其中，“龟蒙烟雨”就是应当观赏的一大奇观。“暗海龟蒙雨，连空赵魏秋”两句诗言有尽而意无穷，自然会使人想象到蒙山横空出世、群峰连绵、云海苍茫、烟雨如织的万千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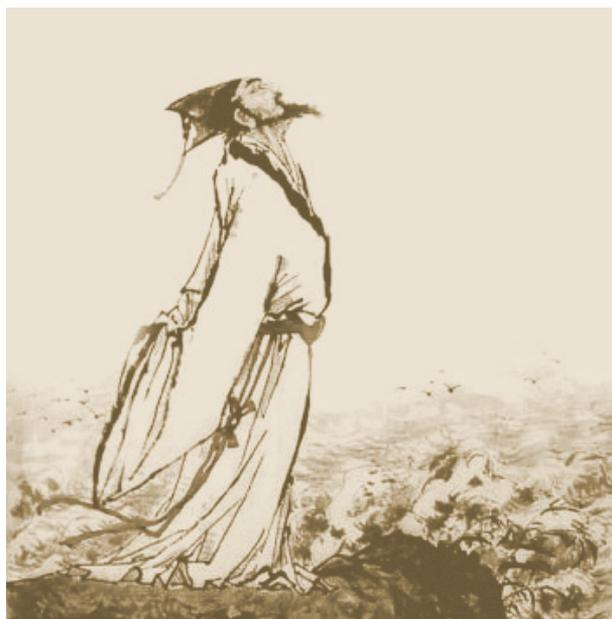
(三)

北宋文学家、诗人、书画家苏轼于熙宁七年至九年（公元1074年~1076年）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期间，曾到蒙山寻访道友，游览景胜。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十二月，苏轼在京师遇见在蒙山拜师学道的友人乔全。苏轼怀着对友人的眷恋之情、对贺亢的仰慕之情、对蒙山的思念之情，写了《送乔全寄贺君六首》。诗前有“叙”，交代了作诗的缘故。“叙”说：“旧闻靖长官贺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圣皇帝东封有谒于道左者，其谒云：晋水部员外郎贺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阅谒，见之大惊，物色求之不可得。天圣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诣阙进佛道像，直数千万张。公安道与澄游，具得其事。又有乔全者，少得大风疾，几死，贺使学道，今年八十益壮盛。人无复见贺者，而全数见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来京师十许日，余留之不可，曰：‘贺以上元期我于蒙山。’又曰：‘吾师尝游密州，识君与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诗以送之，且作五绝句以寄贺。”“叙”中说的“贺水部”，是唐末五代石晋水部员外郎贺亢，淡泊名利，入山修炼，在蒙山得道长生；乔全是北宋沂州人，年轻时得麻风病，须眉脱落。入

蒙山拜贺亢为师学道，恶病根除，年届八十体益健壮。乔全与苏轼友情深厚，贺亢对苏轼颇有好感，所以苏轼作诗送乔全，寄贺亢。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恶疾堕眉须。
红颜白发惊妻孥，览镜自嫌欲弃躯。
结茅穷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卢。
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未起烦一呼。
觉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莲花出泥涂。
随师东游渡潍邾，山头见我两轮朱。
岂知仙人混屠沽，尔来八十胸垂胡。
上山如飞嗔人扶，东归有约不敢渝。
新年当参老仙儒，秋风西来下双凫，
得枣如瓜分我无？

这首诗是写给乔全的。诗的开头四句是说，乔全在二十岁时长得既英俊又大方，初患麻疯恶疾使得眉毛和胡须相继脱落。年纪轻轻头发斑秃，使得妻子儿女感到震惊，对镜看到难看的容颜，自己也感到嫌恶，因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诗的第二段是说，乔全到蒙山深处修筑茅屋以松脂为食，诚心拜在蒙山修炼长生的贺亢为师，经过苦心修炼，察觉自己的身体完全不是以前那个病样子了，就像荷花从淤泥中长出来那样光洁美丽。诗的第三段是说，乔全随师父东游渡过潍、邾二水到达密州，在山上见到苏轼乘朱漆的双轮车走在常山道上。苏轼哪里知道仙人也跟屠夫、卖酒的同样混居于市井之中。诗的第四段是说，乔全在蒙山养生修炼，已取得极好的效果，年届八十胡须垂于胸前，上山仍脚步如飞不要别人搀扶。此次与师父相约东归蒙山不



苏轼

敢违背，新年时节当能参见老仙师了。来年秋季你乘双凫到来时，得到象瓜那样大的仙枣能分给我些不能？诗中有对乔全患恶病时的惋惜与同情，有对乔全经过修炼病除体健后的喜悦和美好祝愿，也有对乔全师父贺亢知遇的感激与仰慕。

生长兵间早脱身，晚为元祐太平人。
不惊渤澥桑田变，来看龟蒙漏泽春。

曾谒东封玉辂尘，幅巾短褐亦逡巡。
行宫夜奏空名姓，怅望云霞缥缈人。

垂老区区岂为身，微言一发重千钧。
始知不见高皇帝，正是商山四老人。

旧闻父老晋郎官，已作飞腾变化看。
闻到东蒙有居处，愿供薪水看烧丹。

千古风流贺季真，最怜嗜酒谪仙人。
狂吟醉舞知无益，粟饭藜羹问养神。

寄给贺亢的这五首绝句，从不同角度赞美了贺亢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贺亢的仰慕及对在蒙山养生修炼的向往。第一首诗说，贺亢生长在唐末五代战乱年代能够及早脱身归隐蒙山，晚年成了宋代元祐太平盛世的人了。对于世事的沧桑巨变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却能悠闲自得地来欣赏蒙山、漏泽的春天美景。览蒙山春色，到湖天泛舟，思前贤懿行，自然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第二首诗说，宋真宗东封泰山时贺亢曾谒于道左，那时贺亢头着幅巾，身穿粗布衣裳，徘徊一会儿即不见了。晚上，大臣在行宫奏闻谒于道左的人是石晋水部贺亢，真宗皇帝十分惊异，怅然想望遗迹于云霞中的仙人。贺亢为真宗皇上所想望，可见其高行影响之大。第三首诗说，垂暮之人做事岂是为了自身，精微之言一说出就有千钧重。这才知道贺亢不谒见晋高祖石敬瑭，正像商山四皓不应汉高祖刘邦的召见一样。将贺亢与商山四皓并提，足见贺亢品格的高尚。第四首诗说，先前听父老们说贺是石晋时期的水部员外郎，已经飞腾变化成仙了。现在又听说蒙山有您居住的地方，我愿意给您打柴提水看您炼丹。诗中流露出苏轼对官场的厌倦情绪和对归隐山林的向往。第五首诗说，唐代的风流人物贺知章，最怜惜嗜酒的谪仙李白，知道平时狂吟醉舞对身体无益，不如粗茶淡饭对身心补养更有好处。这里以贺知章喻指贺亢，也含有贺亢像贺知章怜惜诗人李白那样怜惜苏轼。诗中自然流露出对贺亢的感激之情。

苏轼在诗中写贺亢在蒙山养生修炼，年逾百岁，犹方瞳明亮照野，骨姿清瘦飘逸，健步登山畅怀；写乔全跟贺亢在蒙山养生修炼，麻疯恶疾根除，好似脱胎换骨，年届八十，上山脚步如飞，足见蒙山的确是养生长寿胜地。

暮春三月 品读《兰亭》话流觞

俞正阳/文

很多人通过千古名篇《兰亭序》而对“觞”这种酒器产生兴趣。其实“觞”就是一种古代常见的椭圆酒杯，略像船形，两侧各有一个耳形把手，便于饮者双手把执，同时给人以规整对称的美感。由于造型独特，“觞”在民间也被唤作“耳杯”。文人们因之联想到禽鸟的双翼，于是赠予它一个颇有文气的名字“羽翼”。

“觞”诞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与当时酒器家族中“樽”“觥”、“爵”这些成员不同，“觞”没有神器的威严，却散发着贴近生活的亲和。从先秦直至魏晋，不论士庶都对它青眼相加。

魏晋时期文人与酒的话题历来备受关注。无论放诞潇洒的“竹林七贤”，还是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们的人格与文学都有酒“以一贯之”。魏晋文人坦率地吐露“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的畅快，或以狂饮躲避动荡的时局，让后人不禁叹服他们的可爱与机智。

所谓“修禊”，是古人在夏历三月以水净体的习俗。修禊之后，古人常会举行“曲水流觞”来取乐。尽管两晋时代的修禊礼俗已经演变为“游春”活动，“曲水流觞”的游戏却被承袭下来。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在绍兴兰亭举行的修禊之会，注定让后来者心驰神往。不必说“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序》为历代书家手追心摹，谢安、孙绰、王羲之等与会高贤的清灵才性，千载以下，尚有余韵。迎着暮春的淑气，酌一觞醇醪，名士们或神游宇宙，循本发幽，或以清灵放逸的笔墨抒写胸臆。从书圣时而平和、时而喷涌的思绪化成的线条间，我们不知不觉走入他敞开的心灵。

“兰亭已矣”，说不尽吊古者的怅惘，远去的魏晋风流，曾勾起多少思古幽情？面对无尽红尘，高呼“万世名不如一觞酒”，也只有魏晋人能放达如斯。轻抚穿越千年的酒觞，魏晋名流仿佛近在咫尺。酒尽香散，空积尘埃的羽觞已让人在春风里微醺。



照亮心窗的阳光

——感受刘方毅

刘凤才

诗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当一层厚重黑幕遮挡住窗口时，心灵将是何等的阴沉抑郁。

生理学家说，眼睛是人类最重要的感觉器官。当它丧失了功能时，人们得到的只能是深刻缺陷的痛苦感觉。

上帝眷顾苍生，撒下一片阳光，穿透云翳，撕去黑幕，照亮心窗，温暖了冷却而阴暗的心灵。

这片阳光之一，叫刘方毅。阳光明亮耀眼：他是临沂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博爱眼科医院副院长、市眼科学会主任、山东省十佳眼科优秀工作者。阳光又很柔和温暖：谦和，低调，淡定，谨慎，细致。没有专家的豪迈气势，不居权威的俯视角度，让人亲近自然。

让我们享受这片阳光，感受刘方毅。

阳光之明亮

2000年，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位外科大夫，专程来到临沂市人民医院，恳请刘方毅为其作白内障手术。来者相当困惑：刚过而立之年，事业如日中天，恰恰又是全靠眼与手“吃饭”的外科医生，上帝却与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偏偏让他患了白内障，视力降到了0.1。这无异于要毁掉他的事业与



人生。刘方毅也相当困惑：青医附属院本身就是省内眼科的“师爷”，更有著名的眼科权威大腕，患者为何特地赶到他的门下？回答很简单：相信，依赖。这四个字，不仅没有使刘方毅自豪与得意，反而平添了极大压力：患者越是充满信赖与期望，医者的责任越大，要求越高。一旦出现“万一”，就将不幸结束患者的事业生命，自己名声是小，患者前程是大。尽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做这种手术，对他确实不过探囊取物，然他不敢稍有懈怠。术前做了各种精心细致的准备；术中睁大眼睛，持定术具，沉毅果断，一丝不苟。手术圆满顺利完成。第二天，患者去掉包扎，眼前一片光明，视力一下提升到1.2，喜悦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刘方毅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一向淡定的他竟然也让患者的情绪、甚至让自己能做出如此完美的手术，感动得有点热泪盈眶。

完美作品出自精雕细刻，精湛医术来自千锤百炼。1978年，刘方毅考入沂水医专。三年寒窗，埋头苦读，日日10多课时，从不荒废分秒，打下了扎实基础。毕业后，进入临沂市人民医院眼科。临床实践，使他常感知识饥渴，又到滨州医学院专修外语，1989年考取青岛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本可以参加统分，而且山东省眼科研究所所长、著名眼科专家谢立信教授对他十分器重，希望他能到本所发展。但他眷恋着蒙山沂水，毅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30年来，他致力做光明使者，阳光日益璀璨。

白内障为眼科最常见疾患。正是眼球晶状体因各种原因病化为“云山雾障”，阻挡了阳光透过心灵之窗。治疗此病需靠手术“拨云除雾”。而这恰恰是刘方毅的绝活。其“绝”，全在其多年练就的一双不是绣花、胜似绣花之手。随着技术创新进步，特别自上世纪90年代先后采用显微手术、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术后，术式日臻成熟完美。然而再高端的设备，不过是人之“助手”。白内障手术之难有二：一是操作空间极为狭小，前后不过半厘米，比一个“韭菜叶子”阔去无多，且上下皆“禁区”。二是对晶体囊膜的撕切开口。囊膜薄如蝉翼，娇若游丝，稍不留意，囊裂膜碎，晶体便无处安身。不克“二难”，就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攻克“二难”，全在手上功夫，如同“用手走钢丝”。为了练好“连续环形撕囊术”，刘方毅本不乐啖葡萄，却成了葡萄嗜好者，为的是在葡萄皮上练活路；本来不吸烟，却是烟盒不离手，为得是在烟盒玻璃纸上试手段。每天下班回家，他就像一个痴迷的孩子，在台灯下、于烟盒上划来割去。一个烟盒开50个洞，他能坚持数日连续搞定100多个烟盒。为了两手配合，左右开弓，他学会了用左手用筷使刀。百炼钢成绕指柔，他终于练就了一双神奇之手，在毫厘之间、“蝉翼”之上游刃有余、举重若轻，准确精致、一步到步，可谓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多年来，刘方毅共做一万多例白内障手术，几近完美无瑕；晶体植入术由最初的一小时，到后来的半小时，到今天的只需五六分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明亮夺目”的技艺，使刘方毅成为一片明亮照人的阳光。鲁南苏北的许多家市级医院眼科，都经常请他去会诊，做示范。他都义不容辞，尽力而为，给更多的患者播撒着光明。

阳光之温暖

2010年3月30日上午，临沂博爱眼科医院3号病房内，一片明媚春光、欢声笑语。医护人员与患者家人簇拥着一位喜笑颜开的老太太，庆祝她双喜临门：重见光明暨百岁寿诞。老人患老年白内障多年，生活极为不便。其亲属多方咨询，找到了刘方毅。高寿本为福，失明为大憾。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刘方毅心中大动恻隐。经与院方商量，决定为老人免除手术费，并亲自主刀为老人施冷超乳手术。复明老人幸福温馨的笑容，又使刘方毅倍受感动，他借此契机在全科开展了“老寿星复明平价医疗活动”，凡百岁老人来本院治疗白内障，只收材料费，医院资助2000元。至今，刘方毅已亲自为4名百岁寿星进行了手术。百岁老人能重睹满堂子孙、又见日月之光，该是何等幸运、幸福！

像尊重、珍惜生命一样，对待每一只眼睛；不仅拨去心窗的云翳，更让心灵感受到世界的

温暖，是刘方毅这片阳光的更高境界。

他是医院推行的“惠民医疗工程”的积极响应与践行者。为帮助困难患者复明，他倡导设立了“博爱复明基金”。市社会福利院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孤儿国福亮，是首批受益者。刘方毅不仅亲自为小福亮治好了眼睛，还一直惦记着他的健康成长，多次带着食品与玩具去看望。或许是缘分：正是刘方毅这片阳光，使小福亮这个不幸的孤儿，才开始有了像他的名字一样“幸福”而又“明亮”的新人生。苍山县一青光眼家族，因贫困无力医治，全家人几乎都已失明，只有一个儿子尚存一线视力。为抢救这全家的“一线光明”，刘方毅不仅免费为其进行了手术，而且带头为他捐钱捐物，全科医护人员也纷纷向患者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为使阳光温暖大地，平常日子，他带领眼科医生们，辛勤奔波，以不同方式，积极为离退休教师、媒体记者、武警战士、入伍青年、偏远农村的孤寡老人、福利院的孤儿等送去爱心诊疗服务；定期到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巡回义诊，宣传视力保健与眼疾预防知识。

他又是热心公益、致力于慈善事业的专业带头人。多年来，带领眼科白内障专业积极参与中国“红基会”、省市慈善总会开展的“爱心复明慈善救助贫困白内障患者”项目，共为3000多名老年患者实施了全免费复明手术；坚持开展每年一届的“春风送光明”活动，为2000多名患者免除了手术费。

他待病人如亲人，以阳光暖人心。恪守“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为了病人”之宗旨，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解患者之所痛，助患者之所需。无论平时还是节假日，他的身影总是忙碌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义诊场中。今年5月，远在加拿大的女儿万里迢迢回国探亲。正值医院人手最紧、工作最忙的时候，他竟没抽出一天时间陪陪孩子，冷落了女儿却温暖了病人。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虽然效果好，然而“好货不便宜”，手术费用很贵。为使广大患者特别是贫困患者都能享受这份科技之福，刘方毅专门进行科研攻关，发明了微切口、轻损伤技术，不但减轻了手术之苦，更大大降低了手术费用，大受患者欢迎。为最大限度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他严格要求全科人员，力争让病人用最低的费用、接受最好的治疗，不做不必要检查，不开“大处方”，不开昂贵药，不开“搭车药”，不收红包不吃请。在医患关系已渐成社会关注热议焦点、医患矛盾不时凝结成“坚冰硬冻”的时候，刘方毅用自己诚挚、高尚的阳光之温暖，化解着冰冻，融合成一片和谐的医患春色。

阳光之胸怀

2010年冬，刘方毅去加拿大看望女儿。探亲假期即将结束，一来为给远在异国他乡的孩子多些温暖，二来春节将至，他打电话给院方领导请求续假。院领导不无担忧：你离开这么长时间，科里的工作能行吗？特别是业务能顶得起来吗？刘方毅请领导尽管放心再放心。领导将信将疑地批准了他的请求。当然，首先放心的是刘方毅。他带的团队，他带的徒弟，让他充满自信与信心。同时，他也是特意给徒弟们让出更多时间，腾出更多平台，让他们坚定信心，独挑大梁，展示风采。

1993年，刘方毅担任市院眼科副主任，1998升任主任。今天的眼科，又与博爱眼科医院合作，他还担任了副院长。全院下设若干专业科室，仅医师就多达34名。他的管理理念也独具慧眼，除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制度为保证，更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根本与核心。服务要靠人，制度管理人，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人才，管理何者？管理管理，既要“管”，更要“理”，必须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理”出个道道。在人才培养上，他不但有着强烈的意识，更有一副阳光胸怀，两条“阳光之举”：

一是搭建平台，鼓励实战。他尽自己之所能，努力为大家特别是专业人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学习、实践、锻炼、提高的机会，创造更加有利于人才厚积薄发、脱颖而出的条件。只要有学习深造、考察交流、会议研讨、科研攻关等机会，他都亲自带领或组织安排同志们积极参与，



从而不断夯实基础，开阔视野，创新思路。实践出真知，实战练真功。他不当“老保姆”，不当“老台主”，积极鼓励大家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只要他觉得条件成熟，能“上台”的就坚决支持其“上台”，该“出手”的就大力扶助其“出手”，在实战中打磨历练，总结提高。

二是甘做人梯，诚传真经。作为临沂眼科的首席专家，刘方毅学识广博，造诣深厚，成就卓著，建树颇丰。多年来，先后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20多篇，获4项国家专利、5项省市科技进步奖，为眼科诊疗创造与积累了颇多财富，为专业人艳羨与渴求。“同行是冤家，秘笈不外传”，似乎是很多“圈子”中人的传统观念。但是，阳光无私，光明无疆，刘方毅没有把自己的技术与创造当作个人财富、秘不外传，而是当作乐于甘于让人们共享的成果。他坚决反对与摒弃“技术垄断”之陋习，以阳光般的胸怀，以甘为人梯的境界，对业内畅开大门，向人们传授真经。尤其对年轻优秀的可造之材，他更是垂青于目，爱惜于心，毫不吝啬、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孜孜不倦地教人育人，手把手地示范指导，肩并肩地提携扶助。在他的全力呵护与精心培育下，眼科有数位年轻骨干，一步步崛起为后起之秀，成长为栋梁之材。

刘方毅以阳光胸怀、阳光之举，打造与率领着这样一支生机盎然的队伍，自己心中也充满了自豪与自信，可以更加充实地享受阳光人生。其实，他有着很多的个人爱好与情趣，原来天天处于百忙之中，多无暇顾及体味。现在，他终于可以于闲暇之时，去轻松地挥动球拍，打一会儿羽毛球；稳坐于前，放心地下上两盘围棋；擎起自己的“尼康、佳能”，聚集并定格明媚阳光下最美的一瞬……

做人未必、也不可能都做眼科医生。然而做人当如刘方毅——
用自己的广阔阳光，照亮与温暖人们的心窗与心灵。
自己的心窗与心灵，也会为此更加明亮温暖与广阔。

涑河的变迁

王金海/摄



涑河是明代嘉靖年间由泾王朱佑舜集民众开凿的横贯老城区的人工河，最后流入沂河。它是最能体现临沂城市特色的“历史文化长河”。涑河是古代临沂人智慧的结晶。近几十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加，这条原本就不够宽阔、畅通的河道已经面目全非，水质严重污染，两岸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2003年，一场治理涑的战役打响。历经几年努力，涑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贯穿东西十余公里的涑河上建起风格各样的18座桥梁，一桥一景，一桥一特色。过去低矮的平房，被鳞次栉比的居民楼、写字楼房所代替，两岸绿地公园、健身长廊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四季常青、鸟语花香、美不胜收……



1916—1949：临沂早期的报纸（上）

呼国英 刘金柱



号角——大众日报创刊（国画）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中国发生了旋转乾坤的历史巨变。辛亥革命前，临沂还没有报纸出版，仅有少数外埠报纸在县城区域发行。辛亥革命带来了人们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大解放。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刊空前活跃起来。在这种背景下，1916年临沂出现了第一张报纸《东鲁日报》。此后，各种报纸层出不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共有66种报纸出版。其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团体办的报纸36种，其他为各阶层人士、各派政治力量所办。这些报纸出刊长的达十几年，短的二三年或一年半载，甚至“昙花一现”。这些报纸，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现状，又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立场、观点和政治主张，成为这一时期历史的见证。

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临沂的报纸出版，按照其发展的脉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是报纸出版的初步展开时期。报纸内容各异，但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军队创办的报纸成为主流，并随着战争进程得到大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报纸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状态下生存，其宣传的核心就是抗战。三是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势好转，党的各级政权成为主导，报纸的内容呈现多元化，更加侧重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形势教育和文化

知识教育，交流革命政权建设的经验做法，宣传英雄模范人物等。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催生了临沂报纸的诞生

辛亥革命后，虽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实质上仍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操纵的各派军阀势力封建割据之中，政局动荡，战争迭起。临沂的当政者多系官僚政客、封建军阀、国民党党棍。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开始出现，一些革命的先驱到贫苦农民中间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唤醒民众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爱国知识分子们纷纷创办报刊，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大力宣传爱国思想，积极探索求亡图存之法。

临沂出版的第一张报纸是1916年（民国五年）8月创刊的《东鲁日报》。该报为四开四版，由于条件所限，名为日报，实为不定期出版的油印小报。创办人为李淑久、刘敢陈。李淑久是临沂城喇叭巷人，是中国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李光仪的弟弟。他受兄长影响，少年时即有反封建帝制的民主思想。1910年，他与同乡孙金宣、李梦溪等在济南设立秘密机关，开展秘密活动，反抗清王朝的统治。辛亥革命时，他与孙金宣、何梦湘等奔走于京津一带，筹备起义。1912年初，滦州起义失败，他回到临沂，和刘敢陈等仍从事革命活动。《东鲁日报》明确阐明，其宗旨就是“宣扬三民主义”，反对封建帝制。该报出刊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年便停刊了。

中国共产党人办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926年李清漪在其家乡沂水县下胡同峪村养病期间办的《农民小报》。该报也是油印小报，四开四版，不定期出版。李清漪，字泮溪，是马克思主义在沂水的最早传播者，沂水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他先在临沂的山东第五中学读书，后于济南育英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积劳成疾，1926年经组织批准回家乡养病。在养病期间，他边治病边工作，办民校，发展党员。在胞弟李松舟的帮助下，创办了《农民小报》。他自己承担撰稿、编辑、刻钢板、印刷、散发等工作。报纸内容，除了摘登他从外地带回来的进步书报如《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新建设》上的文章和香港大罢工等内容外，他还自己撰写评论、通讯和文艺小品等，



李清漪

针砭时弊，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小报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的政治主张，宣传贫苦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干革命，推翻反动统治，才能翻身得解放。小报的读者面对的是粗识文字的农民、小学教师、学生和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报纸虽小，但在交通不便、地处偏僻的沂水山区，却起到了非常大的革命启蒙作用。1927年初，李清漪病稍愈，便要回上海，报纸只能停办。李清漪在返回上海途经济南时，被组织留在济南任中共山东区委机关技术书记。同年5月，区委机关遭破坏，李清漪被捕，被军阀张宗昌杀害，年仅26岁。

1929年出版的《血花报》，是土地革命初期由中共“跨党”党员张希周等以国民党费县党部名义办的一张报纸。该报为红字油印八开小报，每期印发200份。1929年前，费县既没有国民党组织，也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为了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1929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派“跨党”党员张希周、袁时若、李天钧到费县开展农民运动，三人都毕业于国民党山东省指导委员会在泰安主办的党务训练所。他们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来费县后，他们成立了中共费县县城党小组，对外则以国民党山东省指导委员会组织县党部党务临时登记处的名义，开展农运工作。为了广泛发动教育群众，张希周等便创办了《血花报》，袁时若任

主编。报纸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时事和县内新闻，形式有消息、评论、诗歌、小说、漫画等，运用各种通俗易懂的形式揭露帝国主义、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罪恶。如第三期上刊登的一幅漫画：画面是一个锄地的农民，正把锄头戳在地上躺在地头树下休息，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狼伸着垂涎的舌头向农民奔来，狼身上写着“帝国主义”四个字。另一旁画着一个学生打扮的青年，向农民做着呼喊的姿势。画面的上半部写着“农友们，醒醒吧！大的危险来到了！”1929年9月，费县的农民运动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张希周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而转移，《血花报》在出版了六期后被迫停刊。

1930年春创刊的《红色鲁南》是中共鲁南支部主办的报纸，八开油印不定期出版，后由中共临郯县委主办。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党员孙善师（孙镇国）和刘之言（刘汾）受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分别回到家乡临沂、郯城开展工作。1929年10月，他们和刘谐（刘夫平）在郯城码头镇县立第三小学建立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1930年春创办了《红色鲁南》，孙善师任主编。1932年6月，鲁南第一支部扩建为中共临郯县委，《红色鲁南》即为临郯县委主办。7月，“苍山暴动”前夕，孙善师被捕。《红色鲁南》由马叙卿、刘谐负责，转移到临沂城北船流小学出版。“苍山暴动”失败后，临郯县委遭到破坏，1932年秋，《红色鲁南》停刊。《红色鲁南》虽一直在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中秘密传播，但却发挥了巨大能量，特别是对“苍山暴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鼓动、宣传和组织作用。

这一时期出版的报纸，还有国民党临沂县党部1931年办的《党声报》，该报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幌子，宣传“以党治国”，宣传国民党的剿共，对中共领导的农民暴动进行污蔑谩骂。1935年8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撤销了国民党的县党部，报纸也随之停刊。

其他报纸，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有的宣传反封建、求进步，有的研究古典诗词，有的宣扬“地方自治”，有的宣传科学知识，也有的以办报为掩护从事特务活动。临沂城大绅士吴镜荪1924年办的《晨钟报》，重在为扩大地方派系势力巩固绅士地位造舆论。临沂教育界人士刘可大1924年办的《沂州輿报》，主要刊载地方新闻。“临沂县地方自治筹备处”1925年办的《自治旬刊》，宣传要想国富民强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临沂教育界人士王聘之、陈春台1926年办的《琅琊日报》，主要研讨古典诗词。韩得一、夏侯少芳、王少衡、韩筱泉等办的《临沂民报》，以刊登地方新闻为主，其评论敢于抨击时政，影响较大。

此外，还有沂水县民众教育馆1931年办的《民众周刊》，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部分在校学生办的《临沂日报》、国民党临沂县政府资助私人于1933年办的《鲁南日报》等。

由军队办的两种报纸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一是国民党第十七军办的《北伐日报》，1928年4月，该部进驻临沂城。该报是随军报纸，部队到哪报纸就办到哪。当时满大街都张贴着《北伐日报》，报纸内容主要刊登北伐军战斗的消息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二是国民党第十军办的《鲁光日报》。1928年11月，杨虎城领导的第十军来临沂驻防，军部政治部创办了这张报纸。虽为军报，却面向地方。报纸敢于评议时弊，为百姓说话。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县境内交通要道、集镇设立税局、分局或分卡，征收货物出境、过境税，让商户不堪负担，而收税人员还经常借端敲诈勒索。为抵制收税，郯码一带商人罢市，要求取消货物税卡。《鲁光日报》刊登了消息，还发表评论，提出废除苛捐杂税，结果各地撤销了税卡。1929年5月部队移防调走后，报纸也随之停办。

到抗日战争前，临沂共出版了18种报纸。其中民办的7种，中共办的5种，团体办的2种，国民党县党部办的2种，军队办的2种。临沂报纸从无到有，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这一时期的报纸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并不完全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报纸特征。从内容上来说，更侧重于宣传而不是新闻的传播；从出版发行上来说，大多数不能定期出版，也没有公开订阅发行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散发。但不可否认，这些报纸像万花筒一样反映出这一时期临沂社会的真实面貌。尽管有些报刊创办的时间不长，有的仅出几期就被停刊，但那些进步报刊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爱国思想却深入人心，在传播先进思想、唤醒民众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万历《沂州志》 (选载)

——沂州城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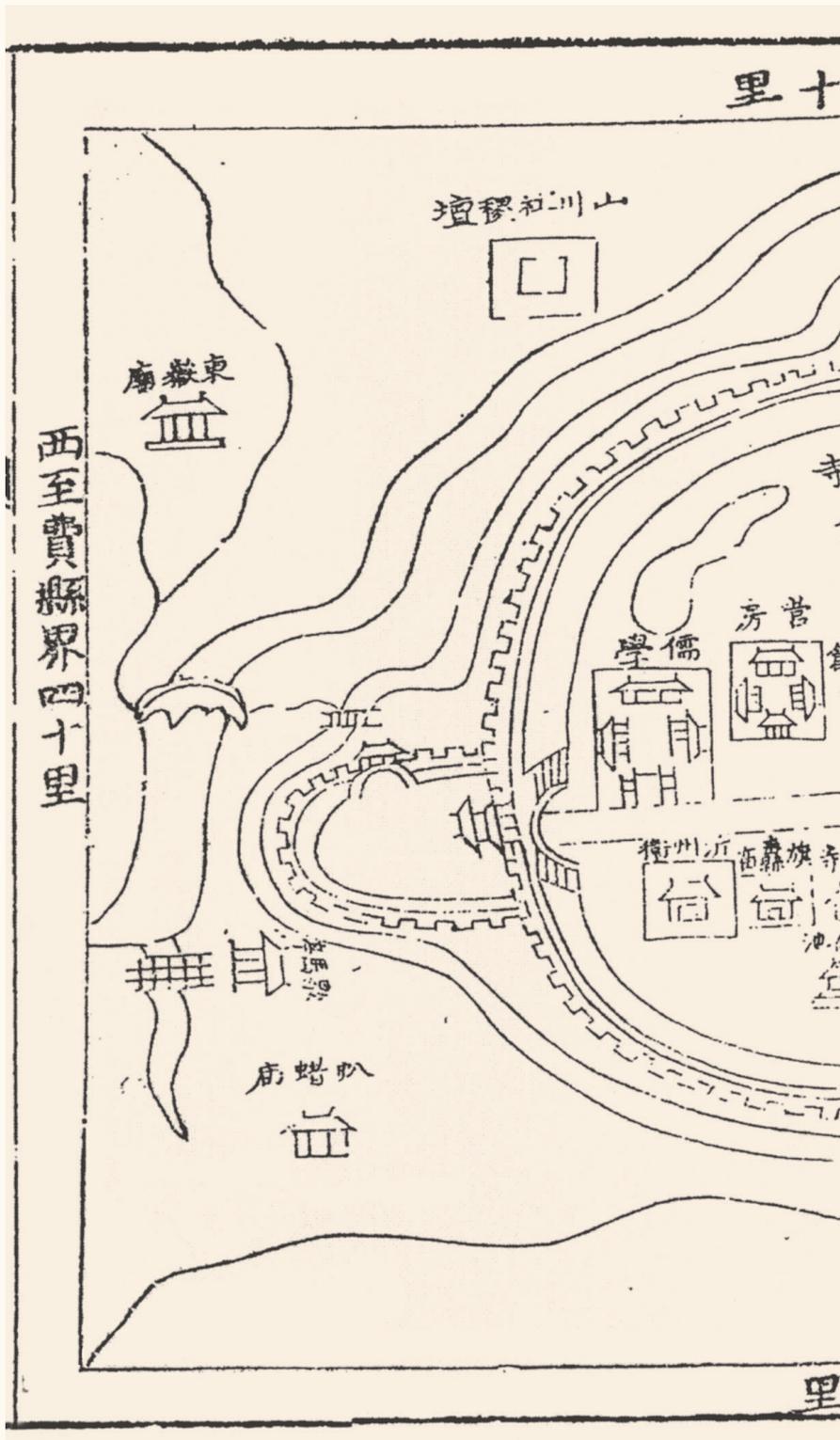
海 涛

城 池

.....

沂州砖城，周转九里。高二丈五尺，阔一丈。门四：东曰镇海，南曰望淮，西曰瞻蒙，北曰宗岱。池深一丈，阔一丈六尺。

国初指挥周德筑。后指挥张贵、李章、袁纲相继修葺。弘治十一年，知州张凤增修。万历十五年，知州谢志伊令乡社分量丈尺修补工完。各勒石碣四门，更添建城楼，岿然雄峙。近因年久倾圮，三十五年知州徐汝冀修葺，壮丽足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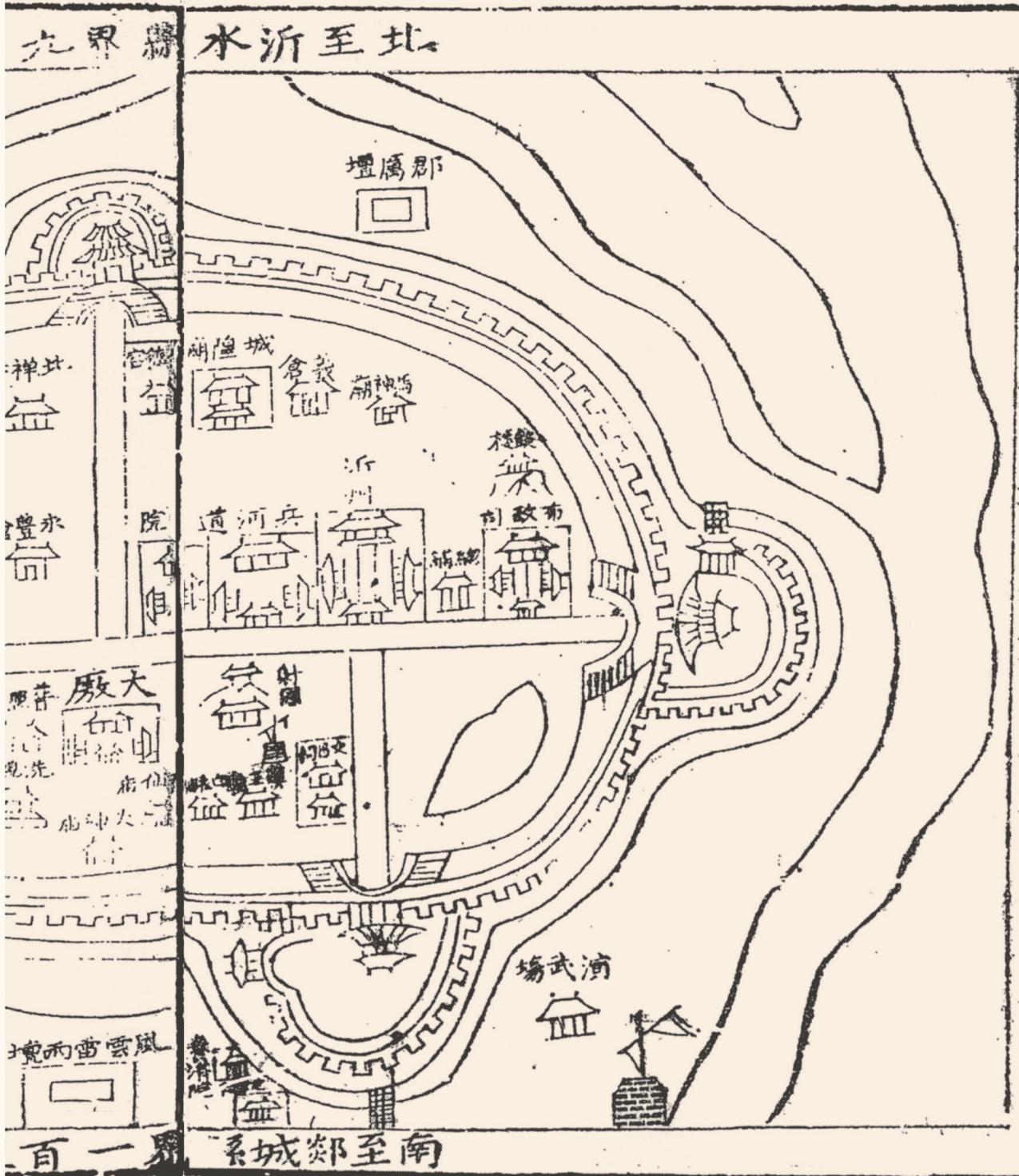


沂州志

圖考

四

東至直隸贛榆縣界一百三十里



太平河东岸、磁窑镇北），而梁父县治在今新泰市城西3.5公里的天宝镇境内。北齐时，泰山郡改称东平郡，回治于博，隋代废东平郡。

南城县治，本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武城邑，战国时期称南城邑，遗址在今平邑县城南40公里处的魏庄乡武城村。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在南城邑设置南成县治，属徐州东海郡所辖38个县、侯国之一。东汉时改南成侯国置南城县，由东海郡转属兖州泰山郡。西晋改南城县为南武城县，南朝宋时复名南城县，仍属泰山郡。北齐时，废南城县。

二、羊氏起源与泰山南城羊氏迁徙及世系概要

羊氏的起源，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称周代有官职名叫“羊人”，其后裔便以“羊”为姓。以羊为姓见于典籍者叫羊斟，《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领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四库全书荟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春秋时，晋国大夫名羊斟，字叔鱼。当邢侯与雍子争田时，命其断定，雍子纳女于羊斟，他便庇护雍子。邢侯怒将其杀之于朝。战国时，燕国有羊角哀，与左伯桃友善。闻楚王善待士，二人同赴楚国。途中值下雪粮少，左伯桃将衣食让于羊，自入空树之中死。羊角哀仕楚官至上卿，备礼改葬左伯桃。左之墓临近荆将军陵，羊角哀梦见左告知日夜被荆将军所伐，便欲向地下看之，乃自刎而死（西汉刘向《列女传》）。后世之人常举二人事迹比喻生死之交，称为“羊左”。

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华元的御者羊斟是否就是泰山南城羊氏之祖，不敢妄断。《后汉书·羊续传》称“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可推知在西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之时，羊氏已进入西汉重臣之列。羊续的祖父羊侵，东汉安帝时任司隶校尉；父羊儒，东汉桓帝时任太常，也都是二千石卿校。

最早记载羊氏为泰山南城人的是《晋书·景献羊皇后传》和《晋书·羊祜传》，二人系羊续的孙女、孙子，那么其祖上应是南城人。然而《后汉书·羊续传》却说其为“泰山平阳人”。两汉的泰山郡并无平阳县。考平阳县为秦代设置，属于薛郡，遗址在今山东邹城。汉改平阳县为南平阳县。到底是《后汉书》记载有误，还是羊续之子从南平阳迁到南城，并不妨碍其后代均以南城为里籍问题。

西晋末年，战乱频仍。“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族纷纷南迁。泰山南城羊氏名人有的随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左，以后便出任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有的名人留在本地，继而有一部分族人迁居本郡的钜平、梁父县（亦作梁甫县）繁衍，出任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在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后，北朝的名城羊氏，有的又投奔了南朝，例如北魏泰山太守羊侃、徐州刺史羊徽逸、泰山郡主簿羊鸦仁等均归梁。

羊续为东汉著名清官，有子羊秘、羊衡、羊耽。羊秘官至西晋京兆太守。子羊祉，魏郡太守。羊祉子羊亮、羊陶。羊亮官至大鸿胪，羊陶任徐州刺史。羊衡有女羊徽瑜，西晋立国后被尊为弘训太后。羊衡子羊发（都督，淮北护军）、羊承、羊祜。羊发子羊伦（高阳相）、羊暨、羊伊（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羊篇（任散骑常侍）。羊暨官至阳平太守。有子羊曼、羊聃。羊曼官至丹阳尹，羊聃任庐陵太守。羊曼子羊贲，尚东晋明帝司马绍女南阳公主，任秘书郎，早卒。羊祜系西晋大臣，其姐或妹配琅邪临沂

望族中的平北将军王义（《世说新语·识鉴》），生西晋太尉王衍。羊耽官至太常，有子羊瑾、羊琇。羊瑾官至西晋尚书右仆射，有二子：羊玄之、羊同之。羊玄之，西晋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兴晋公；羊同之，仕西晋。羊玄之的女羊献容，系西晋惠帝皇后。羊琇西晋初任中护军加散骑常侍，官至太仆卿。其第五世孙羊规（据《北史·羊祉传》），仕北魏为雁门太守，有子羊祉、羊灵引、羊莹。羊祉有子羊默、羊侃、羊忱、羊给、羊元、羊燮。羊灵引子羊敦，孙羊隐。羊莹有子羊烈、羊修。羊修子羊玄正。

泰山南城羊氏尚有三支：一是西晋时任匈奴中郎将的羊济（与羊衔同辈）。其子羊炜，任兖、徐二州刺史；女配王览次子王基，生王敦。羊炜弟羊鉴，东晋光禄勋。二是东晋时任徐州刺史的羊忱。其子羊权，东晋黄门侍郎。羊权子羊不疑，东晋桂阳太守。其有二子：羊欣、羊徽。羊欣是东晋和南朝宋著名书法家。其子羊俊；女配王览第六世孙王弘之子王罗云。羊徽任南朝宋河东太守，有子羊瞻，宋寻阳太守。三是东晋时任尚书都官郎的羊楷。其子羊绥，东晋中书侍郎。羊绥有子羊玄保、羊辅。羊玄保为南朝宋金紫光禄大夫。有子羊戎（宋通直郎）、羊咸、羊粲。羊辅子羊希，南朝宋广州刺史。其子羊崇，仕宋为尚书主客郎，著《羊崇集》6卷，已佚。此外，泰山南城羊氏名人尚有东晋名士羊昙、官员羊穆之；南朝宋武昌太守羊冲、永兴令羊恂、文士羊璿之、名医羊志；南朝齐徐州刺史萧惠休的参军羊伦、太中大夫羊闾；南朝梁西陵郡守羊思达、官员羊珍孙；南朝陈将领羊柬、羊暕等和北魏将领羊文义、官员羊海；北齐官员羊立正、羊法暹等。

三、泰山南城羊氏名人事略

（一）羊续

羊续（142年—189年），字兴祖，东汉著名清官。初任郎中，后辟为大将军窦武府中佐使。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专政，起用党人与太傅陈蕃合谋欲诛杀宦官，事泄被杀。次年宦官侯览、曹节挟持汉灵帝，收捕“党锢之祸”人员，羊续受牵连，被禁锢十余年之久。光和二年（公元184年），党锢解，羊续被辟为太尉府佐使，累迁庐江太守。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调任南阳太守。赴任时，只由一童子陪伴，妻子留在老家。有一次其妻带子羊秘到南阳府邸探视，羊续却催妻子快回。其妻察看他的住处，只有布被、旧衣和几斛麦子而已。羊续说：“我自己生活仅如此，用什么供养你们母子呢？”

羊续对权贵之家的奢华非常反感，自己衣著朴素，粗饭淡食。郡丞给他进生鱼，羊续将鱼悬在门庭。郡丞再送鱼时，他便指着所悬之鱼让郡丞看，既杜绝讨好之心，又警示其他送礼行贿的人。

中平六年，汉灵帝欲任羊续为太尉。当时，对凡拜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者，都要向少府东园缴纳很多礼钱。朝廷派左驸（使者）监督此事。对左驸，也要礼待并且赠送财物，当左驸到后，羊续拿出一件旧棉袍给他看，并说：“我所储备的财物，只此而已。”左驸回去陈述了原委，汉灵帝很不高兴，未让他当太尉，改拜九卿之一的太常。羊续未及成行病卒，年仅48岁。

（二）羊徽瑜

羊徽瑜（214年—278年），东汉南阳太守羊续孙女。父羊衔，上党太

守；后母陈留蔡氏，为东汉左中郎将、著名学者蔡邕女。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和传统文化熏陶，“聪敏有才行”。魏大将军司马师前妻夏侯徽死后，续娶镇北将军吴质女，吴氏被废黜，又娶羊徽瑜。司马炎建西晋称帝，是为晋武帝，尊羊徽瑜为弘训太后，居弘训宫。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去世，与司马师（追尊为景帝）合葬于峻平陵。

（三）羊祜

羊祜（221年—278年），字叔子，羊徽瑜弟。司马昭任魏大将军时，调羊祜任中书侍郎，他以高贵乡公曹髦在位为由，不愿做侍臣，要求做补吏，任秘书监。后任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升中领军，掌管警卫部队。西晋立国，羊祜任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卫将军等显职。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西晋准备灭吴国，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为顺利灭吴，统一全国，羊祜在襄阳开办学堂，整治军队，并抽调部分军队“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为争取民心，他与吴国大将陆抗互通使节，各守疆土。晋、吴边疆军民，对羊祜十分尊敬，皆称他为羊公。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病逝，群众“莫不号恸罢市，哭者声相接”。襄阳老百姓在当年羊祜游览过的岷山上，为他建碑立庙，岁时享祭。凡望见其碑的人都为之流泪，杜预将此碑命名为“坠泪碑”。荆州一带群众为表达对羊祜的尊敬，不但不直呼其名，而且将房室之“户”，皆以“门”称。并将官名“户曹”改称“辞曹”，足见其在人民中威望之高。

羊祜令人崇敬之处是：

不贪图名利。西晋立国初，武帝大封功臣，对羊祜也多次升迁。在由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郡公、食邑三千户时，他坚决辞让，最后封为侯。咸宁元年（公元275年）晋武帝下诏将泰山郡辖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和平阳5个县划出，设置南城郡，作为羊祜的封地，也被他坚决拒绝了。在此之前的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晋武帝加羊祜开府仪同三司时，他自谦才德不足以当此任，上《让开府表》坚辞。他认为自己“每极显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顿进，恩宠不可久谬，夙夜战悚，以荣为忧”。

能举贤拒私。羊祜居高位，经常有人向他阿谀奉承，目的是要官做，他置之不理。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极力推荐，但从不透露自己是举荐之人。有人说羊祜这样做是过分谨慎，他听后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在朝廷受了官职而到私人家里去谢恩，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其女婿曾劝他“有所营置”，提拔亲信，以便到晚年有依靠。等女婿走后，羊祜告诉侄子们说：“人臣树立私党，是背弃国家的行为，害处实在太大了！你们要牢记我的意思。”琅邪临沂人王衍，是羊祜叔伯外甥，喜欢谈老庄而得高官厚禄，所论义理，随时更改，时人称为口中雌黄。羊祜告诫人们说：“王夷甫（王衍字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后王衍于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作为统帅，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遭石勒军队围歼，西晋军队数十万人全军覆没，王衍被俘后遇害。

生活俭朴。羊祜俸禄优厚，但生活俭朴，常以钱物帮助亲友和赏赐军士。去世后，“家无余财”。著有《羊祜集》二卷，已佚。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雁赋》、《让开府表》等文7篇。

（四）羊琇

羊琇，字稚舒，太常羊耽次子。兄羊瑾，为尚书右仆射。羊琇年轻时任镇西将军钟会参军，随其平定蜀汉。钟会谋反时，羊琇极力谏阻。还京师洛

阳后，赐爵关内侯。因佐助司马炎确立世子地位之功，司马炎即王位，升羊琇为左卫将军，封甘露亭侯。司马炎建西晋称帝，任其为中护军，加散骑常侍。在职13年，典掌禁军，参与机密要事，宠幸无比。

羊琇平日穷奢极欲，受时人讥议。因依仗权势，放纵部下犯法，被免官，不久官复原职。后因进谏触怒晋武帝，任太仆卿。由于失宠，心怀怨愤，发病辞官，不久病卒，被追赠为辅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第五世孙羊规，家族兴旺，名人众多。

(五) 羊玄之

羊玄之(?—303年)，西晋大臣。父羊瑾，官至尚书右仆射。羊玄之初任尚书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拜为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封兴晋侯。不久又迁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位为兴晋公。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成都王司马颖派陆机、河间王司马颙派大将张方等攻逼京师，羊玄之恐惧而死。死后被追赠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六) 羊亮

羊亮，字长玄。祖父羊秘，系羊祜伯父，官至京兆太守。父羊祉，魏郡太守。羊亮初任太傅杨骏的参军，时京兆地区盗贼横行，杨骏欲以严刑进行惩治，规定偷盗百文钱即处死，请属吏们讨论。羊亮对此举直率地予以批评，认为出现盗贼，责任首先在当地的执政者身上，只要执政者们清心寡欲，盗贼自会消失，不必加重刑罚。杨骏从其计。后羊亮任大鸿胪。他甚有才能，诚恳热情，推心置腹，使人感到得遇知己。“八王之乱”中，羊亮逃奔并州，被刘元海杀害。

(七) 羊献容

羊献容，羊玄之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十一月被立为西晋惠帝司马衷皇后。月余，司马伦篡位，她和惠帝被赶到金墉城，数月后才得复位。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羊献容被成都王司马颖废为庶人，送金墉城幽禁。七月，右将军陈醜等人讨伐司马颖，大赦，复羊献容皇后位。八月，河间王司马颙大将张方入洛阳，废羊献容皇后，并将惠帝逼迁长安。大臣荀藩等在洛阳组成留台处理政事，下令复羊献容皇后位。翌年四月，张方又在长安宣布废羊献容。十一月，周权自称平西将军，并宣布恢复羊献容皇后位。不久洛阳令何乔攻杀周权，又将羊献容废为庶人。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惠帝回到洛阳，恢复其皇后位。是年十一月惠帝死，次年怀帝司马炽即帝位，奉羊献容为惠皇后，居弘训宫。羊献容一生屡被废立，可居皇后中多难之最。



南城遗址
今平邑魏庄乡武城村



姓氏百家漫谈——刘姓 (上)

赵丹峰

一、刘姓起源与族群发展

刘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姓，姓始多源。帝尧时有陶唐氏的后人被封于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偃师市南），其后遂以国为氏。

夏代，有个叫刘累的人擅长训养蛟龙，被夏王孔甲任命为御龙氏，专司训龙之责。后有一龙病死，刘累不敢禀报，便将龙肉做成肉羹献给孔甲。孔甲吃后感到香味异常，还想再吃此羹，刘累怕此事败露，便逃至鲁县（今河南省鲁山县）居住，其后人便世代姓刘。以后，刘累即被奉为刘姓人的祖先（刘累之墓在鲁山县境，现在众多海内外刘姓人士都来此祭拜）。后来，刘累裔孙隰叔在周宣王时迁居晋国，隰叔之子士蒍为士师（亦称理，是执掌刑狱司法之官）。士蒍之孙士会，在晋襄公去世后曾奉命出使秦国，迎接寄居于秦的晋襄公弟弟公子雍回国即位。但当他们归国时，晋国已立襄公之子为国君。士会由秦归晋后，其处居于秦的后人仍世代以刘为氏。以上为祁姓之刘氏。

又，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遗址古属缑氏，熙宁中省入河南偃师），其后裔遂以邑为氏，是为姬姓之刘氏。

汉代，刘姓成为国姓，刘姓皇帝特赐一些其他姓氏的人姓“刘”，以示恩崇，如赐项氏（项伯一族）、娄氏并为刘氏，壮大了国姓刘氏的群体规模。

在汉代，皇帝曾推行过与匈奴联姻的和亲政策。汉朝公主下嫁匈奴单于，按匈奴当时习俗，可从舅姓，故此很多匈奴贵族便改姓为刘。像十六国时期的匈奴贵族刘渊，其所姓之刘便由此而来。刘渊后来所建立的政权，其国号亦称“汉”。在南北朝时期，属于匈奴的一支独孤氏亦被改姓刘氏。

刘汉以降，作为国姓的刘氏一族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族群衍布全国，并形成了彭城、沛国、弘农、河间、中山、梁郡、顿丘、南阳、东平、高密、竟陵、长沙、广平、高平、东莞、高唐、临淮、琅琊、东海、南郡、范阳、东莱、丹阳、武功、濮阳、尉氏、济阴、京兆、庐陵、南康、谯郡、河南等代表性郡望，其中以彭城刘氏为最显。

刘姓系中华大姓，经过几次大的移民迁徙，刘姓居民已经遍布全国和东南亚地区，故民间有“张王李赵遍地刘”之说。目前，国内刘姓居民总人口已超过6700万人。



汉高祖刘邦

二、刘姓名人述略

汉代，是刘姓名人所出为多的时期。刘邦是刘汉王朝的创建者，曾任泗水

亭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他遂起兵响应，称沛公。乘项羽在巨鹿与秦军主力决战之际，他率部入关，于公元前206年攻占秦都咸阳，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不久，即与项羽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之争”。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羽，于长安登基称帝，创建汉朝，是为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战胜霸王项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重贤纳谏。他所倚重的萧何、韩信、张良均为其夺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率起义大军攻占咸阳后，萧何即收取秦之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和当时社会状况，为日后刘邦夺天下、治天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良则奉劝刘邦勿要居富丽的秦宫，乃驻于灞上，使刘邦获得了秦民的拥护。楚汉战争中，刘邦采用韩信之策，攻占关中。刘邦在荥阳、成皋间与项羽相持时，韩信率军袭项羽后路，破赵而取燕、齐。不久与刘邦兵汇一处，击灭项羽于垓下。汉朝开国后，刘邦因承秦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先后灭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以防诸侯势力坐大。迁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至关中，以加强控制。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发展农桑，打击商贾。以秦律为依据，制定了《汉律》九章。上述举措既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亦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汉文帝刘恒（刘邦之子）和汉景帝刘启（刘恒之子）是两位很有作为的帝王。在汉初社会经济相对衰敝的情况下，父子二人均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当时大量荒芜的土地被开垦，人口增长，国家积蓄颇多，出现多年未有的富裕景象。削弱诸侯王势力，将其原有自行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王国行政由中央所任官吏处理，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后世史家将父子两朝的统治时期并举，誉之为“文景之治”。

汉武帝刘彻（刘启之子）是在“文景之治”基础上登上皇位的。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变革。在政治方面，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中国历史上以儒家哲学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先河；设立十三刺史部，“以六条察问郡县”，以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控制；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进一步削弱割据势力。在经济方面，采行征收商人资产税，以充盈国库。同时制定告缇令，以奖励人们告发逃避资产税的富商大贾，诛除豪强兼并之家；又采纳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铸钱收归官营；设置平准官和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与贸易；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即将种子种于低畦内，畦与垄的位置逐年调换，以利于抗旱保墒和地力休养），使粮食产量获得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外交方面，派遣张骞两次赴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联系与交易；又派唐蒙至夜郎，先后于西南建立七郡。在军事方面，并用卫青、霍去病为大将，击退匈奴的侵扰，保障了北疆的安定。在汉武帝的治理下，汉代中国成为亚洲最为富强繁荣的国家。

光武帝刘秀，系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在位期间，数次发布释放与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废止地方更役制；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在裁冗减吏的同时，于中央则加重尚书职权，在地方则废除了掌握军权的都尉，使中央集权得到巩固。

刘向系汉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刘向学识博深，以治《春秋谷梁传》闻名。成帝时，受诏与任宏、尹咸、李柱国等整理五经秘书、诸子歌赋等，由他总纂其成。在文学创作方面，以辞赋、散文见长。所辑《楚辞》十六篇，后经东汉王逸作注，名《楚辞章句》，系现存最早的传本。所撰《烈女传》，为魏晋小说的先导。刘向之子刘歆，系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古文经派的创始人。少时即通六艺，曾随父亲一起校订皇家藏书。哀帝时发现古文《春秋左传》，遂以传文解经，经传文互相参照发明，打破了《左传》不传《春秋》的传统看法，从而使《左传》的章句更为完备。王莽篡位后，古文经兴起，刘歆被拜为国师。赤眉、绿林起义时，他谋诛王莽，事泄后被迫自杀。刘歆在其父刘向所撰《别录》的基础上，汇集六艺群书的要旨，著成《七略》一书，指出诸子出于王官，反对当时的经学家神化孔子，认为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学家均是历史的产物。《七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今虽已散佚，但其主要内容已保存在班固所著的《汉



书·艺文志》中。

刘虞系东汉大臣，东海郯（今郯城县）人。为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的后裔。刘虞任幽州刺史时，附近少数民族受其德化，均按时向东汉朝廷朝贡。东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泰山太守张举、中山国相张纯联合乌桓大人丘力居反叛朝廷，一时聚众十万人。翌年，朝廷命刘虞为幽州牧，督讨叛军。丘力居闻听刘虞到来，遂率乌桓部归降，张举、张纯亦逃至塞外。平叛后，朝廷拜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幽州邻接少数民族地区，地僻民贫，为减轻民众负担，刘虞除留降虏校尉公孙瓒领兵一万保卫边境外，其他驻兵一概撤销。他身为侯爵，却衣着破旧，食无兼肉，并劝课农桑，开放盐铁资源，开放上古关市，与少数民族居民进行贸易，使当地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正月，韩馥、袁绍因年幼的汉献帝受董卓挟制，欲立刘虞为帝，被刘虞严词拒绝。初平四年，刘虞与公孙瓒矛盾激化，混战后为公孙瓒俘后杀害，幽州百姓闻后莫不痛惜。

东汉时期，刘姓中还出了一批山东籍文人贤士，其中有著名天文学家刘洪、著名文学家刘祜和著名训诂学家刘熙等。

刘洪系山东蒙阴人，东汉鲁王刘兴的后裔。他博学多才，尤精天文、数学，其计算技巧被时人誉为“举世无偶”。所创制的《乾象历》，是中国首部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历法。提出了推算定朔的方法，并为后世所沿用。首次测定近月点长度27.55336日（精确值为27.5545505日），发现白道与黄道成约6度的交角。他与蔡邕一同续补《汉书·律历志》，其中有许多资料为《续汉书·律历志》所采用。刘洪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珠算的改进与推广，他因此被誉为中国珠算的奠基人。

刘祜系东平宁阳人，性亢直，其五言诗在当时负有盛名，为“建安七子”之一，后人将其与曹植并称为“曹刘”。在《赠从弟》中，他以松柏誉之，吟哦出“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的诗句，坦露了其效松柏行为端直、坚贞自守的心声。刘熙系北海（今山东昌乐）人。他以语源学的观点研究训诂，所著《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篇。其体例仿《尔雅》，而专用音训，以音同、音近的字解释意义，以探求语源，辩证古音与古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汉语语源学的代表性著作。



刘备，是在借镇压黄巾起义之机而崛起的一代杰出的政治家、蜀汉政权的创建人。刘备虽系汉远支皇族，但其家境早已败落贫困，靠与母一起贩鞋织席维持生计。刘备从一介平民成为三国鼎立的一国之君，其本人并非具有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和力敌千军的盖世武功，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具有守仁重义的人格魅力和尊贤纳谏的宽阔胸襟。为摆脱寄人篱下、四处奔波的困境，经人指点后，求贤若渴的他竟一连三次赴隆中茅庐拜访，邀请诸葛亮出山助打天下，其情至真至诚，使诸葛亮为之感动，敬其人品，方与之相见，为刘备拟定了连吴抗曹，西居荆、益，南和夷越，尔后待机以图中原的隆中对策，成为刘备日后成其大业的战略指导思想。由于刘备讲仁重义，关、张、赵等一代虎将皆甘心为其血染战袍、征战终生。彰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临终之际，向诸葛亮托孤，嘱咐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其遗言曰：“若嗣主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段遗嘱，可谓披肝沥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君臣关系。刘备的形象经《三国演义》的作者进行艺术创造后，更加符合中国百姓的审美教育需要，“桃园结义”和“三顾茅庐”的故事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美谈。

刘劭是三国魏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汉魏时期，儒道名法合流，品评人物才性高下以及其标准成为当时思想界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刘劭所著《人物志》，即成为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认为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主张以人的“形质”入手观察人之才能与性情。他根据人性将人分为五等，即圣人、有德行

之人、有偏才之人、有一技之长之人和无恒之人。他认为情性乃人之本，而情性又以“中和”为贵，因为中和之性平淡无味，可以调成五材。他又依据德与才两个方面将人格划分为十二种类型：一为刚毅之人（才在矫正，失在激许）；二为柔顺之人（每在宽恕，失在少决）；三为雄悍之人（任在肝烈，失在多忌）；四为惧慎之人（善在恭谨，失在多疑）；五为凌楷之人（用在桢干，失在专固）；六为辩博之人（能在释结，失在流宕）；七为宏普之人（弘在覆裕，失在溷浊）；八为狷介之人（节在俭固，失在拘肩）；九为休动之人（业在攀跻，失在疏越）；十为沉静之人（精在玄微，失在迟缓）；十一为朴露之人（质在中城，失在不微）；十二为韬谲之人（权在谲略，失在依违）。作为爵封关内侯的刘劭，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认为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主张量能授官，用其所长。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具有积极影响与作用，而且对后世亦有借鉴价值。

魏晋时期，刘姓名人还有“竹林七贤”之一的文学家刘伶，著名数学家刘徽和坚决抗击外族侵略的西晋爱国将领、诗人刘琨等。在与刘聪、石勒匈奴侵略势力抗斗失利后，刘琨在《重赠卢谿》诗中明志感怀，写下“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的诗句，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悲愤情怀。

刘裕，即宋武帝，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其先辈为避乱从彭城（今江苏徐州）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时家道贫寒，曾以贩履、种田、捕鱼为业。后为东晋北府兵将领，参与镇压孙恩起义。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击败桓玄，遂掌东晋大权。他志存高远，为收复失地，曾两次率兵北伐，驰骋于中原万里之地，旌戈指处，所向披靡，相继灭南燕、平后秦，收复洛阳和长安，使人心大振。辛弃疾在《永遇乐》词中曾赞其声威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后官至相国，封宋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是为宋武帝。从此为转折点，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刘裕当政后，再行土断，侨置的郡县多被裁并，此举既抑制了豪族势力，亦增加了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说到刘裕，还有一位沂蒙籍名人不可不记，他便是东莞莒县人刘穆之。刘穆之初为琅琊府主簿，元兴三年随刘裕讨桓玄，为军府主簿，从此成为刘裕心腹，后又兼领扬州刺史。在刘裕北伐时，刘穆之随其左右，决策幕府。后官至尚书左仆射（副丞相），总理朝政。

南朝时期，刘氏族中出了一批文学名家：刘义庆乃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刘道邻之子，袭封临川王。所著《世说新语》系记载历史人物轶事的小说，所记内容上起西汉，下至刘宋初年，其中绝大部分所记为魏晋人物的言行。对后人了解魏晋时期封建士大夫的政治角力、社会风尚、人际关系和学术文艺思想等诸方面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认识价值及审美价值。该书已被作为经典收入《诸子集成》之中。刘骏，即宋孝武帝。《文心雕龙》称“孝武多才，英采云构”。所作《自君之出矣》诗，真挚朴素，开创了南朝帝王诗作模仿民歌的风气。刘峻系南朝齐梁间的著名学者，祖籍平原（今属山东省）。他为《世说新语》作注，引书计400余种，保存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

刘勰乃南朝齐梁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祖籍东莞莒县人，世居京口。他饱览百家之书及历代文学著作，深谙文理。经五六年深研笔耕，于中兴元年至二年（公元501—502年）间撰成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心雕龙》。该书计十卷、五十篇，分上、下编。作者在该书《序志》中开宗明义道：“《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该书全面总结了前代的文学现象，论述了文学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主张文学应有社会政治内容，文与质



应当并重。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之发展，均与时代政治相关。书成后，当时尚未知名的刘勰为得到文坛领袖沈约的认同，曾扮成商人候沈约车以献书，沈约阅后谓此书“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刘勰从此声名大震。

南朝梁时，刘孝绰四兄妹名显文坛。刘孝绰善诗，其三弟孝仪工文，六弟孝威工诗，故孝绰评诸弟有“三笔六诗”之说。其妹刘令娴善诗，世称刘三娘。兄妹数人联袂称著于文坛，足见家族文化对其成员熏陶、影响之深。《古意送沈宏》诗是刘孝绰的代表作，其中“复此归飞燕，衔泥绕曲房。差池入绮幕，上下傍雕梁。故居犹可念，故人安可忘”数句，以飞燕喻人，曾撩动众多游子的思乡情愫，故为人所称道。

隋唐时期，刘姓名人主要有：隋代天文学家、经学家刘焯。他于公元604年撰《皇极历》，创立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以解决日、月目视运动的不均匀，在推算日食的准确性方面明显优于以前的历法。

在政治方面，唐中叶宰相、著名理财家刘宴以政绩突显政坛。他七岁即举神童，授秘书省正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拜相。20年间分掌诸道财赋，晚年独自总管全国财赋。他主持疏浚汴水，改进漕运，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分段转运法，岁入江淮粮食达数十万石，以解关中食粮之需。又改进盐法，推行平准法，平抑物价，为整顿安史之乱后国内财政的混乱状况贡献颇大。

在文史领域，刘知几、刘长卿、刘禹锡等享誉古今。刘知几乃一代文学大家，所撰《史通》，凡二十卷四十九篇，提出了诸多极有见地的治史观：主张编撰纪传体断代史书，应增加都邑、氏族、方物、方言四志；认为史家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为重，以为“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凡良史应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提倡史书应用当时语言，反对模摹古文及用虚词滥调等。此书对后代治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长卿和刘禹锡是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诗以五言、七言近体为主，自诩为“五言长城”。五绝《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是其代表作之一：“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诗人仅以二十个字的篇幅，就将一定时空跨度的人物、景物、事件浓缩其中，且写得极富生活气息，展示了其高超的白描艺术，精密之至，令人赞叹。刘长卿所宿的芙蓉山，在今苍山县境内。另外，也有湖南湘潭和江苏宜兴的芙蓉山之说，此诗所咏究竟是何处芙蓉山，今已难确指。刘禹锡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其主要哲学著作是《天论》。他认为，天和人均是有形之物，天与人各有其职能。“天之能”指自然规律，这是人不能创造和改变的；人为万物之尤，可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这一天人交相胜的思想是人定胜天思想的发挥。在强调“天人交相胜”的同时，还指出“天人还相用”。认为“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在文学上，他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并称“刘白”。其论说文成就极高，散文辞藻华美。今存诗八百余首，其中《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乌衣巷》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在《西塞山怀古》中，诗人咏吴、晋兴亡之事，发出了“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的感叹，指出地形之险不足恃，结束割据，走向国家统一，乃是历史之必然。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作者吟哦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句，意象新颖生动，境界辽阔深远，揭示了自然界与人生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因而被广为传诵。在《乌衣巷》中，作者驻足秦淮河畔、朱雀桥边，目睹昔日曾繁华一时、如今已颓败荒凉的东晋王导、谢安等豪门世族的旧居，一股抚今吊古的沧桑感不禁油然而生，于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句，便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千古绝唱。这一借燕子易窝而喻朝代兴替大主题，即以小见大托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成为文学创作史上的经典之笔。

蒙阳上古史迹漫话

李常松



蒙山之阳的平邑县，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开始在这里活动、居住，留下了许多历史传说和各种遗址遗迹。对此，古代经史子集多有记载，地上地下丰富的文物古迹可以作证。今择其要者予以简述，以此说明蒙阳上古历史之久远，文化之繁荣。

一

《帝王世系》载：“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为百王先。”《山海经》、《路史》、《太平御览》、《潜夫论》等有关记载与之大致相同。太昊亦称伏羲、庖牺、庖牺氏，中国早期文明时期最著名的东方部落首领，历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首。据说他贡献很大，作八卦用以记事，制嫁娶以别男女，教民结网，捕渔打猎，创造了文字符号等等。历史传说不是信史，不能完全相信，但其有若干可信成分，并非全系无稽之谈，不能全盘否定。太昊伏羲氏，后世尊为“人文初祖”、“百王之先”，其在华夏文化中的主源头地位是勿容置疑的。现代考古学证明，太昊伏羲时代是中国古代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具体为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早期。

伏羲之“伏”古代通风、蒙、牟、包，伏族即凤族、蒙族、牟族、包族。今平邑县北部有蒙山（蒙族

居住之山）、武（牟）台（牟族居住之地，下同）、保太（包台），中部有丰（风）山、凤凰庄（风亦即凤凰的凤）、丰阳。蒙山之阳浚河两岸，与伏羲氏时代相同的大汶口文化及其时代稍晚的龙山文化遗址遗迹遍布各地。雷泽之雷，最初是由莱之音转，雷、莱、服亦皆由伏之音转，说明其泽最早是用伏羲族名命名的。后世因传说伏羲为雷神之子，故称是泽为雷泽。由于太昊伏羲功劳巨大，历代有关其出生、发祥、迁徙之地的争议很多。笔者同意多数史家、史籍关于伏羲出生、发祥于蒙山之阳浚河上游今平邑、泗水两县交界的雷泽湖畔的观点，其他具体证据，不再一一胪列。

二

当以曲阜为中心的少昊部落强大后（注：太即大，太昊即大昊。少即小，少昊为继太昊之后强盛的东方氏族部落首领），太昊后裔被迫西迁。《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昊之墟”在“陈”。陈在今河南淮阳，史学界多以为此乃太昊后裔迁徙之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少昊部落强盛后太昊后裔并没悉数西迁河南，其中一支仍留在今平邑县境内建颛臾国，并负责祭祀太昊和蒙山。另有三支留在今鲁南地区，其中一支在今济宁市任城区建任国，其他两支在今泰安市东平县建宿国、须句国。《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说明迟至春秋时期今山东地区仍存在四个太昊后裔之邦国。这四个春秋时代尚存的邦国，他们都是风姓，又都奉太昊为祖先，说明太昊势力长期存在于山东境内。

三

《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渔雷泽。”舜亦称大舜、虞舜、帝舜、重华，上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古籍载他身長八尺，体形高大，是东夷部落联盟中很有能力和威信的首领。“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什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年20岁时以至孝闻名，30岁开始受到尧王的器重，尧将女英、娥皇二女嫁于舜为妃。50年代尧治理天下，58岁时尧崩，61岁代尧为炎黄联盟首领。舜在位39年（一说50年），百岁传位于禹，同年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和太昊伏羲氏一样，虞舜的出生，发祥、迁徙之地也有争议，尤其是称“舜耕历山”的“历山”竟达十几处之多。但“舜耕历山渔雷泽”，而绝大多数“历山”附近并无“雷泽”。蒙山之阳今平邑、泗水两县交界处，既有舜耕之“历山”，又有其渔之“雷泽”，有他的出生之地“诸冯”，还有舜帝庙和舜井等。历山位于雷泽湖西南，海拔201米，在泗水县境。历山和雷泽湖以东平邑县铜石镇有南诸冯、北诸冯、诸冯铺三个自然村，雷泽湖南平邑县凤凰庄清朝末期前亦名诸冯。为纪念帝舜，蒙山地区人们很早以前就在雷泽湖南侧建有舜帝庙，庙内供奉舜帝及其女英、娥皇二妃。现在古舜帝庙已不存，庙旁尚有以庙命名的平邑县舜帝庙村。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即今蒙山。大禹在蒙山召开由众多氏族部落首领参加的大会，与会者还要“执玉帛”而来，说明此时禹已是东方氏族部落大的联盟的领袖。

《国语》记载：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尧封白马子鲧为崇伯。雷泽湖东有白马庄，西北有崇邑。后来鲧用堵的方法治水无效，被流放羽山。鲧子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历时十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战胜洪水，名垂后世。禹是否出生于蒙阳无确证，但蒙阳作为其重要活动地域之一是毫无疑问的。按《尚书》记载，禹娶妻于涂山，生子启。《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涂，其本字作余，上古亦可写作余、徐、塗，金文皆隶定为徐，为徐夷族名。蒙山大禹时称涂山，说明此时亦属徐族居住之山。大禹之

后，蒙山之阳今平邑县、费县北部一带，夏商周初有徐族部落建立的方国——徐国。徐国亦称徐夷、徐戎，商末西周初年势力强盛，地域宽广。后来周王朝打败徐国，徐族被迫南迁今徐州以南江淮地区。

四

《吕氏春秋·音初》载：“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蕘山。”《文心雕龙·乐府》：“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夏后氏孔甲指夏王孔甲，亦称夏甲，他是大禹的后代，是夏王皋之父，夏王发之祖父，夏王履癸（夏桀）的曾祖父。夏王孔甲是荒淫之君。《史记·五帝本纪》载其“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但古书又载其善歌赋，说他一次游田于东阳时，在当地领养了一个因原先有人预言将遭不幸而被遗弃的小孩，后来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果真被斧头砍断了脚，成了一名守门人。孔甲由此感叹，作《破斧之歌》。梁朝《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探讨乐府起源时，将孔甲《破斧之歌》称之为东方音乐的开始（“东音以发”），将东方视为中国音乐艺术的发源地之一。他认为中国东、西、南、北各地音乐的兴起转变是不一致的，到周代由采诗官将各地民歌采集宫廷后，由乐师配乐，使之成了乐府，而由它便可观盛衰，知兴废。

东阳，蒙山南麓今平邑县有大东阳、东阳店子等村。平邑县流峪镇城子村古城址为西周春秋时期东阳故城遗址。山，即丰山，在大东阳村西。距丰山不远处的平邑县蔡庄、洼子地村有两处古文化遗址，遗址中1973年、1976年分别出土过铸有“史”字族徽和大批铸有商周铭文的青铜礼器，说明至迟商周时期东阳一带文化确已比较繁荣。

《楚辞·天问》“桀伐岷山，何所得焉？”王逸注曰：“岷，蒙音转，岷山即蒙山。”桀亦称夏桀，名履癸，夏朝末代国王，著名暴君。夏王朝自孔甲时开始衰败，诸侯多叛。夏桀继位后，为政残暴，生活糜烂，任意虐杀百姓，破坏农业生产，对外滥施征伐勒索，“百姓弗堪”。故商汤起兵伐桀时，桀众叛亲离，身死而国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妹喜亦作妹嬉、末喜、末嬉，夏桀宠妃。古书载桀伐蒙山时蒙献妹喜，故又称蒙妹。夏末桀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战败后，她与桀同舟渡江，出奔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之山而死。桀伐蒙山，说明夏桀用兵，一度到达过蒙山。蒙献妹喜，说明夏代蒙山地区已有居住该处的蒙族部落或方国。据此推论，蒙山之“蒙”字，最初当是蒙族部落或方国之名，蒙山当是古代蒙族居住之山。西周春秋时蒙

山地区有蒙邑，属鲁国。《左传·哀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盟于蒙。”1982年蒙山发现一春秋时期青铜兵器蒙戈，上有铭文“蒙”字。能够制造青铜器并在器物上铸有本族（国）徽铭文，说明历史上蒙族部落或方国确曾创造过较高的物质文化。

五

《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颛臾之名源于颛顼。或曰颛臾即颛顼。颛顼为太昊、少昊之后东方氏族部落首领，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生于若水，居于帝丘，号高阳氏。《路史》载：风姓，15岁辅佐少昊，20岁登帝位，在位76年。颛臾，风姓，是以凤凰为图腾崇拜的东方小国，负责主祭蒙山。颛臾国故城在蒙山主峰南麓今平邑县柏林镇固城村北。颛臾国的建国时代，旧志一般认为在西周初期，所谓“周成王时，封伏羲后裔，建国颛臾，附庸于鲁，主祭蒙山”（清光绪《费县志》）。但事实上颛臾同蒙族部落方国一样早在夏商时期已是一个东夷方国，并至迟到商代已较为发达。旧志所称“周成王时”，不过是指西周初年成王又对原商末颛臾国进行重新加封并令其继续负责主祭蒙山罢了。

颛臾国祭祀蒙山神的主祭处在其故城东北4公里处的古蒙祠。《水经注》“治水东流迳蒙山下，有蒙祠”即指此。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朝议大夫、守琅琊别驾李瑗在此立有《蒙山祠记碑》。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神宗封颛臾王为灵显潜应侯，蒙祠一度改称灵显庙。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徽宗加封颛臾王为英烈昭济惠民王，列于《祀典》，改灵显庙为颛臾王庙。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诏令“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革去，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祭”（《明史·礼志·诸神祠》），原蒙祠宋以后颛臾王庙官方之祀遂废。洪武后民间祭祀蒙山神的活动仍然沿续，明清时当地对古蒙祠曾多次进行重修。千百年来，古蒙祠历代崇祠之祠址、沿革十分清楚。古代蒙山地区颛臾王庙很多，但蒙祠只有一个。明朝弘治以后，蒙阴县以俗传一古代颛臾王死后葬于蒙阴联城为由，在该处亦建有颛臾王庙，并将此亦称为蒙山主祭处。但蒙阴颛臾王庙既不符合明代朱元璋诏去历代“岳镇”“海渎”封号，只以山水本名称其神的“上级要求”，也没有具体哪朝哪位颛臾王死后葬于蒙阴的确切证据。蒙阴颛臾王庙不能视

为平邑县古蒙祠的更名和沿续，更不是其曾经主祭过蒙山的证据。

六

《尚书》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传云：“徐戎、淮戎并起为寇于鲁，故东郊不开。费，鲁东郊之地名。”伯禽，周公之子，文王之孙，受封于鲁，为鲁国第一代国君。

《费誓》，《尚书》中的一篇，记伯禽率师伐徐时在费地所作的誓师之辞。西周初年，武王崩，成王年少，周公摄政，东夷诸国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和周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反对周公。周公等在杀武庚、黜三叔后，集中力量与东夷各国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年的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之始，徐、淮强盛，周公之子伯禽受封的鲁国国都曲阜东部交通受阻。于是，鲁侯伯禽率鲁兵由曲阜经平邑北部向东讨伐，在费地作征伐誓师之辞。这个“费”在今费县西北12.5公里处的上冶镇毕城村，西边与今平邑县资邱乡为邻。这场战争最后以鲁国大获全胜而告终，鲁国由此占有徐、淮等东夷大片疆土，使鲁国成为北到泰山，南有凫山、峯山，东包括蒙山直到大海的大国。《诗经·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歌颂的正是此事。其诗中的“龟蒙”即指蒙山。此后经春秋到战国初，今平邑县均属鲁国，其中西周以后的颛臾国，系被周王重新分封的，为鲁国附庸。

七

《孟子·尽心上》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东山即蒙山，亦称东蒙、龟蒙、云蒙。孟子感叹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一方面说明蒙山、泰山之高大雄伟，另一方面证明早在孔子时代蒙山、泰山就已同时成为东方著名的游览胜地。现平邑境内蒙山主峰龟蒙顶上立有孔子小鲁石碑，景区内还有孔子攀登过的大通岩、孔子休憩之处圣憩石、孔子伫立东看海上日出的望海楼等景点，山下有孔子登山途遇老莱子（老莱子，春秋楚国人，避乱世隐居蒙山，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耕于蒙山之阳。为孝奉双亲，行年七十作婴儿戏。身著五色斑斓之衣。尝取水上堂，诈跌仆，卧地学小儿啼。弄雏于亲侧，愿双亲欢喜。所居之处现名孝义村）打柴之处的遇圣桥、孔子登山时住过的子宿村、小鲁庄村。

《论语·阳货》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



夫子莞尔而笑：‘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的高徒言偃（字子游）做武城邑宰时，按老师孔子平时所讲，用儒家的礼乐教化邑人，所以孔子到武城后到处都能听到弦歌之声。在当时孔子认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世人多不懂礼乐，孔子骤然闻听弦歌之声，心花怒放，欣喜若狂，故用反语相戏，说杀鸡焉用宰牛之刀？意思是你言偃管辖的不过是一个武城小邑，何必行此礼乐大道！子游听后当时对孔子的玩笑话没有理解，正色回答说：我过去常听老师您说，君子、小人都必须学习礼教，注重行礼作乐，这样君子学了才更能爱人，小人学了才能更加安顺。不管君子、小人，职位高低，都必须学习礼乐，这对人类的文明开化很有好处。所以，武城虽小，我在这里做官，就必须教之以礼乐，这难道还有错吗？孔子最后实言相告子游及随其一同前往武城的其他弟子，说：你们听着，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现在“弦歌之声”、“莞尔一笑”、“割鸡焉用牛刀”已成为常常被人引用的成语典故，丰富了我国的汉语词汇。

境内春秋时期文化发达，涌现过子路、曾点、曾参、原宪、澹台灭明五名孔子著名弟子，其中曾参对传播孔子儒家思想贡献最大，后世尊其为宗圣，列各地孔庙中的四配之一，配享孔子。其他四位，子路被尊为十哲之一，曾点、原宪、澹台灭明被尊为先贤，均得从祀孔子。子路是孔子弟子中所任官职最多、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曾先后担任季氏宰、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蒲大夫、蒲令、蒲宰等。孔子另外两个弟子高柴、子游曾先后在今平邑县境内任武城宰，另一弟子司马牛死后葬于境内邱舆，春秋邱舆城在今丰阳镇南埠庄。境内上述孔子有关弟子的史迹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平邑，春秋时期为季平子的封邑。季平子，又名季孙如意，鲁国上卿，公元前534年继承卿位。此前鲁国公室早已破落，开始由季孙氏（亦称季氏）、孟孙氏、叔孙氏“三桓”轮流执政。后季氏专权，至季平子时，季氏擅专鲁国之政已有三世，时间已达数十年之久。其财产多于公室，拥有私属甲士7000多人，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季平子死后，其子季桓子、孙季康子又相继执掌国政。《论语·季氏》载：季康子时季氏将伐颛臾，季氏的家臣冉有、子路为此事告诉他们的老师孔子，孔子反对讨伐，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季氏最终伐没伐颛臾，史籍中没明确记载，后人多以“孔子深责

之，季氏乃止”或“事而不克”解释。笔者以为，从当时季氏一心想吞并颛臾的实际情况看，一是孔子深责，季氏不可能乃止；二是以双方力量对比众寡悬殊来分析，季氏不会事而不克，即使一次不克，肯定还会再次讨伐，直至获得最后胜利。另外从季康子后到整个战国末，所有史料未再见提及颛臾，应该说这不是偶然，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颛臾国在春秋末已被季氏吞并。颛臾国被吞并后未见设邑，可能季氏将其并入费邑或平邑。今平邑县城东北五里处之数千人口大村颛臾村，传其为颛臾国被吞并后迁民至此。

八

蒙山大洼景区龙王河左岸有一自然村叫鬼谷子村，传说为纵横家鬼谷子的出生地。景区内与鬼谷子有关的景点还有鬼谷子洞、鬼谷子峪、鬼谷子讲堂、智慧府等。鬼谷子为战国时人，其姓名传说不一，有的讲姓王名诩，《东周列国志》称其姓王名禅。其隐居鬼谷，因以为号，长于修身养性和兵家纵横捭阖之术，是一位著名的谋略家、兵家、辩士。著有兵法《鬼谷子》一书，苏秦、张仪、孙臆、庞涓都是其蒙山授徒时的高足。后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为战国时各国君主所器重。庞涓心术不正，自知无法超过孙臆，提前下山任魏国将领。而孙臆虚心好学，潜心钻研，最终学有所成，助齐败魏。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俘，庞涓被擒自杀。鬼谷子本人著有兵书，其弟子孙臆也著有兵书。《孙臆兵法》，《汉书·艺文志》中记有篇目，但原书早已失传，若干年来“历史上是否真有孙臆其人”和“孙武与孙臆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的争议很大。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孙武兵法》、《孙臆兵法》同时出土，解决了上千年的争议，也说明鬼谷子弟子孙臆确曾著有兵书《孙臆兵法》。



雕塑时光

——记雕塑家孙龙本先生

胡英子

他曾是临沂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师，他曾是步履匆匆走过俄罗斯涅瓦河畔的中国学子，他的作品是临沂人民广场的名片——“山高水长”红色雕塑和与之相媲美的“文韬武略”临沂十大历史名人雕塑。这些出道便不凡的作品为雕塑艺术家孙龙本先生赢得了一个个国家级的奖项。

初绽峥嵘，勤奋的他自此沉浸在雕塑艺术中，作品日渐精进。若干主题性作品是临沂城雕塑作品的重头戏和华彩乐章，成为临沂城的一处现代人文景观和一面文化旗帜。如在2003年创作的临沂市人民医院主题雕塑《和》及地下停车场通风口6组景观造型，2011年，创作了临沂市北城新区《奔向未来》、《盛世相逢》、《欢乐的河》等系列景观雕塑。讴歌时代祥和的作品包含独到的创新元素，令人观之赞叹。最为称道的是2009年获年度中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大奖的《沂蒙广场系列雕塑》。自幼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孙龙本熟知红色革命历史，他借这个题材抒发对家乡故土的怀恋情怀，历时三年心血完成了高32米的大型纪念雕塑群《参军参战》和《支前大军》，他在组雕中精心状摹了蕴涵淳朴的沂蒙支前大军，以饱满的艺术语言精心地表现他们的伟大精神，生动再现了那段无私无畏的血与火的历史。开阔的视野和超拔的胸襟，使他的作品具有大型交响乐和长篇宏制史诗般的气度，流露着他坚韧、执着、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性格特点与人格风范，同时也彰显他把红色文化的宣扬与传播视为自我艺术活动的自觉。可谓以鲜明的艺术立场唱出主旋律的嘹亮歌曲。他是雕塑家，也是具象派诗人。一组组雕塑更像是城市的抒情诗，他用勤奋的刻刀书写着诗行。从大学毕业，教书，攻读硕士博士，他的艺术创作贯穿其中，并一次次作为城市雕塑的领军和重头戏。马不停蹄的创作为他积累了极其丰厚的作品，其间所获得的奖项、荣誉、成果十分丰硕。

他是创作力丰沛、表现手法丰富多彩的雕塑家。与洪钟大吕般的群雕相比，他创作的幽逸隽永的小品也别有味道和风骨。那些值得回味的本真原生的作品似信手拈来，却又每件匠心独具。深沉的意念，生动的情愫，简约却不失含蓄，质朴却不流俗，显示他的艺术追求生活情趣和文化品味，如《田园守望》、《生肖》、《高士》系列以及《铜牛献瑞》系列，粗犷中独特，舒展中自由，拔萃又不拘一格。

如隐者般行走京城的孙龙本始终不渝的怀着一份故土情结。乡情



孙龙本，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俄罗斯美术家协会艺术理论委员会会员、1995年到临沂大学美术学院任教，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

诗怀让孙龙本的艺术小品多了田园魅力。飘动的炊烟，弯曲的村巷，参差的篱笆。“那些谷底峰端舒卷的云彩，那些守望千年的旧梦”，这一切都带着泥土的味道，浮散着怀旧温暖的气息，感染引发着观者的共鸣。

做为朋友虽见证了这些年他在艺术创作活动时的辛苦，可还是很难想象他在经年如一日繁重的劳作中如何恒志不改，那坚韧执着的守定令人惊叹。因为整个创作过程中苦行僧般的脑力加体力劳动绝非一般人可及。然他以苦为乐，把全部心血融入艺术，让雕塑升华自我生命。正逢四十不惑创作盛年的孙龙本已渐入佳境。坚守艺术不为金钱功利所动的笃定，才华的积淀与开阔的视野心胸，决定了他的高度与气度，“蓄一股铮然之气，以侠义创造不朽奇迹”。他的高士梦和义士梦激励着陪伴着他对这个世界的诗意表达，这表达足以使后来者为之敬佩。



沂水县史志办科学谋划2012年史志工作。新年伊始，沂水县史志办坚持“依法修志、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的工作方针，制定《2012年沂水县史志工作要点》，科学谋划2012年沂水史志工作。一是扎实推进史志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二是认真做好《沂水志（1991—2008）》的出版发行工作；三是着力打造精品《沂水年鉴·2011》；四是高质量编纂《铭记同乡》（第二辑）；五是精心指导编修部门志、乡镇志；六是不断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推进沂水县情网站和县情资料库建设；七是大力加强方志馆建设；八是加强史志专业队伍建设。

《金山村志》志稿评审会召开。1月10日，蒙阴县《金山村志》志稿评审会在蒙阴县蒙山宾馆召开。县政府、蒙阴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领导及县史志办公室、《金山村志》编纂委员会成员、金山社区居委会成员共20余人参加会议。《金山村志》编修工作于2011年3月10日启动，经思想发动、资料征集、初纂、内审征求意见、总纂五个阶段，年底全面编纂完成。该志书全面记述了金山社区自建村至2011年，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

临沭县史志办认真贯彻县十一次党代会精神。1月13日，临沭县史志办召开专题学习会，就近期召开的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等精神进行传达、集中学习和贯彻，并结合具体实际，进一步明确今后工作思路。

《沂水县人大志（1954-2011）》出版发行。1月15日上午，《沂水县人大志（1954-2011）》发行会在沂河山庄召开。

《沂水县人大志（1954-2011）》的编纂工作于2010年12月启动，是第一部全面记载沂水县人大发展历程的志书，也是全县第二部按照《沂水县地方志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的部门志。该书分为大事记、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等十一个部分，共90余万字。以历史顺序为主线，按事分类编写，综合运用述、记、志、表、图、录、传等志体，以志为主，按章节编排内容，通过大量翔实的资料，真实地记录了沂水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历史及现状。客观地反映了沂水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致力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三个文明建设进程

中的历史功绩。尤其是凸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大工作的崭新局面。为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全县人大工作和人大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临沭县军事志》出版发行。近日，由临沭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的《临沭县军事志》出版发行。

志书编纂工作始于1982年5月，2008年9月完成初稿，经反复修改完善，到2011年底编纂完成。该志书上限起于公元前585年，下限止于2005年。全书分为军事环境、军事组织、重大战事、兵役、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方勤务、民兵、武器装备、国防动员、人物等十二篇，共计60余万字。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客观地记述了临沭县军事的发展变化，歌颂了临沭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参军支前、武装斗争中创造的不朽业绩，全面地反映了临沭县地方军事活动的历史与现状。

《沂蒙史志》被评为“2011年度全市优秀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2012年2月9日，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办的史志文化类期刊《沂蒙史志》（双月刊），被临沂市委宣传部、临沂市文化市场管理执法局评为“2011年度全市优秀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